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



土洋大戰：
清代開港後臺灣的紡織品貿易

指導教授：林玉茹

研究生：李勁樺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	7
第二章 區域分工與開港前紡織品貿易的展開	11
第一節 臺灣與大陸區域分工貿易的形成	11
第二節 開港前臺灣的紡織品貿易	21
第三節 移墾社會中紡織品的功能和價值	33
第三章 開港後紡織品貿易的競爭與發展	41
第一節 英國紡織品獨霸洋布進口時期（1860~1884）	41
第二節 東西洋布與土布競爭時期（1885~1895）	56
第三節 全臺外國紡織品的總量討論	68
第四章 開港後南北市場紡織品的進口與銷售	76
第一節 北部市場洋布的進口與銷售	76
第二節 南部市場洋布與土布的進口與銷售	87
第三節 紡織品市場的南北差異	100
第五章 結論	105
參考書目	108

圖 次

圖 3-1 1866~1884 年全臺外國布類商品進口數量變化圖.....	44
圖 3-2 1868~1884 年全臺灰白襯衫布全臺灣進口數量變化圖.....	48
圖 3-3 日本布類商品進口數量變化圖.....	59
圖 3-4 1870~1895 年臺灣港口的貿易模式圖.....	67
圖 3-5 外國棉織品進口數量變化圖.....	71
圖 3-6 外國毛織品進口數量變化圖.....	74
圖 4-1 北臺灣布類商品進口數量變化圖.....	79
圖 4-2 北部市場各項布類商品輸入數量變化圖.....	82
圖 4-3 南臺灣布類商品進口數量變化圖.....	89
圖 4-4 南臺灣各項布類商品進口數量變化圖.....	96



表 次

表 3-1	1866~1884 年全臺外國布類商品進口數量統計表.....	43
表 3-2	1866~1884 年全臺外國布類商品五年平均輸入量比較表.....	46
表 3-3	1868~1884 年全臺灰白襯衫布全臺灣進口數量統計表.....	47
表 3-4	1868~1884 年全臺灰白襯衫布五年平均輸入量比較表.....	48
表 3-5	日本布類商品進口數量與所占全臺進口棉織品比例表.....	58
表 3-6	1885~1895 年英國棉織品約略進口數量表.....	61
表 3-7	開港後臺灣外國進口棉織品輸入量表.....	70
表 3-8	開港後臺灣外國進口毛織品輸入量表.....	73
表 3-9	棉毛織品進口值量比較表（1882~1891）.....	74
表 4-1	北臺灣進口布類商品數量表.....	78
表 4-2	北臺灣輸入的主要布類商品表.....	81
表 4-3	南臺灣進口布類商品數量表.....	88
表 4-4	清治末年臺南三郊輸入貨品表.....	93
表 4-5	南臺灣輸入的主要布類商品.....	95
表 4-6	打狗麻袋進口數量表.....	97
表 4-7	南北市場棉毛織品五年平均輸入量比較表.....	101
表 4-8	灰白襯布南北市場五年平均輸入量比較表.....	102

謝 辭

論文寫作，是一段與自己對話的歷程。

在寫作的過程中，不斷發現自己的不足，並深刻體會自身的軟弱，要不是有家人、朋友與師長們的支持，我一定沒辦法走完這趟旅程。謝謝你們的陪伴，感謝在這段時間幫助過我的每一個人，讓我能順利完成這本論文。

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林玉茹老師，很幸運遇見這樣一位熱情又積極的老師，不斷的鼓勵我，一步步的帶領我學習怎樣做研究。當我不知所措時，她豐富的學識是我最好的依靠；當我情緒低落時，她充分的耐心，給予我重新出發的勇氣。謝謝老師，您是我完成論文的最大功臣。

感謝兩位口試委員，黃富三老師、曾品滄老師給予論文的寶貴建議，讓我受益良多。謝謝研究所授業的薛化元老師、戴寶村老師、陳翠蓮老師、李福鐘老師、李為楨老師、呂紹理老師、鍾淑敏老師，開拓了我對臺灣史研究的認識。還有大學時代引領我進入臺灣史大門的詹素娟老師，以及在東吳大學時期教導我的林慈淑老師、劉龍心老師、劉靜貞老師，謝謝妳們這一路的鼓勵與幫助。

同窗好友的支持也是我完成論文的動力，謝謝子政、智祥、理清、金都、婉玲、柚子、立婷給予的關懷與勉勵。還要感謝從大學時期一直到研究所的好兄弟育正，很慶幸在學術研究的旅程中有你這樣一位朋友。謝謝同門的學長姐建鈞、偉達、濬澤、麗雯，及尹君、佩蓁、立媛、頌文、懷賢在討論時絞盡腦汁的建議，特別是一起並肩打拼的惠瑛，很高興我們這學期都順利畢業。

此外，感謝多位好友的跨刀相助。謝謝蘇雪莉給予我英文翻譯的協助，榮文做我日文翻譯的靠山，魚和麒麟是我電腦問題的救星，常常接到我表格與轉檔等困惑的求救電話，還有在論文最後完成階段，給我全方位支援的上景。沒有這些朋友的幫忙，一定無法這麼順利的完成論文，萬分感謝！

最後，當然要謝謝我最親愛的家人，抱歉拖了這麼久才把論文寫完，讓你們擔心了。這一段時間有你們全心全意的支持，和無盡的包容，讓我完全無後顧之憂，盡力在論文上衝刺。謹將這本論文獻給你們，並致上由衷的感謝。

勁樺 2011.8.17

摘要

紡織品貿易，是臺灣最重要的進口貿易。清治前期受到清廷對臺統治政策的影響，造成臺灣社會男女性別比例懸殊，不利於手工業的發展，因此逐漸形成臺灣農產品輸往大陸，交換民生必需品的區域分工現象。紡織品透過中式帆船往來臺灣與大陸兩地，以福建和華中地區為主。兩岸間興盛的紡織品貿易，也促使各地的布郊、絲線郊等經營紡織品的行郊興起。

開港之後的臺灣，紡織品進入嶄新的局面，開始有大量外國的紡織品進入臺灣，其中又以英國紡織品及日本紡織品，在臺灣擁有廣大的銷售實力。1860~1884年是英國紡織品的天下，到了1885年之後，日本紡織品異軍突起，成為繼英國之後，臺灣最重要的紡織品來源國家。

輸入臺灣的紡織品，大致可區分為棉織品和毛織品，由外國輸入臺灣市場的，大體上仍以棉織品為主。進入臺灣市場的棉織品，以西洋布中的灰襯衫布、白襯衫布，及東洋布中的日本棉布這幾種紡織品最為重要。然而不論是東洋布還是西洋布，在臺灣紡織品市場中最大的競爭對手，還是土布。於是開港後的臺灣紡織品貿易，就出現土布與洋布間彼此競爭的土洋大戰。

不過，由於臺灣南北部在開港之後，兩者經濟活動的發展有很大差異，使得兩地的紡織品貿易，出現截然不同的狀態。北部市場受惠於茶產業的持續擴張，經濟能力提升，對於紡織品的需求量也不斷攀升。南部市場則受到糖業出口衰退的拖累，使得南臺灣的進口紡織品貿易陷入停滯。加上本地商人加入經營洋布貿易，使得洋商無利可圖，逐漸放棄南部市場。

總之，清代臺灣紡織品貿易始終蓬勃發展，開港前的紡織品多源自中國大陸的華中與福建一帶；開港後兩岸的分工仍持續進行，但有洋布的加入，英國和日本的紡織品紛紛進口到臺灣，與土布搶奪臺灣紡織品的市場，形成紡織品的土洋大戰。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貿易，是臺灣的生命線。

不論是在今日的臺灣，或是從遙遠的歷史時期開始，經貿活動是這片土地的支柱，維繫人們的生計。開墾臺灣的先民，之所以願意飄洋過海、離鄉背井來到臺灣，有其強烈的經濟動機，想找一片能安身立命的土地，要過更好的生活，因此重商趨利的想法深植人心。陳秋坤在其〈十八世紀上半葉臺灣的開發〉一文中，就提及漢人移墾中的功利精神。¹林滿紅在〈貿易與清末臺灣經濟的社會變遷（1860-1895）〉一文中，同樣談到臺灣地區人民高度的市場取向。²這使得臺灣所栽種的農產品，具有高度的商品化的特質。而研究這些經濟作物的出口情況，就成為清代臺灣經濟史討論的重心。

因此，過去著墨的焦點，多半是以出口貿易的商品作為探討核心，如米、糖、茶、樟腦等研究，較少人去注意進口商品的部分，而導致相關研究缺乏。特別是單獨去討論某項進口商品的論著，大概僅有對「鴉片」這個主題，有一些相關的研究成果，像是王嘉慧的〈晚清鴉片進口貿易研究（1858～1894）〉便是一例。³鴉片在開港後海關資料中，位居進口商品的第一位，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然而，進口數量在海關中排名第二的紡織品，卻少見以此為核心討論的專著。為何有這樣龐大的紡織品進入臺灣？這些紡織品是由誰製作生產，並銷售到臺灣來？又是哪些種類的紡織品進入臺灣市場呢？這些疑惑的產生，促成本文寫作的動機，想以「紡織品」作為一個討論的主題，希望研究出這項龐大的進口商品，其貿易流向的來龍去脈。

¹ 陳秋坤，〈十八世紀上半葉臺灣的開發〉，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1975。

² 林滿紅，〈貿易與清末臺灣經濟的社會變遷（1860-1895）〉，食貨月刊復刊號 9 卷 8 期，頁 19。

³ 王嘉慧，晚清鴉片進口貿易研究（1858～189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所碩論，1985。

臺灣由於地理位置與文化條件的關連，所生產的農產品又具有高度商品化的特性，使得清代臺灣的貿易商品輸往中國大陸的情況十分普遍，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與臺灣的貿易往來最為興盛。由於臺灣適合生產的米、糖為大陸所需，而移民所欠缺的棉布、絲織品及其他日用品均可取給於大陸，遂形成臺灣與大陸間，一方供應農產品，一方供應日用手工業產品的「區域分工」現象。⁴臺灣紡織品貿易在區域分工體系之下所暴露出來的，是拓墾地區手工業不發達的特質，這使得臺灣更加依賴自大陸地區進口紡織品，開港之後同樣能容納新加入的洋布貿易。於是開港後臺灣的紡織品市場，逐漸形成土布與洋布間彼此競爭的局面，土洋大戰一觸即發，這樣有趣的現象，更加大了臺灣紡織品貿易討論的空間。

雖然目前尚未出現，以臺灣為主體去討論紡織品的著作，但有關中國紡織品的研究，卻早就如火如荼的展開。在棉紡織研究方面，有趙岡、陳鍾毅的《中國棉業史》，⁵嚴中平的《中國棉紡織史稿 1289—1937》，⁶徐新吾主編的《江南土布史》⁷，及《上海市棉布商業》⁸等書，這些有關中國棉業的研究，有助於了解中國棉紡業發展的歷程，對於清代臺灣紡織品貿易的研究，除作為背景知識外，也有相互對照的功能。尤其在 1842 年鴉片戰爭之後，開港通商以後的中國，其紡織品同樣面對洋布的衝擊，棉紡織業的生產亦受到大小不一的影響，這對於臺灣紡織品市場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值得深入討論。總之，透過分析中國紡織品發展的歷程，亦能強化對清代臺灣紡織品貿易的認識。

另一方面，近年來日本學者對於東亞經濟史的研究，也漸漸獲得重視。濱下武志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針對中國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的市場圈進行研究，其中不乏紡織品的相關討論。⁹杉原薰的《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

⁴ 林滿紅，〈貿易與清末臺灣經濟的社會變遷（1860-1895）〉，食貨月刊復刊號 9 卷 8 期，頁 20。

⁵ 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臺北：聯經出版社，1977）。

⁶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 1289—1937》，（北京：科學出版社，1963）。

⁷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2）。

⁸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研所，《上海市棉布商業》，（北京：中華書局，1979）。

⁹ 濱下武志，《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造》一書，¹⁰則試圖分析亞洲貿易的形成與構造，棉業的發展亦是其探討的核心產業之一。他提出了「綿業基軸體制」的概念，認為棉花貿易是作為「棉米交換體制」中的一環，對於整個棉花貿易在亞洲的演變，有詳盡的描述。這是從亞洲市場紡織品發展的角度而進行的研究。

至於宮田道昭的《中国の開港と沿海市場——中国近代經濟史に関する一視点》，¹¹則以北村敬直的觀點：將中國市場分割成不同性質的地區市場為基處，以便觀察中國沿海地區商品貿易的交易網絡。他認為在各式各樣的沿海商品當中，橫跨明代到清朝的中心商品有三種：分別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大眾衣料，與作為其原料的棉布、棉花；隨著飲食生活的提升，而消費數量上漲的砂糖；還有可以作為棉花或甘蔗種植時，效果佳又便宜的肥料豆餅。北方的豆餅、江南地區的棉花、與南方的砂糖，這些地區的商品透由船舶海運間的交換，在沿海地區演變成特殊的分工貿易系統，形成一個獨立的經濟圈。於是最北從東北開始，南至廣東的一個巨大沿海市場便如此產生了。宮田道昭詳盡的描述了這一個經濟圈，並分析在開港之後對中國沿海市場所造成的影響。這是日本學者以中國沿海市場為關注焦點，來討論中國沿岸地區紡織品貿易南北交換的情形。雖然此書並沒有特別提及在臺灣紡織品貿易的狀態，但當時臺灣是屬於這個巨大經濟體系中的一環，他的研究成果，讓本文可以根基於此框架上，繼續有關清代臺灣紡織品貿易的討論。

總之，雖然已有學者注意到東亞和中國的紡織品研究，但現有的研究成果並未出現針對臺灣的討論，忽略了臺灣在東亞紡織品市場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本文試圖填補這樣的空缺，對於清治時期這項龐大的進口商品進行研究。受到史料的限制，能有較多資料可以作為討論依據的，還是落在臺灣開港之後。本文便以清代開港後臺灣的紡織品貿易為研究主題，希望能重新還原自清代開港之後，臺灣紡織品貿易的歷史面貌。

¹⁰杉原薰《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京都：ミネルウア書房，1996）。

¹¹宮田道昭《中国の開港と沿海市場——中国近代經濟史に関する一視点》，（東京：東方書店，2006）。

第二節 研究回顧

有關清代臺灣紡織品貿易的研究，首先要回顧的是李祖基的《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一書¹²，此書分為四個章節，分就近代臺灣開港之前的貿易概況、臺灣開港之後主要進出口商品的貿易狀況、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的結構與特點，以及近代臺灣地方外貿對臺灣社會經濟之影響這幾個部分來討論。其中李祖基著墨最多的部分，在於開港後主要進出口商品的貿易概況這一部分。

在近代臺灣開港之前的貿易概況中，李祖基引《噶瑪蘭廳志》與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認為紡織品多由大陸運往臺灣，為主要的輸入品之一，並提及綢緞紗羅多來自江浙，福建漳州、泉州一帶所出的棉布在臺銷路也很廣。然而，李氏此章重心並非擺在紡織品的討論，而是要呈現整體臺灣開港之前的貿易概況，所以對此的書寫相當簡略，究竟在清代開港前有哪些紡織品輸往臺灣，又是從哪裡輸入，如何銷售等議題，均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對於開港之後主要進口商品的描述，李祖基則將輸入臺灣的紡織品分類為棉織品和毛織品兩大類，據他的統計毛織品僅占輸入總額的 8.3%，輸入臺灣以棉織品為主，因此討論的重心主要是放在棉織品種類與數量上的變化。李祖基認為 1880 年以前輸入臺灣的紡織品幾乎都是英國貨，包括灰襯衫布（Grey Shirtings）、白襯衫布（White Shirtings）、T 字布（T—Cloths）及土耳其紅布（Turkey Reds）等幾種。文中提到英國棉織品輸入臺灣，受到既有土布的競爭，但輸入量依然增加迅速，從 1864 年到 1871 年的統計，棉織品進口數量成長 11 倍。¹³從年平均量來看，1864~1869 年的平均量為 38168 匹，到了 1870~1879 則擴大為 114095 匹，可以更明顯的看出英國棉布進口增加的趨勢。¹⁴

另外，他也指出自 1882 年起日本棉布輸入臺灣，便迅速搶占一席之地，他

¹²李祖基，《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¹³李祖基，《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頁 51-52。

¹⁴李祖基，《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頁 57，表 9。

引用《1882~1891 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¹⁵形容日本棉布不但在與英國曼徹斯特的紡織品競爭中占上風，還日益取代土布的地位。因此他提出 1880 年後臺灣進口布數量的增加，主要是由於日本棉布大量輸入的緣故。

總體而言，李祖基對清代臺灣紡織品有了初步的描述，點出英國棉布和日本棉布的輸臺，也統計出一個整體的輸入量。雖然他試圖解釋價格的變化，還有灰襯衫布與白襯衫布在南北兩地銷量的改變，但基本上仍將全臺布類貿易視為一個整體來討論，較少針對臺灣南北兩地進行分區探討，忽略了清代臺灣地域差異的因素。

除此之外，李祖基的研究並未從開港後臺灣經濟力的改變切入，也忽視中國棉紡織發展歷程的變化，開港通商後中國土布的生產是否受到影響，並進一步牽動臺灣土布的進口，仍需進一步研究。林玉茹的〈評介李著《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一文，同樣談到此書的觀點大都將臺灣視為一個同質單位，忽略清代臺灣各地有強烈地域性的特徵；也未注意非通商口岸與大陸間的貿易往來。¹⁶然而，卻也正面肯定其最大貢獻在於對清末臺灣進口商品與市場結構有較詳盡的分析，這也是本文必須根基於李祖基的研究上，進行討論的原因。

另外一篇重要的相關論著為蔡承豪的〈從染料到染坊——17 至 19 世紀臺灣的藍靛業〉¹⁷，以時間為軸心，討論從荷西時代至十九世紀末，臺灣藍靛業的發展。其主要論述的年代，正是自 1683 至 1895 年的清領時期臺灣，與筆者想要討論的時間吻合，除文中所敘述的時代背景可供參考之外，藍靛業與布業有著相當程度的關連。蔡承豪認為臺灣藍靛輸往大陸，並非是銷往離臺灣最近的福建，因為福建本身就有產藍，且為全國首屈一指的藍靛出口省分，於是臺灣藍靛便銷往海道輻輳之地的寧波與上海，此兩區因紡織業興盛，或是地近紡織業中心，皆須從外地輸入藍靛，故成為臺灣藍靛主要的輸出地。船隻前往臺灣蒐集藍靛，或販

¹⁵臺灣銀行編，〈1882~1891 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收於《臺灣經濟史六集》，臺灣銀行研究叢刊 54 種，（臺北：中華書局，1957）。

¹⁶林玉茹，〈評介李著《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臺灣史研究》2 卷 1 期（1995），頁 226。

¹⁷蔡承豪，〈從染料到染坊——17 至 19 世紀臺灣的藍靛業〉，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售藍靛之後回返臺灣，其裝載的船貨很可能就是以紡織品為主。在區域分工的原則下，臺灣的民生用品多來自福建一帶，用以交換所產的米糖等物資。但除了這條貿易路線，透由蔡氏的研究，點出過去較為忽略的臺灣與上海、寧波等地的船舶往來路線，提供布業類商品的貿易網絡，一些新的思考空間。

再者，蔡承豪在文中指出 1870 年以後的臺灣，染布業逐漸興起，大陸地區開始將紡織品輸往臺灣用早已聞名的臺灣藍靛染色，使得不少染店紛紛聘請具有會染紅、綠等顏色的染匠來臺，¹⁸再將染好的布運往大陸銷售，洋布也不例外。顯示臺灣的紡織品貿易不單單只是進口貿易而已，經由染色加工，可以回銷回大陸。這樣的觀點在過去臺灣史的研究較少被提及。蔡承豪認為臺灣在 1870 年代以後，藍靛業的經營，便自單一的染料出口，轉為本島染坊使用藍靛染布的型態，形成「從染料到染坊」的經濟轉變。這是否意味著臺灣不僅僅是布業的銷售的地區，而成為布業的染色加工再出口的地區？這個論點仍需要更多研究成果來證實。

此外，染布業的興起亦牽動臺灣各種類型布匹的銷售，蔡承豪提及染色的方便與否，也成為布料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白襯衫布和南京土布等較灰襯衫布容易上色，日本棉布又比英國棉布更適合為臺人使用，他認為是這些布匹受到臺地民眾歡迎的因素。染布業的興起也許亦可以解釋李祖基觀察到日本棉布在 1880 年代以後輸臺遽增的現象。

張家銘與葉秋玲合著的〈臺北大稻埕布業之發展 1860—1980〉¹⁹也略有提及清代北臺灣大稻埕地區的布類貿易。作者以大稻埕較淤塞的艋舺有更良好的港口條件，商業勢力也未強至足以排斥外商的地步，而成為茶行、洋行的駐地，日漸繁華，居民消費力提升，可以接受高級品如絲織品的輸入。該文也談到清代臺灣與大陸間的區域分工貿易與洋布之輸入。不過這篇文章是以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將清季歸類為古典依賴時期，探討的時間也橫跨清領、日治、到戰後，與本文的

¹⁸.C.Imbaudel-Huart,《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臺北:臺銀經研室,1958),頁104。

¹⁹.張家銘、葉秋玲,〈臺北大稻埕布業之發展 1860—1980〉(臺北,東吳社會學報第七期,1988)頁1-38。

研究重疊部分較少，在清代部分引用的資料多為臺北市志和座談會記錄，在史料引用上較為粗略。但這篇文章貫串 1860 到 1980 大稻埕的布業發展，是一個較為全面的觀察，仍有其重要性。

總體而言，有關清代臺灣紡織品貿易的研究成果相當稀少，除了上述著作之外，其餘的資料都相當零星片段，分散於清代相關的經濟論著中。大致上也只討論到棉織品是僅次於鴉片的第二大進口商品，並沒有進一步深入分析。因此，本文將針對清代開港後臺灣進口紡織品的種類、數量、輸入國家等方向進行討論，並分析其與土布間彼此競爭的情形。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將運用歷史研究方法中的歸納、比較、綜合和分析等步驟，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資料後，再逐一進行對照與討論的工作。透過文獻史料的分析，與海關檔案中的統計數據相互對照，期待能以此窺探清代開港後臺灣紡織品的貿易情形。本節將針對名詞定義與時間斷限、研究材料分析、及章節安排等內容，來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

一、名詞定義與時間斷限

本文中的紡織品一詞，泛指絲絹、綢緞、棉布、麻布等織品，甚至也包含皮衣、毯子等毛皮織品。整體而言，跟衣物相關的織品都包含在紡織品一詞中。本文雖然試圖全盤討論所有的紡織品，但礙於資料與篇幅的限制，討論的焦點主要還是放在棉織品的部份，也就是棉布、棉紗的貿易，其餘的紡織品則用來作為輔助討論。

本文在時間斷限方面，討論的範圍將從 1683 年清朝領臺開始，到 1895 年清

朝割讓臺灣為止，前後約 210 年左右的時間。其中再以 1860 年臺灣開港為切分點，將其區分為清朝統治前期，和清朝統治後期兩個時段來討論。原因在於開港後的臺灣，其布類貿易有了洋布的加入而產生變化，整體臺灣的經濟活動也因開港通商有了大幅度的改變。開港之後由於逐漸形成南北兩大貿易市場圈的經濟體系，本文也將分別討論南臺灣和北臺灣兩地紡織品貿易發展的情形。

二、研究材料分析

本文的研究材料中，主要運用的史料為《海關檔案》與英國《領事報告》這兩項資料。引用的《海關檔案》以 1997 年由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所整理出版的《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為主。²⁰《領事報告》引用的版本為，Robert L. Jarman 於 1997 年所編輯的《臺灣政經報告》（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²¹

臺灣於淡水、打狗兩地設立海關，打狗關自 1864 年起即有貿易統計資料，淡水關至 1865 年始有貿易統計，此後兩關每年均有貿易統計。不過 1895 的統計只到 6 月，因此在使用上需稍加留意。臺灣的兩個海關至 1875 年才有文字敘述的貿易報告，打狗海關資料內容以南部臺灣為主，1891 年以後改稱為臺南海關資料，淡水海關資料則記錄北臺灣的貿易情況。²²臺灣除了歷年向上海總稅務司提出的統計與報告之外，亦有 1882~1891 年兩個海關的十年報告書，同樣也是海關檔案中重要的研究材料。海關進出口貨物的貿易資料，可分析出商品長時間的貿易消長；海關的年度報告記載了當時發生的事件與時人的看法，有助於長期觀察開港後紡織品的貿易情形。雖然海關檔案資料有其侷限性，像是僅記錄條約港的貿易內容，且海關統計中幾乎不包含中式帆船貿易，只有部分對中式帆船往

²⁰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²¹ Robert L. Jarman,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Slough: Archive Editions, 1997).

²²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VIII。

來的估算和觀察等，但仍是研究開港後臺灣貿易重要的史料。

英國《領事報告》分政務報告及商務報告兩類，本文所採用的是商務報告。《領事報告》商務部分有關臺灣者，又區分為分《臺灣領事報告》及《淡水領事報告》。前者為打狗和安平兩地的合併報告，稱為 Taiwan；後者同樣是合併北部淡水和雞籠的報告，稱為 Tamsui。這些資料係兩地英國領事或副領事歷年向北京英國領事所遞交，再轉呈英國國會的報告。領事報告中對於當年度重要的貿易狀況，也都有詳盡的描述。雖然由英國人觀察的角度記錄，多少具有一些英國本位的想法，或是推論的侷限，有時甚至會出現前後任領事，對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而產生前後矛盾的說詞，這些是研究者在使用上需注意的部分。但透過這項材料，還是可以勾勒出開港後臺灣商業貿易的情景，對紡織品的研究有所助益。

除了上述兩項重要的材料之外，對於開港前紡織品的背景研究，主要是以臺灣文獻檔案叢刊所出版的一系列的清代方志為主體，參雜些許遊記、文集等作品。透過這些方志的解析與比對，試圖描繪出開港前清代紡織品貿易的脈絡。而描述北臺灣淡水、竹塹地區的《淡新檔案》，是清代臺灣淡水廳與新竹縣的官方檔案資料，亦是清領時期臺灣府縣檔案唯一現存者，是研究清代社會經濟方面重要的史料。其中關於財產侵奪方面的案件，不乏有偷盜紡織品的案例，可作為研究北臺灣紡織品貿易的參考。此外，日治初期的調查報告書，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亦能輔助了解清領末期臺灣產業的概況。

三、章節安排

本文除第一章為緒論，第五章為結論之外，各章節安排如下：

第二章主要在介紹，清代開港前紡織品貿易形成的背景及其發展。本章先從清初治理臺灣的政策談起，討論清廷在臺施行的各項禁令與措施，在臺灣形成怎樣的社會經濟型態？接著從區域分工的角度，討論臺灣與大陸間貿易的情形。然後介紹清代開港前，臺灣紡織品的貿易與銷售情形。最後再從移墾社會的角度，

討論紡織品在移墾社會中的價值。

第三章討論的主題，是開港後紡織品貿易的競爭與發展。本章先按照時間順序，依序介紹進入臺灣市場的各种紡織品，並試圖以時間劃分出開港後紡織品貿易的分期。將這段時間區分為英國紡織品獨霸洋布時期（1860~1884），與東西洋布與土布競爭時期（1885~1895），並討論兩個時期中紡織品的貿易與競爭情況。最後再以總體的視野，討論開港後全臺外國紡織品貿易的發展。

第四章則不再將臺灣視為一個單一整體，而將之區分為北部市場與南部市場兩個區塊，分別討論北臺灣與南臺灣紡織品的貿易情形。北部市場與南部市場紡織品貿易的興衰，受到兩地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茶和糖的影響。茶和糖出口貿易的成長或衰退，會導致南北市場中紡織品貿易的連動，而形成兩地不同的發展趨勢。本章最後討論紡織品市場的南北差異。



第二章 區域分工與開港前紡織品貿易的展開

1683 年，施琅率軍平臺，隔年正式收歸清帝國版圖，臺灣進入清朝統治時期。從 1684 年到 1860 年臺灣開港前，中國大陸成為清朝統治前期臺灣主要的貿易對象。然而在此之前，不論是荷蘭統治時期，東印度公司試圖將臺灣建立成東亞貿易的轉運站；¹或是鄭氏王國時期，日本成為臺灣主要的貿易伙伴，砂糖與鹿皮等物產大量輸往日本賺取利潤，²臺灣的貿易活動，一直具有高度國際化的特性。只是這樣的情形，在清朝統治勢力進入臺灣之後，有了明顯的轉變。臺灣從高度國際化的市場，轉為與中國大陸形成區域分工的狀態。本章就是要說明，在此一脈絡之下，作為民生必需品的紡織品，為何不自行製作而需要從大陸地區進口到臺灣？臺灣紡織品貿易又是如何展開？紡織品在臺灣人的眼中，又具有怎樣的價值呢？

第一節 臺灣與大陸區域分工貿易的形成

清朝統治臺灣歷時 212 年，從貿易史的角度而言，以 1860 年臺灣開港為分界，1684~1860 年為清朝統治的前期（以下簡稱清治前期），1860~1895 年為清朝統治後期（以下簡稱清治後期）。³本節以清治前期為討論核心，從清初臺灣的社會經濟情況談起，清朝政府的統治政策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臺灣為何與中國大陸發展出區域分工的貿易型態，而非延續過去的國際貿易？臺灣與中國大陸港口對港口的貿易體系又是怎樣出現的？

¹ 曹永和，〈十七世紀作為東亞轉運站的臺灣〉，收於《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 年），頁 123。

² 蔡郁蘋，〈鄭氏時期臺灣對日本貿易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9-37。有關鄭氏王國的討論，亦可參照朱德蘭、鄭瑞明等學者的研究。

³ 以 1860 為斷線主要是開港之後，臺灣的經貿型態又有了很大的轉變，國際貿易再度活絡，紡織品貿易的情形，也跟開港前有很大的不同。故以此為切分點，將清代劃分為兩個時期。

一、清初對臺統治政策與臺灣的社會經濟型態

清朝攻占臺灣，對於臺灣的棄留問題產生爭議。清揮軍入臺，主要是為了消滅反清的勢力，一開始並沒有長期統治的打算，加上臺灣孤懸海外，不易治理，故多數朝臣主張棄守臺灣。認為應「遷其人、棄其地」，就不會再有所謂「恃為窟穴，倚險負固，飄突彌常」的現象產生。⁴即使是康熙皇帝，也說出「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之語。⁵這些都顯示出清廷對臺的不了解，與對統治臺灣興趣缺缺的情形。唯獨施琅則力排眾議，在其〈恭陳臺灣棄留疏〉中提到：

臺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口迂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薄，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籐、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⁶

施琅指出臺灣沃野千里、物產富饒，加以戰略地位重要，可作為東南各省的屏障，故主張保留臺灣。最終康熙採納施琅的建議，將臺灣正式納入清朝版圖。即使保留臺灣，其統治目的還是在於鞏固東南海防，與防止臺灣民眾叛亂，這使得清廷在治理臺灣上的政策上，表現出消極與防範的態度。這種「為防臺而治臺」的政策取向，以「禁海封山」的措施為骨幹，對於閩粵移民的渡臺及生業活動有著層層規範，限制了臺灣的發展。⁷不僅如此，為防止駐臺官兵擁兵自重，不服中央

⁴ 《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111，康熙 22 年 7 月丙申條，頁 10。轉引自黃秀正，〈清代治臺政策的再檢討：以渡臺禁令為例〉，收於《文史學報》20 期，（臺北，中興大學，1990），頁 52。

⁵ 《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111，康熙 22 年 10 月丁未條，頁 21。轉引自黃秀正，〈清代治臺政策的再檢討：以渡臺禁令為例〉，收於《文史學報》20 期，頁 52。

⁶ 施琅，〈恭陳臺灣棄留疏〉，收於《靖海記事》下卷，臺灣文獻叢刊第 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59-60。

⁷ 戴寶村，《臺灣政治史》，（臺北：五南，2006），頁 82。

控制，制訂了一系列的防範措施，包含官員任期短暫且不得攜眷來臺，設置三年輪調的班兵制度，更不許臺灣築城。這種種作為除了顯現出清朝統治的消極，也導致了清廷對臺控制力薄弱的窘境。⁸

雖然清廷統治初期，並不積極鼓勵人民來臺開發，甚至認為偷渡來臺者多是在中國無恆產、遊手好閒之徒，會影響臺灣社會的安定。⁹不過，自十七世紀下半葉起，中國人口大量增加，形成社會壓力，必須向外移出，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之下，仍有許多人民渡海來臺拓墾，尤其是福、廣一帶由於地利之便，更是大量移入臺灣。乾隆年間的《重修臺灣府志》中就記載到：

竊照臺郡當初闢之區，地廣人稀，菽粟有餘，原稱產米之地。自數十年以來，土著之生齒既繁，閩、廣之梯航日眾；綜稽簿籍，每歲以十數萬計。

10

雖然臺灣的人口增加了，但由於渡臺禁令中，有規定渡臺者，不得攜帶家眷，業經渡臺者，亦不准招致的要求。這其實還是從防範臺民叛亂的角度出發，此項政策造成臺灣男女人口比例懸殊，羅漢腳的問題日益嚴重，他們彼此之間，常成群結黨以相互照料，清治前期臺灣的民變和械鬥頻傳，跟人口比例失衡有一定的關連性。《平臺紀略》就提到：

客莊居民，從無眷屬。合各府、各縣數十萬之傾側無賴遊手群萃其中，無家室宗族之系累，欲其不逞也難矣。¹¹

統計臺灣一府，惟中路臺邑所屬，有夫妻子女之人民。自北路諸羅、彰化以上，淡水、雞籠山後千有餘里，通共婦女不及數百人；南路鳳山、新園、

⁸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臺灣史》，（臺北：五南，2002），頁 83-84。

⁹ 莊金德，〈清初嚴禁沿海人民偷渡來臺始末〉，《臺灣文獻》14 卷 3 期（1964），頁 1。

¹⁰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 10，臺灣文獻叢刊第 66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323。

¹¹ 藍鼎元，《平臺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52。

瑯橋以下四五百里，婦女亦不及數百人。合各府各縣之傾側無賴，群聚至數百萬人，無父母妻子宗族之繫累，似不可不為籌畫者也。¹²

上述的資料顯示出，臺灣婦女人口稀少，來臺拓墾者多無宗室之累，容易逞兇鬥狠，因而衝突不斷。黃秀政在其〈清代治臺政策的再檢討：以渡臺禁令為例〉一文同樣談到這樣的情形，他認為渡臺禁令對臺灣的影響有延遲臺灣的開發、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及形成偷渡之風這三點。¹³其中所謂嚴重的社會問題，是指由於渡臺禁令影響了當時的人口結構與社會風氣，因此導致了在臺灣的漢人多為年輕力壯之男子，老弱婦孺絕少，人口組合異常。由於男女比例懸殊，婦女身價高漲，婚姻論財遂不能免，貧窮之子不易婚媾。他認為清代臺灣社會羅漢腳充斥，當與此風氣有關。¹⁴

除了渡臺禁令造成臺灣男多女少的現象之外，臺灣自康熙年間納入清朝版圖之後，發展至十九世紀初期，雖然漢人拓墾和居住的範圍日益擴張，但其社會型態仍多停留在移墾的狀態。移墾因為是冒險的行為，加上勞動力的需求，故前往移墾者多是年輕力壯的成年男子，通常單身者前往者多，舉家同遷者少。¹⁵這也是清治前期臺灣男女比例不均的原因之一。

也由於臺灣在清治前期多半處於移墾社會的型態，因此經濟活動仍以拓墾荒地，種植農作為主。清代臺灣平原地區的開墾方向是由南而北前進，南部的臺灣、鳳山與諸羅這三縣的拓墾較早，雍正末年幾近開發完全；中部的彰化縣歷經乾隆、嘉慶年間也大致墾成；北部的淡水廳大部分土地則在乾隆末年開闢完成；東北部的噶瑪蘭廳遲至道光年間才大規模開墾。隨著田園面積漸廣，稻米和蔗糖的產量也大為增加，成為清治前期臺灣外銷中國大陸的主要貿易商品。¹⁶

總而言之，清治初期的臺灣，受到清朝政府政策的影響，發展受到一定程度

¹²藍鼎元，《平臺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4種，頁67。

¹³黃秀政，〈清代治臺政策的再檢討：以渡臺禁令為例〉，收於《文史學報》20期，頁57-60。

¹⁴黃秀政，〈清代治臺政策的再檢討：以渡臺禁令為例〉，頁58-59。

¹⁵李國祁，〈清代臺灣社會的轉型〉，《中華學報》5卷2期（1978），頁131-133。

¹⁶薛化元等編，《臺灣貿易史》，（臺北：外貿協會，2008），頁84-85。

的限制，也形成了臺灣社會男多女少的現象。單身渡臺者常會成群結黨，為了利益而產生衝突，因此民變和械鬥頻傳，造成清治初期臺灣社會的不安。而來臺謀生的民眾，以拓墾為主要的經濟活動，土地開發的面積逐漸擴張，農產品的產量也大幅成長，這是清治前期臺灣的社會經濟概況。

二、農產品與民生用品交換體系的產生

臺灣在 1860 年開港通商之前，清帝國消極的統治政策，也表現在對外貿易上，因此不容許臺灣人民與外國商人從事包括貿易在內的往來，不過，臺灣與大陸間的貿易還是得以合法進行。¹⁷所謂合法的進行，就是臺灣設府城的港口鹿耳門，可以與福建的港口廈門通商，全臺的船隻必須先行駛至鹿耳門，才能與大陸的廈門交易，這就是清初的單一正口對渡。加上中國的沿岸禁海令受鄭氏降清而解除，船隻可以直接赴日貿易，臺灣轉運的功能式微。¹⁸這些政策自然衝擊了臺灣過去蓬勃的國際性貿易，中國因此成為臺灣主要的貿易對象。那麼，臺灣與大陸之間的貿易情況又是如何呢？

正如前述，清治前期由於統治政策的影響，加上以拓墾為主的經濟活動的緣故，造成臺灣男多女少的社會型態，這樣的情形，自然不利於手工業的興起。拿中國手工業的發展為例，儘管歷朝歷代不儘相同，但明中期以前，多半是以官府經營的手工業為主，十六世紀以後，民營手工業因政府的限制減少，加上技術的提升，生產力大增。十六、十七世紀中國的手工業，在農村以副業的形式存在，用來補足農業收入的不足，婦女、小孩都能參與生產，城市中則是由專業技藝工匠所組成的作坊。兩者所從事手工業的類別及生產的產品有很大的差異，農村副業主要是以紡織業為主，城市作坊除紡織業外，另有燒造、採礦、冶鑄、製鹽、

¹⁷陳國棟，〈臺灣歷史上的貿易與航運〉，收於《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2005），頁 76。

¹⁸薛化元等編，《臺灣貿易史》，頁 82。

造紙、造船、榨油等。¹⁹婦女人口不足，手工業要以農村副業的形式在臺灣生根，就顯得相當困難，加上來臺者多從事農業開墾，專業工匠不足，自然也無法支撐城市的作坊興起。這使得清治前期的臺灣，手工業一直不發達，隨著人口的增加，所需的民生用品，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

根據王業鍵的研究，將清代的中國以經濟開發的程度劃分為三個區域，「已開發區域」、「開發中區域」和「未開發區域」。「已開發區域」人口與土地的比例很高，農業資源已經大量開發，手工業也很發達；「開發中區域」人口與土地的比例較低，自然資源逐步開發中；「未開發區域」人口與土地比例極低，經濟型態以游牧為主。「已開發區域」會向「開發中區域」輸出资本、工業產品、技術知識、以及給予財政上的援助，後者則為了交換物資與勞務的進口，則向前者輸出糧食及經濟作物等產品。²⁰臺灣隸屬於開發中區域，會與已開發區的大陸沿海地區進行交易，輸出米、糖、油等農產品，輸入紡織品、紙、木材、五金瓷器等手工業產品及其他日用品，遂形成臺灣與大陸間，一方供應農產品，一方供應民生用品的「區域分工」現象產生。

除此之外，臺灣的農產品一直以來就有商業化的傾向。根據溫振華的研究，他認為從土地的開墾、水利的投資、經濟作物的種植、以及商業的發達，反應了臺灣漢人濃厚的謀利冒險精神。²¹所以康熙年間臺灣知府高拱乾所修的臺灣府志中，就記載了當時人民大量種蔗不種稻的情形：

偶見上年糖價稍長，惟利是趨。舊歲種蔗，已三倍於往昔；今歲種蔗，竟十倍於舊年。叢爾之區，力農止有此數，分一人之力於園，即少一人之力於田。²²

¹⁹羅麗馨，《十六、十七世紀手工業的生產發達》，（臺北：稻香，1997），頁 1-2。

²⁰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文集》，（臺北：稻鄉，2003），頁 8-16。

²¹溫振華，〈清代臺灣漢人的企業精神〉，收於《師大歷史學報》9期，（臺北：師大，1981）頁 25。

²²高拱乾，《臺灣府志》卷 10，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250。

當時高拱乾擔憂臺灣稻米產量，不足以支應軍糧與民食，應該要盡力種稻來充實倉儲，預防歲歉。但人民卻因為糖價的上漲，種蔗不種稻，顯現出高度的市場趨向。因為當時糖為臺灣南部出口大宗，可以有更好的獲利，因此臺灣人民才會選擇種植甘蔗。

不過清治前期，臺米出口也同樣重要。早期由於清廷擔憂臺灣存糧不足，因此禁止臺郡米穀之販運。但雍正之後土地開墾日廣，米穀產量提高，雍正四年（1726）閩浙總督高其倬乃上奏〈請開臺灣米禁疏〉就寫道：

臺灣地廣民稀，所出之米，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用。民人用力耕田，固為自身食用，亦圖賣米換錢。一行禁止，則囤積廢為無用，既不便於臺灣，又不便於泉、漳。究竟泉、漳之民，勢不得不買，臺灣之民，亦勢不能不賣。查禁雖嚴，不過徒生官役索賄私放之弊。²³

清廷因此解除禁令，臺米出口日多。自雍正三年臺運開始後，年年均有臺米運送至中國。根據王世慶的研究，臺米的銷售區域，大致上以福建省為主，尤其是漳州、泉州與福州最多，浙江、天津、廣東等地次之。蓋因閩省山多米少，且臺灣隸屬福建省轄下，其米糧出口除經准許不得外銷他省之故。就購買性質而言，又分兵米、眷米、糴米、商販米、走私米等。前三者為例運，商販米僅限請准後始可出口，而年年之走私出口者亦達可觀的數目。²⁴林玉茹的研究則認為臺運制度的施行，更加深化「私口」問題。由於臺運米穀主要由民間商船承運，而且按照船隻種類或是樑頭大小來決定載運數量，儘管官方會給予商船運米腳價銀，卻因臺運所產生的眾多弊端，使得商船逐漸規避正口，轉往中、北部小港走私貿易。²⁵米的走私貿易亦逐漸導致兩岸正口對渡政策的鬆動，為下一小節討論臺灣與大

²³高其倬，〈請開臺灣米禁疏〉，收於《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叢刊第84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頁418。

²⁴王世慶，〈清代臺灣的米產與外銷〉，收於《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1994），頁119-120。

²⁵林玉茹，〈由私口到小口：晚清臺灣地域性港口對外貿易的開放〉，頁7，會議論文。

陸間港對港貿易形成的原因之一。

由前述的討論，可知米和糖都是清治前期臺灣重要的出口商品，尤其是米出口以福建為主，使得臺灣與福建間的貿易關係更為緊密，兩地間的區域分工更加活絡。臺灣輸出米糖等經濟作物，換取對岸手工業製品這樣的貿易模式興盛，也可能是因為移民願渡海來臺開墾，本來就有較強烈改善生活，或謀取經濟利益的動機，因此重商趨利，農產品必需走向商品化，以獲得最大收益。這或許也是農產品與民生用品交換體系產生的原因，因為這樣的分工模式最經濟，所付出的機會成本最小。

總之，臺灣收歸清朝版圖之後，貿易型態有了轉變。清治前期臺灣的貿易往來，以大陸地區為主，貿易的發展，則逐漸形成以臺灣的稻米、蔗糖等農產品，交換大陸所生產的手工業製品與日常用品的區域分工現象，形成農產品與民生用品的交換體系。

三、港對港貿易系統的成型

當臺灣和大陸之間區域分工的原則逐漸被確立之後，其貿易活動又將如何展開呢？臺灣和大陸間的貿易往來，需要透過港口貿易來維繫，而臺灣本島內部的經濟活動，靠的也是港口的運輸。臺灣西部由於南北的陸路交通受到河川阻隔的影響，往來不便，因此南北向的運輸，也常常靠海運來聯繫。清廷對於臺灣港口的管理政策，基本上南北港口之間的沿岸貿易，管制較不嚴格，但是對於臺灣與大陸地區的貿易往來，則以對渡口岸的形式來管理，只開放特定的港口，作為臺灣和大陸之間貿易往來的窗口，以利於稽查和徵稅。²⁶

臺灣最初只開放鹿耳門一個口岸和廈門對渡，乾隆年間隨著臺灣中、北部的積極拓墾，米的生產量大增，直接出口米到福建地區交換手工製品，符合兩地市場利益，清廷遂於乾隆 49 年（1784）和 53 年（1788），開放中部的鹿港與福建

²⁶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臺北，知書房，1996），頁 71。

泉州蚶江，北部的八里坌與福州的五虎門直接對渡，形成北、中、南三個正口與福建對渡的狀態。其後，由於噶瑪蘭的拓墾完成，再開烏石港為正口，與福州五虎門對渡。另一方面，臺灣中部發展迅速，鹿港不敷使用，於是加開海豐港，形成五口對渡的情形。²⁷

臺灣港口的控制，從清初至道光初年，為了海防控制和臺運之需，兩岸正口對渡政策大抵較嚴格執行。道光中期之後，清廷對於沿海港口的管理漸趨鬆弛，正口貿易網絡也日漸擴大。隨著全臺於嘉慶、道光年間逐步開墾完成，臺灣各地的地域經濟系統逐漸成形，因此除了五個正口作為各區域的吞吐口之外，其下又逐漸發展出小的吞吐港口，如竹塹港、中港、後壠港、大安港、北港、鹽水港、打狗港、東港等，這些港口除了按照官方規定透過最接近的正口港進出口商品之外，其實已經常常私下和大陸進行直接的貿易往來。²⁸道光年間的《東槎紀略》就記載到：

臺之門戶，南路為鹿耳門，北路為鹿港、為八里坌，此正口也。其私口則鳳有東港、打鼓港，嘉有笨港，彰有五條港，淡水有大甲、中港、椿稍、後壠、竹塹、大坵，噶瑪蘭有烏石港，皆商艘絡繹。至於沿海僻靜，港汊紛岐，在在可以偷渡。²⁹

《廈門志》中也這樣敘述到：

各船不歸正口，私口偷越者多。如臺灣淡水之大坵、後壠、中港、竹塹、南嵌、大雞籠、彰化之水裏、嘉義之笨港、猴樹、鹽水港、臺邑之大港、鳳山之東港、茄藤、打鼓、蜆港，俱為私口，例禁船隻出入。內地晉江之祥芝、永寧、圍頭、古浮、深滬各澳、惠安之獺窟、崇武、臭塗各澳，矇

²⁷林玉茹，〈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臺灣史研究》17卷2期（2010），頁6-7。

²⁸林玉茹，〈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頁8-9。

²⁹姚瑩，《東槎紀略》卷4，臺灣文獻叢刊第7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111。

領漁船小照置造船隻，潛赴臺地各私口裝載貨物，俱不由正口掛驗，無從稽查、無從配穀，俗謂之偏港船。同一往來貿販營生，乃彼得巧避官穀，獲利倍於他船，無怪正口各船心懷不服。³⁰

這些被稱為私口的小港，常會繞過正口和大陸直接進行交易，因為可以不被稽查和抽稅，所以容易有較高的獲利，往來的船舶也越來越多。之後隨著港口政策逐漸寬鬆、因應各地經濟發展與民生用品之需，以及地方衙門可以徵收船隻規費等因素，使得道光末年至同治年間，地方廳縣逐漸開放沿海私口與大陸內地港口進行貿易。另一方面，道光 23 年（1843）清廷為避免臺灣走私漏稅之弊，亦正式開放浙江的寧波、乍浦與臺灣直接貿易。打破了清初以來臺灣與福建正口對渡的貿易制度，臺灣對外貿易的地點，不再限制於福建地區，與華中地區的直接貿易成為合法的貿易路徑。³¹

除了受到清廷港口管理政策的影響，臺灣的移民拓墾多半是從港口登陸，港口周邊地區常成為最早開墾之地，墾闢之後農產品的運銷及生活用品等物資的流通，也是透由港口出入。加上地理條件的限制，受到河川阻隔的影響，南北的陸運交通受到阻礙，臺灣西部的平原與丘陵地帶被切割成較封閉的經濟體系，交通困難使得每一分隔地域的貨品均向海岸的港口市鎮集中，以港口市鎮為據點形成交易圈，各自與對岸進行貿易。³²

這使得清治前期臺灣並未形成單一的市場體系，而是以港口市鎮作為商業據點，逐漸發展出獨立的市場圈，³³各自與中國大陸的對渡口岸進行貿易往來，形成港對港的貿易系統。港對港貿易系統的出現，符合臺灣與大陸區域分工的原則，透由港口的航運貿易，各地輸出米穀、砂糖等商品化農作，交換以紡織品為主的手工業品與日常用品，形成兩地之間繁盛的船舶貿易。

³⁰周凱，《廈門志》卷 6，臺灣文獻叢刊第 95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頁 191-192。

³¹林玉茹，〈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頁 8-11。

³²戴寶村，〈近代臺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據時期〉，臺北：師大歷史所博士論文（1988）頁 28。

³³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臺北：聯經，2000），第二章。

大體而言，清廷的統治政策對清治前期的臺灣，造成深遠的影響。不論是渡臺禁令的限制，防臺而治臺的政策取向，都限制了臺灣的發展，也形成男女比例不均，械鬥衝突不斷的臺灣社會。經濟活動方面，隨著拓墾面積的增加，農產品的產量也逐漸提升，在區域分工的原則之下，臺灣的農產品輸往大陸，換取所需的民生用品，具有濃厚的商品特性。港口貿易也隨之興起，加上對渡政策的限制，逐漸形成港對港的貿易體系，臺灣過去長期發展的國際性貿易頓挫，轉為與中國大陸建立起緊密的貿易分工模式。

第二節 開港前臺灣的紡織品貿易

這一節要討論的主題是，身為民生必需品與手工業製品一環的紡織品，在開港前的臺灣，是如何貿易的？臺灣的紡織品，在清治前期一直是最大宗的輸入商品，在區域分工的原則底下，跟其他民生用品一樣，由大陸地區進口來臺。在清治前期的臺灣，紡織品亦跟隨拓墾的腳步，各地經濟發展的脈動，與港對港貿易系統的成型，逐漸散佈至全臺各地。然而，令人好奇的是，臺灣的紡織品貿易，在中國的棉布交易市場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銷售的情形又是如何？至於輸入臺灣的紡織品，有哪些類型？這些問題是本節討論的核心。

一、開港前臺灣與福建、華中的紡織品貿易

臺灣的紡織品，一直以來都是需要透過貿易進口到臺灣。施琅在其〈恭陳臺灣棄留疏〉中就有提到，臺灣具備優越的自然條件、物產豐富，所欠缺的只有布帛而已。³⁴而臺灣所欠缺的布匹，在清朝統治勢力進入臺灣之前，是透過國際性的貿易輸入臺灣的。

³⁴施琅，《靖海記事》下卷，臺灣文獻叢刊第13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60。

臺灣……上通日本，下達呂宋、廣南等處，火藥軍器之需，布帛服用之物，貿易備具。³⁵

當臺灣進入清治時期，原有布帛輸入的國際性貿易路線逐漸沒落，臺灣的布類貿易面對新的局勢。臺灣的紡織品，在兩岸區域分工的原則下，多半是由大陸進口，康熙年間的《諸羅縣志》中就寫到：「凡絲布錦繡之屬，皆自內地。有出於土番者寥寥，且不堪用。」³⁶這雖然有可能是清朝官員的偏見，但即使有少量堪用的番布，也不足以供應臺灣之所需，因此清治前期臺灣的紡織品，多源自大陸地區。乾隆年間的《海東札記》則寫到從大陸進口紡織品的利益可觀，像是文綺、大布等來自大陸的布匹，運送到臺灣販售，甚至可以賣出一倍以上的價格。

37

雖有施琅等朝臣認為，以臺灣擁有部分紡織品原料，應該可以自行從事生產紡織品的生產，這也是一般清代臺灣官員經常宣稱的政策，康熙年間的《臺灣府志》中就寫到：「棉布、苧布、麻布，以上三邑俱有。」³⁸不過，即使有這樣的情形，數量也不會太大，一方面是臺灣的農產品具有濃厚的商品性格，在區域分工的原則下，以臺灣生產的農產品去交換紡織品，比較符合經濟利益。另一方面，臺灣雖然可以產棉、麻等部分原料，但由於缺少女性勞動力，所以很難發展出像大陸地區一樣的農村與手工業結合的形式。即使到了男女比例漸趨均衡的時期，紡織品早已經習慣由大陸地區供應，所以臺灣社會也沒有鼓勵婦女從事紡織。道光年間的《彰化縣志》中就記錄下當時的清況：

惟蠶事未興，紡織尚少，近有挈女眷來臺者，頗知紡織機布，但皆買棉之

³⁵ 施琅，《靖海記事》上卷，臺灣文獻叢刊第 13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1。

³⁶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 17，文獻叢刊第 105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頁 494。

³⁷ 朱景英，《海東札記》卷 3，臺灣文獻叢刊第 19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47。

³⁸ 蔣毓英，《臺灣府志》卷 7，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頁 200。

彈好者為之。若土產吉貝甚多，皆隨風飄散，視為無用。又有絲棉，任其開花結實，終無收用。³⁹

也就是說，即使有了女性勞動力，以農村副業型態手工業，在臺灣還是沒有什麼發展，紡織品還是從大陸輸入。因此，就須要了解中國棉布沿岸貿易的概況，才能更清楚紡織品是怎樣輸入臺灣的。根據宮田道昭的研究指出，在中國各地，由於地區之間的分工而存在著各式各樣商品交換的關係。這些交換關係不但沒有被分割開來，反而互相牽連起來形成一個更龐大的市場。

他觀察到清代中國的沿海，有一個彼此形成交換體系的廣大市場，北起最北部東北、山東，經過作為中樞的江南地區，南至福建、廣東一帶。這個巨大的市場主要交換的中心商品是下列三項：可以用來製作大眾衣物的棉布和原料棉花，隨著飲食生活的提升而消費量上漲的砂糖，以及可以幫助棉花和甘蔗種植的低廉肥料豆餅這三種商品。此三項商品的產區分別是北方輸出豆餅、江南種植棉花、和南方生產砂糖，透過帆船貿易，在中國沿海形成一個廣大的交換市場。⁴⁰

在這樣的交換體系之下，福建、廣東盛產的砂糖，會經由海上貿易送到沿海地區，大多數送往江南地區進行交換。江南地區則是從明代開始發展農村棉紡織工業，尤其是以太湖以東的松江府為中心向外擴展，由於原料上的需求，稻米的生產受到壓制，而棉花的栽種則廣泛的盛行起來。於是棉花、棉絲、棉布等開始被當成商品，向全國各地輸出。福建、廣東的商船裝滿砂糖前往江南，然後從那邊買回的主要是棉花，而非棉布，這些棉花是做為華南農村棉紡織工業的原料用途。⁴¹

透由宮田道昭的研究，我們可以得知福建、廣東一帶向江南地區輸出砂糖，並買回棉花做為原料，並加工成各式棉布。這些棉布除了當地自用之外，在對渡政策的影響之下，由於臺灣和福建的區域分工，也會將此紡織品輸往臺灣，交換

³⁹周璽，《彰化縣志》卷9，臺灣文獻叢刊第156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頁291。

⁴⁰宮田道昭，《中國の開港と沿海市場》，（東京：東方書店，2006），頁18。

⁴¹宮田道昭，《中國の開港と沿海市場》，頁19。

臺灣生產的農產品。道光年間的《噶瑪蘭廳志》就記錄著「其來自漳、泉者，有池布、眉布、井布、金絨布。」⁴²由此可以知道清治前期臺灣的紡織品，有一部份是由福建地區而來。

另一方面，臺灣也被納入閩粵與華中砂糖和棉的交換系統中，臺灣的砂糖會向華中地區輸出，或許是透由對渡口岸輾轉北上至江、浙地區，不過也可能是用走私偷渡的方式，利用信風直接前往華中地區貿易。臺灣的砂糖被運往江、浙一帶銷售，之後再購買臺灣所需的絲綢、布料、雜貨、日用品等等。華中地區的紡織業自明清以來持續發達，有衣被天下之稱，據大陸研究者的推估，以中國人口之眾，在十六、七世紀時，松江棉布的供應量，恐怕還超越英國棉織品在工業革命初期的總外銷量。⁴³臺灣的紡織品有一部分便是此地供應，與福建、廣東和華中地區貿易不同的是，由於臺灣的手工業並不發達，因此購買回臺的紡織品，多是成品而非需要再加工的原料。咸豐三年（1853）的《噶瑪蘭廳志》中描述了當時商人透過信風前往華中地區交易的情景：

絲羅綾緞，則資於江、浙。每春夏間，南風盛發，兩晝夜舟可抵浙之四明、鎮海、乍浦，蘇之上海。惟售番鐵，不裝回貨。至末幫近冬，北風將起，始到蘇裝載綢疋、羊皮、雜貨，率以為恆。⁴⁴

雖然這一則史料引的並非是盛產砂糖的南臺灣，但透由夏季和冬季風向的轉變，帆船貿易就是利用這些信風南北往來於臺灣和大陸之間，（尤其是需要向北航行，或向南行駛的貿易。）臺灣與華中地區的砂糖和紡織品交換亦是如此，往來的船舶數量應該也相當龐大。道光年間姚瑩的《東槎紀略》中也提及臺灣商船的南北貿易往來：「商船自臺載貨至寧波、上海、膠州、天津，遠者或至盛京，

⁴²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5，臺灣文獻叢刊第 160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頁 199。

⁴³趙岡、陳鐘毅著，《中國棉業史》，（臺北，聯經，1977），頁 59。

⁴⁴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11，臺灣文獻叢刊第 160 種，頁 196。

然後還閩，往返經半年以上。」⁴⁵這樣頻繁貿易往來的情形，才會迫使清廷終於在道光 23 年正式開放浙江的寧波、乍浦與臺灣直接貿易，來避免走私漏稅的弊病。

至於有關當時臺灣紡織品的輸入項目，早在康熙末年黃叔瓚《臺海使槎錄》的赤崁筆談中，就有這一段詳盡記載，摘引如下：

海船多漳、泉商賈，貿易於漳州，則載絲線、漳紗、翦絨、紙料、煙、布、草席、磚瓦、小杉料、鼎鑪、雨傘、柑、柚、青果、橘餅、柿餅，泉州則載磁器、紙張，興化則載杉板、磚瓦，福州則載大小杉料、乾筍、香菰，建甯則載茶；回時載米、麥、菽、豆、黑白糖錫、番薯、鹿肉售於廈門諸海口。或載糖、靛、魚翅至上海，小艇撥運姑蘇行市，船回則載布匹、紗緞、桌綿、涼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至浙江則載綾羅、綿綢、縐紗、湖帕、絨線；甯波則載棉花、草席；至山東販賣粗細碗碟、杉枋、糖、紙、胡椒、蘇木，回日則載白蠟、紫草、藥材、繭綢、麥、豆、鹽、肉、紅棗、核桃、柿餅；關東販賣烏茶、黃茶、綢緞、布匹、碗、紙、糖、麵、胡椒、蘇木，回日則載藥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參、銀魚、煙乾。海壩彈丸，商旅輻輳，器物流通，實有資於內地。⁴⁶

從這一則史料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透過船舶貿易進入臺灣的各種紡織品，包括有從漳州輸入臺灣的絲線、漳紗、翦絨、布，從蘇州載回的布匹、紗緞、桌綿、涼暖帽子，而從浙江則運回綾羅、棉綢、縐紗、湖帕、絨線，甯波則載棉花回來臺灣，甚至還有從山東買回來的繭綢。對比輸入紡織品的貿易地點，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主要是來自福建還有華中一帶。這兩個地點，是清治前期臺灣最重要的紡織品來源地，不過由於華中一帶的棉紡織業、絲綢技藝等都已經高度發展，所

⁴⁵姚瑩，《東槎紀略》卷 1，臺灣文獻叢刊第 7 種，頁 23。

⁴⁶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 2，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47-48。

以輸入臺灣的紡織品，可能是比較高級的綾羅、絲綢、或是質地比較精美的布匹，而由福建輸入臺灣的紡織品，則可能是比較初級土布。兩地輸入臺灣的紡織品類型不盡相同。

整體而言，開港前中國沿海的帆船貿易已經相當興盛，也形成了各地區之間各種商品貿易往來、買賣交換的情形，臺灣在中國沿海的貿易體系中，屬於南部的砂糖產區，會和華中地區進行絲綢、棉紡織品的交換，所以臺灣有一部份的紡織品是來自華中地區。另外重要的來源地，則是與臺灣有對渡關係的福建一帶，由於和閩地的區域分工，大量的民生用品是由此輸入，紡織品亦是重要的一環，只不過兩地輸入臺灣的商品種類略有不同。總之，福建和華中地區是清治前期臺灣最重要的紡織品來源地。

二、行郊、港口與紡織品的銷售

臺灣島內紡織品的貿易範圍，礙於史料的限制，很難劃定出明確的貿易界線，或是銷售紡織品的路徑。不過由於紡織品主要是透由港口輸入，因此我們可以猜測各地紡織品的貿易範圍，基本上是由港口向外擴張。正因為紡織品是依靠港口進口到臺灣，所以紡織品在臺灣的拓展，基本上就是順著人民開墾的腳步，與港口發展的方向，由南向北最後進入東臺灣。

紡織品在臺灣的銷售，主要是透過行郊做為交易的媒介，從大陸輸入各種紡織品，再銷售到臺灣各地。清治前期臺灣的行郊組織，可大致區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前往大陸同一地區經商所組成的郊，如北郊、南郊；第二類是由同業商人組成，以其販售的貨物命名之，如米郊、糖郊、布郊等皆是；第三類則為專稱某一地之所有行郊，如新竹地區的行郊稱為塹郊。⁴⁷上述的這幾類行郊，皆有經營紡織品的貿易。然而，會出現由某一種同業商人所組合成的郊，代表這項商品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才會形成以其販售貨物為名的郊。因此各地布郊、絲線郊等行

⁴⁷.卓克華，《清代臺灣行郊研究》，（臺北：揚智文化，2007），頁 35-36。

郊的出現，代表紡織品貿易不僅已擴展到此處，並且已經在此地蓬勃發展。

臺灣的行郊最先興盛於開發較早的臺灣府城（今臺南）地區，清初由於單一正口對渡的限制，赴大陸貿易的船隻皆須取道鹿耳門，使得臺南地區商業繁盛。康熙末年的《臺灣縣治》中就有記載府城內有專門賣布的「布街」出現。⁴⁸而在乾隆末年，則在鹽水地區出現有關布郊的碑刻記錄。碑存於臺南縣鹽水鎮水正里中正路護庇宮的〈重興護庇宮碑記〉（乾隆六十年，1795）中就有「布郊黃濟盈捐銀三十六元」⁴⁹記錄，足見乾隆年間紡織品貿易不僅已在府城地區相當繁盛，更擴散到了鹽水一帶。

除此之外，碑刻也記錄了各種經營紡織品的行郊或是店鋪，在臺南地區活動的情形。《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中的〈重興大天后宮碑記〉（道光十年，1830）裡記載了當時各郊捐款的情況：

大商船捐銀三千八百五十員。六屬鹽課館捐銀一千大員。臺郡餉典舖捐銀五百大員。船行捐佛銀四百六十員。鹿港頂郊捐佛銀三百大員。竹仔街捐銀二百七十四員。布郊瑞興捐銀二百三十八員。糖郊雙記、復興、臺郡煙籛郊、杉行郊等各捐銀二百員。泉布郊捐佛銀一百八十員。武館街捐銀一百七十七員。宮後街捐佛銀一百五十員。綢緞布舖捐銀一百五十員。郡籛舖捐佛銀一百四十員。新興街捐銀一百三十一員。綢緞郊計捐銀三百二十元。糖間金成玉、絲線郊各捐銀一百二十員。郎中吳春貴、主簿吳世繩、監生黃拔萃、綢緞布郊、臺郡油車、林元美、廈鹿郊，各捐銀一百員。臺郡布舖捐佛銀九十員。⁵⁰

在這則記錄中，看到跟紡織品相關的行郊與商舖共計有：布郊瑞興、泉布郊、

⁴⁸ 陳文達，《臺灣縣治》，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頁 91。

⁴⁹ 〈重興護庇宮碑記〉，收於《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頁 155。

⁵⁰ 〈重興大天后宮碑記〉，收於《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頁 592-593。

綢緞布舖、綢緞郊、絲線郊、綢緞布郊及臺郡布舖。種類繁多，亦可以至少歸納出紡織品經營的項目有布匹、綢緞、與絲線等。如果從捐款的數字來討論的話，扣除官員捐贈的部分，上面的引文大致上是捐款超過百兩的。也就是說，在眾多的行郊與商舖中，經營紡織品的利潤可能很豐碩，進口買賣的數量應該很龐大，才會在超過一百銀員捐款上，頻繁的出現。從這一則碑刻記錄中，可以看見臺灣府城（今臺南）不僅出現了布郊，經營紡織品的行郊更被細分為絲線郊、綢緞郊等更多的樣貌，顯示當地的紡織品貿易不只是大，分類也越來越細緻。紡織品能區分成如此多樣的行郊，是相當特別的現象，如果跟清代最出口最興盛的米和糖相較，也很少看見除了米郊和糖郊之外，再有更細的分類。由此推斷，紡織品可能有不亞於米糖、甚至超越兩者的貿易量，才能支撐起這麼多紡織品相關的行郊存在。紡織品穩居清治前期進口貿易之冠。

隨著開墾的北移，中臺灣的鹿港於乾隆 49 年（1784）正式開港，與福建的蚶江口對渡，從此成為臺灣中路要津，貿易蓬勃發展，亦有眾多郊商在此活動。鹿港在嘉慶二十一年之前已有八郊，即是泉郊、廈郊、南郊、~~蘇~~蘇郊、油郊、糖郊、布郊、染郊這八個郊。⁵¹布郊與染郊的出現，都表示當地的紡織品貿易已具有相當程度的規模。而《臺灣中部碑文集成》的〈重興敬義園捐題碑〉（嘉慶二十三年，1818）中也同樣提到：「布郊金振萬捐銀一百一十二員」，⁵²兩者相互對照，可見中部的紡織品貿易，在嘉慶年間已經蓬勃發展。

至於北臺灣有關郊的記錄，在陳培桂的《淡水廳志》風俗考中這樣描述：「赴福州江浙者曰北郊，赴泉州者曰泉郊，赴廈門者曰廈郊，統稱為三郊。」⁵³這是所謂的淡水三郊，至於其輸入的商品，根據王一剛（王詩琅）的研究：泉郊以對閩省泉州之貿易為主，是艋舺最早成立的商業組織，以棉花⁵⁴、瓷器、磚瓦、鹽

⁵¹張炳楠（王世慶），〈鹿港開港史〉，《臺灣文獻》19 卷 1 期（1968），頁 37。

⁵²〈重興敬義園捐題碑〉，收於《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 151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頁 128。

⁵³陳培桂，《淡水廳志》卷 11，臺灣文獻叢刊第 297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頁 299。

⁵⁴雖然王一剛（王詩琅）認為輸入的商品是棉花，但以臺灣與福建的區域分工方式，與臺灣女性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來推斷，輸入商品為棉布成品的機會較高。《臺北市志》中有關泉郊輸入商

魚為主要進口大宗。北郊則是以上海、福州、寧波等大陸北部港口都市為貿易對象，輸入綢緞、羅紗、絹布等奢侈品，以及藥材等物品。⁵⁵廈郊輸入商品的記錄殘缺，但根據道光年間鄭用錫的《淡水廳志稿》：「購買飲食衣服及日用必需要物等件，隨船載回發賣。」⁵⁶來推斷，不外乎亦是各種日用雜貨。由淡水三郊的輸入商品來看，泉郊以福建為主要貿易對象，輸入布帛；北郊則經常往返華中地區交易，輸入的是較為高檔的綢緞、羅紗、絹布等奢侈品。這兩個郊的貿易對象和進口的紡織品，同樣是說明了臺灣大體上是與福建和華中地區進行紡織品的貿易，而華中地區輸入的紡織品可能更為精緻、高級。紡織品貿易在北臺灣也很頻繁。

東部的噶瑪蘭地區行郊的相關文獻較為缺乏，所以直接透過方志中對貿易情形的描繪，來觀察此地紡織品貿易的情況。成書於道光年間，於咸豐三年（1853）刊行之陳淑均的《噶瑪蘭廳志》寫到：

蘭中惟出稻穀，次則白苧，其餘食貨百物，多取於漳、泉，絲羅綾緞，則取資於江、浙。每春、夏間，南風盛發，兩晝夜舟可抵浙之四明、鎮海、乍浦，蘇之上海，惟售番鐵，不裝回貨。至末幫近冬，北風將起，始到蘇州裝載綢匹、羊皮、雜貨，率以為恆。一年只一、二次到漳、泉、福州，亦必先探望價值，兼運白苧，方肯西渡。福州則惟售銀，其漳、泉來貨，飲食則乾果、麥、豆，雜具則磁器、金楮，名「輕船貨」。有洋銀來赴糴者，名曰「現封」，多出自晉、惠一帶小漁船者。蓋內地小漁船，南風不宜於打網，雖價載無多，亦樂赴蘭，以圖北上也。其南洋，則惟冬天至廣東、澳門裝賣樟腦，販歸雜色洋貨，一年只一度耳。⁵⁷

品的記錄為：金銀紙、布帛、陶瓷器、鹹魚、磚石為大宗，同樣也是布帛成品，因此本文認為輸入的商品是棉布而非棉花。

⁵⁵ 王一剛，〈臺北三郊與臺灣的行郊〉，《臺北文獻》直字第 9、10 期（1957），頁 113。

⁵⁶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臺北：遠流，2006），頁 191。

⁵⁷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11，臺灣文獻叢刊第 160 種，頁 278。

由上可見，噶瑪蘭地區一般的紡織品可能來自福建漳州與泉州，綾羅綢緞等絲綢製品，則來自華中地區的蘇州、浙江。一年中有一次機會順著季風南下廣東、澳門一帶，買回包含紡織品的各種洋貨。此外，《噶瑪蘭廳志》中還有記載：「蘭俗夏尚青絲，冬用棉綢，皆取之江、浙。」⁵⁸的說法，都顯現出道光年間噶瑪蘭地區已有紡織品貿易的足跡，而道光末年噶瑪蘭一帶的開墾才趨於完成，符合本文推論紡織品貿易是隨著開墾的腳步，與港口的發展，逐漸擴散到全臺各地的說法。

如前文所述，紡織品透過港口輸入臺灣，各大小港口貿易活動的範圍，大致就等於紡織品在各地的市場圈。不過臺灣港口體系十分複雜，依據林玉茹的研究，將臺灣的港口分為主系統和次系統等各種港口系統，清治前期從初期只有鹿耳門一個主系統，逐漸變成了八里坌、鹿港、鹿耳門這樣北、中、南三個區域性主系統型態。⁵⁹這三個區域性的貿易中心，成為臺灣三大港市，形成「一府二鹿三艋舺」情形。⁶⁰三大主系統底下包含許多次系統，主系統的貿易為較廣，會將次系統的市場圈納進來。紡織品的島內運輸也同樣是相同的概念，較小的港口，它紡織品的市場圈，可能僅止於其港口市鎮一帶，或是鄰近的墾地，小港間彼此進行紡織品運輸的機會較低。不過三大主系統仍然與其依附的次系統，有海路運的貿易往來，紡織品亦是如此，主系統港口的紡織品，會透過海路運的交通，向次系統的港口擴散。《淡新檔案》第 33101 號，據芝蘭三保和尚洲庄民李江海等具告被盜劫搶銀物由一案中，就留下這樣的記錄。

33101 號案記錄的是一件強盜案件，發生於咸豐 7 年（1857），商人李江海等人在艋舺買貨，顧了伙計要將商品運送到竹塹地區販賣，在行經頭重溪一帶，遇見盜匪攔路搶劫，強將銀貨搶去，其中被搶走的錢財商品有：

李江海被搶走的財貨有：小花西洋布六疋、紫花布六全、毡帽二十頂、佛

⁵⁸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11，臺灣文獻叢刊第 160 種，頁 199。

⁵⁹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頁 322。

⁶⁰林玉茹，〈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頁 7。

銀參拾元、錢參千文、衫褲二付、羊裘一件。陳成來被搶去佛銀四十五元、羊裘一件、和衫褲二件。林萬豫被搶走佛銀十五元、銀紙一擔及羊裘一件。林根被奪去佛銀八元、羊裘一件和西洋布貳疋。曾建失去佛銀十三元、魚脯一擔、羊裘一件。李江被搶去佛銀十元、羊裘一件與金錢五百文。林水被搶走佛銀三元、銀紙一擔、和羊裘一件。林寅被奪走佛銀一元、黃麻一擔、羊裘一件。林萬則失去佛銀一元、羊裘一件與衫褲一付。林平被搶去銀紙一擔、金錢伍百文。⁶¹

這一則史料記錄了紡織品島內運輸的狀況。從被搶走的貨品，或是人們身上穿著的服飾中，可看到各式各樣的紡織品，包括西洋布、紫花布、毡帽、衫褲、羊裘、黃麻等，種類繁多，足見當時有各種紡織品輸入臺灣。而由艋舺輸往竹塹這一點來看，是主系統港口的商品市場圈將次系統港口納入的緣故。雖然這則史料並不是由水路運送這些紡織品，但路上運輸同樣也是港口主系統和次系統市場間輸送的方式，因此像艋舺這樣的港口，輸入的紡織品也會運往像是竹塹這樣次系統的港口銷售。

總之，描述清治前期臺灣紡織品貿易的資料有限，本文透過行郊輸入的紡織品情形，與布郊在各地出現的記錄，試著突顯出紡織品在全臺各地貿易的情形。紡織品的銷售範圍，則大致等同於各個港口貿易的市場圈，不過主系統的港口會將次系統港口的市場圈納入其中，形成較大的銷售範圍，透由海陸運的運輸，將紡織品輸往各地銷售。

三、清治前期紡織品的種類

在清治前期臺灣與大陸的區域分工中，紡織品幾乎一直占據輸入物資中最重要位置，數量龐大的紡織品進入臺灣，除了用來製作布袋等物品之外，主要還

⁶¹. 《淡新檔案》第 30 冊（臺北：臺灣大學，2009），頁 320-321。

是用於衣著服飾這方面。臺灣由於氣候溫暖潮濕，除了四季皆宜的棉織品之外，夏季有時也會使用麻布這類較為涼爽的材質做衣服。外出或慶典的服裝，以絲織品為主；常服則多以棉、麻等布製作。⁶²康熙末年的《諸羅縣志》在其「風俗志」中就寫到：「有冰紈、白縠、縐紗之蒙於暑，有吳綾絲絮、漢府氎裘之燠於寒，有洋布、嗶支、羽、毛、哆囉呢之泛於外洋。」⁶³由此可知，清初輸入臺灣的紡織品就已經有棉、麻、紗、絲綢等織品，可能還有少量的洋布，不過隨著臺灣與大陸區域分工的日漸緊密，清治前期洋布輸入臺灣較少，大量洋布的進入還是要等到 1860 年臺灣開港之後。

如果我們試著將紡織品歸類，至少可以區分為棉織品、絲織品、麻葛類織品、毛織品和交織品五大類。棉織品用途廣泛，是輸入臺灣最大宗的紡織品，臺灣人一般的勞動服飾多以棉織品來製作，清治前期較常見的棉織品有：棉布、井布、池布、眉布、紫花布、縐布、西洋布等。棉布泛指一般較粗的平紋棉織品，通常用於勞動服飾。池布、眉布、井布來自漳、泉兩地。紫花布指以紫花織成者，為來自寧波的一種棉布。縐布是以內地棉花紡成縐紗織成的一種棉布。⁶⁴

臺灣早期絲織品大多來自大陸江、浙地區，咸豐三年陳淑均的《噶瑪蘭廳志》就寫到：「蘭俗夏尚青絲，冬尚棉綢，皆取之江、浙。」⁶⁵蘇州、南京、杭州為當時大陸絲織品的生產中心，所產絲織品種類繁多，依織法不同可以分成紗、縠、羅、綢、緞、絨等類，因臺灣的氣候炎熱，服裝偏好輕薄的絲織品。紗、縠類常用於夏季常服，緞、絨類較厚實的布類則常見於冬季服裝。⁶⁶清治前期比較常見的絲織品有：春紗、縐紗、白縠、吳綾、杭綾、漢府緞、錦布等。⁶⁷

至於麻葛類的織品，由於具有涼爽、通風、耐汗等特性，非常適合臺灣悶熱的夏季。麻、葛類大多為平紋或楞紋組織的素色織品，麻織物因麻種之別，又有

⁶² 蘇旭瑀，《臺灣早期漢人傳統服飾》，（臺北，商周，2000），頁 78。

⁶³ 周鐘瑄，《諸羅縣志》卷 8，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頁 138。

⁶⁴ 整理自臺灣府志、諸羅縣志、噶瑪蘭廳志、臺灣通史等方志。

⁶⁵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5，臺灣文獻叢刊第 160 種，頁 199。

⁶⁶ 蘇旭瑀，《臺灣早期漢人傳統服飾》，頁 82-83。

⁶⁷ 整理自東瀛識略、臺海使槎錄、諸羅縣志、重修臺灣府志、噶瑪蘭廳志、臺灣通史等叢刊方志。

麻布、苧布之分；葛布為葛藤製作的織品，也有將葛布、鳳梨布、蕉布通稱葛布
的說法。⁶⁸清治前期臺灣常見的麻葛類織品有：麻布、苧布、葛布、蕉布等。⁶⁹

清治前期的毛織品，有幾種類型，初期可能有從外洋進口的，例如：嗶支、
羽緞、哆囉呢等等。也有利用區域分工從大陸地區購得的羊裘、毛衣等毛織品。
另外臺灣本地的原住民，也有生產少量毛織品的生產，《臺灣志略》中就有提到：
「番毯、毛被，番婦所織，剝樹皮雜獸毛為之。」⁷⁰不過由於臺灣氣候炎熱之故，
毛織品所使用的情形和數量可能較少。

交織品是指經、緯向以不同紗線交織而成的各類織品，早期臺灣的交織布多
以絲、棉、麻等纖維相互交織而成，有絲、棉交織的「絲布」，麻、棉交織的「假
羅」⁷¹。據同治年間之《泉州府志》載：「有絲布，係絲經棉緯；有假羅，雙梭織
者，一苧一棉間織而成。」除此之外，番布中亦有交織布的情形，《東瀛識略》
中記載：「有番布名達戈紋，番婦合棉苧織成」，⁷²所以是一種棉、苧交織的番布。

總之，清治前期輸入臺灣的紡織品種類繁多，大部分的紡織品是透過區域分
工由大陸而來，少數來自當地原住民或是由國外進口，有一般大眾普遍使用的
棉織品，較為高級的絲織品，涼爽的麻葛類織品，保暖的毛織品，與混合編織的
交織品。

第三節 移墾社會中紡織品的功能和價值

清治前期臺灣的紡織品琳琅滿目、種類繁多，這些紡織品對當時人們的生活
有怎樣的影響？紡織品在移墾社會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本節將從臺灣人民
的生活習慣、衣著服飾等角度來切入，並以淡新檔案中有關紡織品的案件為例

⁶⁸蘇旭珺，《臺灣早期漢人傳統服飾》，頁 86-87。

⁶⁹整理自臺灣使槎錄、臺灣府志、諸羅縣志、臺灣通史等。

⁷⁰《臺灣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8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36。

⁷¹蘇旭珺，《臺灣早期漢人傳統服飾》，頁 88。

⁷²丁紹儀，《東瀛識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2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61。

證，討論紡織品在移墾社會中的功能與價值。

一、衣物與人民生活

清治前期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臺灣都處於移墾社會的狀態，以往對臺灣清治前期的印象，大多認為臺灣各地亟待開發，在經濟文化等多方面都不如中國內地，像是李國祁的研究就主張臺灣自 1860 年開港之後，人民所得提高，消費增加，奢侈品大量進口，使臺人逐漸拋棄原本農耕社會儉樸的道德標準，社會風氣才趨向奢靡。⁷³然而，近來的研究確有不同的看法，以吳奇浩〈清代臺灣之奢靡風氣〉一文為例，其指出臺灣奢靡的風氣早在康熙年間就已經開始出現，形成的原因有三：一、中國內地風俗習慣的移入，福建原鄉的奢侈風氣隨移民進入臺灣。二、明鄭以來民生經濟發展和商業貿易興盛，帶給臺民豐厚收入。三、生產與所得：臺灣為糧食產區，購買糧食方面支出較低；所得較高，因而可以追求更高一層的物質生活享受。這些原因使得臺灣的奢靡風氣日漸盛行，社會各階層都感染了奢靡的消費風氣，以往只有上階層才使用的服飾器物，也普遍見於中、下層民眾之間。⁷⁴這樣的情形，對臺灣紡織品又產怎樣的影響呢？

康熙末年臺灣的奢靡風氣日盛，人們對於自身的衣著服裝十分講究，且這樣的情形不僅止於上層階級，一般中、下階層的老百姓亦是如此。刊印於康熙五十六年的《諸羅縣志》就有如下記載：

人無貴賤，必華美其衣冠，色取極艷者。靴鞮恥以布；履用錦，稍敝即棄之。下而肩輿隸卒，袴皆紗帛。⁷⁵

荷包，方廣可八、九寸，以紅哆囉呢、漢府緞為之；不惜高價，必求女工

⁷³李國祁，〈清季民初閩浙臺觀念與風俗習慣的趨新〉，收錄於《陶希盛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食貨，1979），頁 272-294。

⁷⁴吳奇浩，〈清代臺灣之奢靡風氣〉，《臺灣史研究》12 卷 2 期（2005），頁 60-66。

⁷⁵周鐘瑄，《諸羅縣志》卷 8，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頁 146。

之最者而刺繡焉。……衣服必麗，簪珥必飾，貧家亦然。⁷⁶

由上述的資料顯示出，當時的人們不論貧富貴賤、上下階層，衣著服飾都很華麗，色彩鮮豔奪目，甚至連鞋襪都不用一般的棉布，鞋子要用更高級的錦布，褲子的質料用的亦是絲織品。出門攜帶的荷包，大至八、九吋，還不惜花費高價請最好的女工在荷包上刺繡，並以紅哆囉呢、漢府緞這樣的材料製作。

同時期的《臺灣縣志》和《鳳山縣志》也有相似的記錄，《臺灣縣志》提到：「俗尚華侈，衣服悉用綾羅。特富厚之家為然也，下而輿隸之屬、庸販之輩，非紗帛不袴。」⁷⁷《鳳山縣志》的描述更加生動，內容這樣寫到：「即廝役牧豎衣曳綺羅，雖販婦村姑粧盈珠翠。」⁷⁸連僕人和牧童身上穿得衣物，都是華美的絲織品，足見當時人們對衣著服飾的重視。

雍正到道光年間，臺灣庶民於日常生活的各層面中，依然進行著高消費的奢靡行為。⁷⁹藍鼎元在雍正年間的〈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就這樣描述臺灣奢靡的風氣：

臺俗豪奢，平民宴會，酒席每筵必二兩五、六錢以上或三兩、四兩不等；每設十筵、八筵，則費中人一、二家之產矣。遊手無賴，綾襖錦襪，搖曳街衢；負販菜傭，不能具體，亦必以綾羅為下衣，寬長曳地；輿夫袒裸，而繭綢綿褲不可易也。家無斗米，服值千緡；饘粥弗充，檳榔不離於口。習俗相沿，餓死不變。⁸⁰

在藍鼎元的記錄中，臺人在服裝方面，奢靡的氣息依舊。「遊手無賴」在街

⁷⁶周鐘瑄，《諸羅縣志》卷8，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頁149。

⁷⁷陳文達，《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03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頁57。

⁷⁸陳文達，《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24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頁80。

⁷⁹吳奇浩，〈清代臺灣之奢靡風氣〉，頁48。

⁸⁰藍鼎元，〈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收於《治臺必告錄》，臺灣文獻叢刊第17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56。

上遊蕩時，身上穿得是高級絲織品所縫製的衣服襪子；賣菜小販的下衣，是長到可以拖到地上的綾羅綢緞；甚至連抬轎子的輿夫，雖然裸露著上半身，但褲子卻是上好棉綢材質。更誇張的是家裡連米都沒有了，卻仍保有高級華美的衣服。

乾隆年間朱景英所撰成的《海東札記》也描寫了相似的情境：「俗尚華侈，雖傭販輩徒跣載道，顧非紗帛不袴。婦女出不乘輿，袷服茜裙，擁傘翹通達中，略無顧忌。」⁸¹內容生動的描繪出，販夫走卒雖然沒有穿鞋，但身上的褲子一定是輕薄的絲織品；婦女出門全身上下必定是華麗的衣裝和裙飾，拿著傘穿梭於街道中。從這則史料中我們再次看到臺人的奢靡風氣，及對衣著華美綺麗的重視。

嘉慶年間臺民在服飾、飲宴的花費與享受依然奢侈，康熙以來的奢靡習尚，至嘉慶年間並無太大改變。⁸²道光年間則有：「臺郡人情浮靡，華衣美食及一切糜費無益之事，無不以侈麗為尚，各爭體面」⁸³奢靡風氣延續到道光年間，對於衣著的華美仍舊重視，因為這關係到個人的面子，具有與人競爭的性質。

如前所述，清治前期臺灣的社會風氣，充斥著奢靡的氣息，因此在臺人在外出的時候，對自身的衣著打扮相當重視，往往以高檔的絲織品製作外出服飾。這樣的風氣不僅止於上層階級，連一般的庶民百姓都受到影響，販夫走卒、僕童廝役也都在穿著上使用高級的絲綢製品。這樣的風氣或許可以解釋，為何臺灣需要進口如此大量的紡織品，絲織品的使用十分頻繁，種類也很繁複多變，衣著服飾成為炫耀與比較的戰場，對於紡織品的需求自然龐大。

不過，雖然可以從奢靡風氣來解釋臺灣民眾在服裝上爭奇鬥豔的現象，但亦可以從移墾社會的角度來切入。如前文所述，清代初期臺灣社會充斥羅漢腳等獨身男子，由於沒有家累的負擔，所賺的錢財多用於自身消費之上，衣物的打理自然也是可能消費的一環。再者，由於男女比例不均，婦女身價高漲，婦女要在眾多的追求者中挑選出夫婿，自然會考量其經濟能力。因此，家庭的貧富與能出聘

⁸¹朱景英，《海東札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19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28。

⁸²吳奇浩，〈清代臺灣之奢靡風氣〉，頁 52。

⁸³丁日健，《治臺必告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17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359。

金的多寡，遂成為民間嫁女議婚時的重要條件。⁸⁴康熙末年的《臺灣縣志》就提到：「臺之婚姻，先議聘儀，大率以上、中、下禮為準：其上者無論；即下者，亦至三十餘金、綢綾疋數不等，少者亦以六疋為差。」⁸⁵所送的聘禮除了金錢之外，紡織品也名列其中，可見紡織品具有跟金錢一樣的貴重價值。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婦女有機會嫁進比較好的家庭，經濟能力提升，就消費的起更高級的紡織品。這是從移墾社會的角度，來討論清治前期臺灣紡織品的消費情形。

另一方面來看，雖然臺灣社會出奢靡的風氣，但仍有地區性的差異，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可能就如同前文所討論的，但鄉村地區（或是正在開發拓墾的區域），生活風氣就較為儉樸。乾隆年間的《重修鳳山縣志》就記載：「村野之家，日用食飲猶存儉樸；城市紛華之地，矜炫耀以飾觀。」⁸⁶這些區域在紡織品的使用上，可能就不會像城市一樣，以奢華炫耀為重點，牢固耐用或許更為重要，這些區域所使用較多的紡織品，可能就是比絲織品便宜耐用的棉織品，用來製作勞動服飾，涼爽的麻葛類製品應該也有一定的消費量。

總之，紡織品與臺灣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清治前期輸入臺灣的眾多紡織品，被製作成臺民生活所需的衣物，不論是在城市中作為炫耀比較的穿著，還是在鄉村地區的勞動服飾，都是透過兩岸間頻繁往來的紡織品貿易，支持這樣龐大的消費市場。

二、從搶奪竊盜的案件看紡織品的財產價值

紡織品廣泛的被運用在清治前期臺灣人民的生活中，尤其是在服裝方面，這些衣物所代表的角色，是一種財富？還是僅止於一種生活必需品？在移墾社會底下的紡織品，具有怎樣的價值呢？本節將以《淡新檔案》為核心，討論其中第三

⁸⁴卓意雯，《清代臺灣婦女的生活》，（臺北：自立晚報，1993），頁 14。

⁸⁵陳文達，《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頁 54。

⁸⁶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頁 56。

篇「刑事」篇中第三類「財產侵奪」的部分，⁸⁷其中記載了有關人民財產受到侵害奪取的案件，在之中亦可見到紡織品被搶奪、竊盜的案例。雖然淡新檔案的案件集中於北臺灣，有其地域的侷限性，加上許多案件發生的時間，是落在開港之後，但我們仍可從開港之前（或開港之初）的案件，一窺清治前期紡織品在臺灣人民生活中的價值。

《淡新檔案》第 33101 號案，發生於咸豐 7 年（1857），記錄的是一件強盜案件，商人李江海等人在艋舺買貨，雇了伙計要將商品運送到竹塹地區販賣，在行經頭重溪一帶，遇見盜匪攔路搶劫，強將銀貨搶去，損失的除了金錢之外，還有準備運送到竹塹地區販售的紡織品，總計被搶去相關的紡織品有：毡帽二十頂、羊裘九件、衫褲五件、紫花布六全、小花西洋布六匹、西洋布二匹及黃麻一擔。⁸⁸雖然這些紡織品，大多原本就是要做為商品來販售，不能說它沒有價值，但攔路的搶匪願意搶走這批貨物，代表這些紡織品的經濟價值不低，因為如果銷贓之後不值幾個錢，不需要大費周章的來強搶，奪走商人身上的銀錢即可。所以從此一案件中可得知紡織品在當時人們的眼中，是具有跟金錢同等重要的經濟價值。

淡新檔案第 33102 號案，時間為同治 6 年（1867），發生的是一件竊盜案件，竹北二堡大溪墘埔頂的莊民張番，所開設之藥鋪雜貨生理的義隆號商舖，被盜賊潛入，席捲貨物而去，被偷走的財貨如下：

番銀四十二元、銅錢拾貳千貳百文、井、草淺共拾壹疋、烏本漂洋五件、烏池毛貳件一丈、新式白布九疋、漂白布半疋、粉淺布貳疋半、通連面巾貳疋、朱西洋布貳丈、虎花布壹疋、□庄綢壹疋、大同烟四包、朱□文六办、朱吱棹幃一領、錫小盒貳個內洋參四办、高厘乙办、杉箱一個內小雜

⁸⁷. 含竊盜、搶奪、強盜、強盜殺傷、海盜、恐嚇、詐欺、盜賣、毀棄九類。

⁸⁸. 《淡新檔案》第 31 冊，（臺北，臺灣大學，2009），頁 319-321。

物件。⁸⁹

從上述的資料，可以清楚的看到，盜賊潛入這間販售雜貨的店鋪，所偷走的貨品，除了銀兩銅錢之外，大半都是紡織品，這顯示紡織品在市場上一定很有價值，所以竊盜才會專偷這些東西，捨棄店鋪內其他的眾多商貨。由前述的兩個案件可以推估，紡織品這些貨品，在清治前期的臺灣，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所以才會成為搶匪竊盜覬覦的目標。這與現今紡織品的地位，有明顯的不同，一般而言現在臺灣的小偷或是強盜，會搶奪的財物，不外乎是珠寶電器等物品，很少聽見偷衣服的案件。大部分的衣服對現代人來說，與其說是財產，不如說是一種消費品或是消耗品來的更為恰當。不像清治前期的臺灣，紡織品是等同於金錢的財貨，具有容易變現的特質。

然而，上述這兩個案件所描述的，主要是新的紡織品，尚未販售的衣物布匹等。那麼，一般百姓家中的衣物，有沒有價值呢？淡新檔案第 33601 號案，或許可以為我們解釋這個問題，此案發生於咸豐 2 年（1852），巡捕在夜裡巡視時，遇見盜匪兩人，在尾隨擒拿的過程中，因盜匪反抗而未緝捕成功，在抵抗中盜賊遺留下來一只麻布袋，裝有五件偷來的贓物，分別是：「咩馬褂一件、藍布長衫一件、襯套一件、破粗羊羔一件、淺布短衫一件。」⁹⁰這五件贓物都是紡織品，從破粗羊羔這一件來推測，很可能皆是穿過的舊衣物，這顯示出除了全新的紡織品之外，舊的衣物也有一定的價值，盜賊才願意去偷竊。這個現象十分有趣，表示紡織品可能具有保值的功能，即使已經是使用過的衣物，還有一定的價值，至少比起其它在屋內的生活用品，紡織品成為偷竊的優先選擇。

從前述的幾個案件，可以說明一個現象，就是紡織品在清治前期的臺灣，具有一定程度的經濟價值，做為貨物的紡織品在臺灣交易熱絡，也使得在搶匪竊盜的案件中，紡織品被偷竊的機會不低，這亦表示衣物類的紡織品對臺灣的民眾來

⁸⁹. 《淡新檔案》第 33102-2 號

⁹⁰. 《淡新檔案》第 33601-2 號

說，不僅僅只是穿在身上的衣服而已，它是穿在身上的財富。前一小節我們談到臺灣的奢靡風氣，人們花費許多金錢，於裝扮自身的衣著服飾。在城市中這個風氣沒有上下階層之別，不論富人、平民百姓甚至是販夫走卒，都願意在衣服上投入金錢，彼此爭奇鬥豔。因此眾人的衣物，成為家中最有價值的物品之一，所以我們可以將這些紡織品視為人們的財產。由此可知，在清治前期移墾社會的臺灣，紡織品在臺灣人民眼中是一種財富，具有不錯的經濟價值，而家中衣物類的紡織品，則被視為是自身的財富，具有財產價值。

總而言之，清治前期臺灣紡織品貿易，主要是透由和中國大陸的區域分工來完成的。臺灣由於清治前期統治政策的影響，與拓墾的需要大量男性投入，導致臺灣女性勞動力缺乏，使得農村手工業無法興盛，因此紡織品必須由大陸輸入，臺灣則輸出農產品來交換。由於對渡政策的影響，逐漸形成港對港的貿易系統，透由船舶貿易將紡織品進口到臺灣。臺灣紡織品的貿易對象，主要是最靠近臺灣的福建，和紡織業最發達的華中地區。輸入臺灣的紡織品，透由行郊在島內進行貿易，交易範圍是各港口的市場圈，但幾個大的港口系統，也會向較小的港口系統運送商品，形成紡織品的島內運輸。清治前期臺灣紡織品的種類，大致可區分為棉織品、絲織品、麻葛類織品、毛織品、和交織品，其中以棉織品和絲織品的使用最為廣泛。這些紡織品在移墾社會中，被視為是人民的自身的財富，具有其財產價值。

第三章 開港後紡織品貿易的競爭與發展

1860 年臺灣開港，紡織品貿易進入嶄新的局面。清治前期大體而言，臺灣的貿易對象是中國，在區域分工的原則下主要從中國輸入紡織品，而從中國以外地區輸入的紡織品，所占比例極低。然而到了清治後期，由於通商口岸的陸續開放，外國的紡織品開始大量進口到臺灣，從海關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同治年間英國的紡織品已進入臺灣市場，光緒年間日本的紡織品也加入戰局，這些從外國進口到臺灣的洋布，面臨原有大陸地區輸入土布的競爭，形成土洋大戰。本章就是要討論開港之後，紡織品在臺灣貿易與競爭的情形。以下先以時間為順序，劃分開港後紡織品的分期。再以總體的角度，來觀察臺灣整體進口紡織品輸入的情形。

第一節 英國紡織品獨霸洋布進口時期（1860～1884）

臺灣開港以來，英國紡織品就積極輸入臺灣，由各項貿易記錄來觀察，從開港到臺灣割讓日本為止，其未曾在臺灣市場中缺席。戴寶村在《近代臺灣海運發展》一書中，以海關檔案整理了淡水和打狗各國船隻進出口數量的統計，英國船隻在 1867～1895 年間，占淡水進出口船隻總量的 65%，打狗則為進出口船舶數量的 55%。¹雖然此一統計數字低估了中式帆船的數量，但仍可清楚的顯現出，英國是開港後臺灣重要的貿易對象。紡織品亦是如此，在 1884 年之前，從外國進口到臺灣的紡織品中，英國紡織品獨占鰲頭，幾乎完全看不到其他國家產品的身影，僅有少量的美國棉布，不過所占比例很低。²因此在 1884 年之前，我們可

¹ 戴寶村，《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臺北：玉山社，2000 年），頁 88、101。

² 美國紡織品於 1871 年在淡水海關資料中首次被單獨列成一項，有 330 匹的斜紋粗棉布輸入臺灣，打狗海關資料則要等到 1882 年才獨立成項，有 360 匹斜紋粗棉布輸入，1884 年之前美國紡織品進口量數量最多的一年，是 1877 年淡水海關資料中的 3074 匹斜紋粗棉布，不足全臺棉織品總輸入量的 2%。

以說是英國紡織品獨霸整個洋布市場。直到 1885 年日本紡織品在海關的輸入數量才突破一成的關卡，成為紡織品新的競爭者。本節便是要探討英國輸入臺灣紡織品的種類、數量、貿易銷售的情形，及所面對的競爭等議題。

一、英國紡織品的進口總量分析

根據海關檔案的記錄，由外國輸入臺灣的紡織品，在 1884 年之前幾乎都是英國紡織品的天下。我們可以將英國輸入臺灣的紡織品，大致上區分成棉織品和毛織品兩大類。棉織品主要進口的商品有灰襯衫布 (Grey Shirtings)、白襯衫布 (White Shirtings)、土耳其紅布 (Turkey Red Cloths) 及 T 字布 (T~Cloths)。其中又以灰襯衫布及白襯衫布這兩項商品，進口數量最為龐大，T 字布也有一定的進口數量。毛織品則包括絲綢毛料 (Camlets)、厚斜紋布 (Lastings)、長毛羽紗料 (Long Ells)、西班牙條紋布 (Spanish Stripes) 等商品，雖然也一直持續進口到臺灣來，但僅占開港後洋布整體紡織品輸入量的 7.25%，³因此由外國輸入臺灣的紡織品，大體上仍以棉織品為主。

將 1866 年到 1874 年洋布進口的數量，製成表 3-1。棉織品的輸入，從 1866 年的 27811 匹，進步到 1884 年的 150100，成長超過五倍，毛織品則是由 1866 年的 4193 匹，成長為 1884 年的 9127，也有兩倍以上的增幅。全臺棉毛織品的進口比例大約維持在 9：1 左右。以圖 3-1 觀察棉織品進口數量可以發現，除了 1872 年的進口數量下跌之外，在 1874 年之前大體上維持成長的趨勢。黃富三在其〈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下)一文中，同樣提到 1865 到 1870 年間洋布進口數量快速成長的現象。⁴但這樣成長的趨勢到了 1875 年之後，英國棉織品的消費似乎已經穩定，大致上就在 14 萬匹上下的進口數量徘徊，沒有繼續擴

³ 本文以海關檔案為依據，統計 1866~1895 外國紡織品的輸入量，毛織品有 335508 匹，僅占總輸入量 4628978 匹的 7.25%。

⁴ 黃富三，〈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下)，《臺灣風物》33 卷 1 期，(臺北：臺灣風物，1983)，頁 126。

大其輸入規模。

表 3-1 1866~1884 年全臺外國紡織品進口數量統計表

年次	棉織品		毛織品		合計 (匹 (Piece))
	數量 (匹(Piece))	所占比例 (%)	數量 (匹(Piece))	所占比例 (%)	
1866	27811	86.9	4193	13.1	32004
1867	45321	83.8	8786	16.2	54107
1868	51625	88.6	6644	11.4	58269
1869	61259	90.0	6833	10.0	68092
1870	74074	86.7	11406	13.3	85480
1871	109606	92.2	9229	7.8	118835
1872	47651	87.9	6571	12.1	54222
1873	82015	92.9	6313	7.1	88328
1874	103961	94.0	6677	6.0	110638
1875	154133	93.6	10484	6.4	164617
1876	132759	92.7	10403	7.3	143162
1877	162733	92.1	13951	7.9	176684
1878	117834	90.7	12054	9.3	129888
1879	160352	91.1	15696	8.9	176048
1880	159672	91.2	15487	8.8	175159
1881	147209	90.7	15031	9.3	162240
1882	119900	91.0	11797	9.0	131697
1883	172439	93.1	12700	6.9	185139
1884	150100	94.3	9127	5.7	159227

資料來源：《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66~18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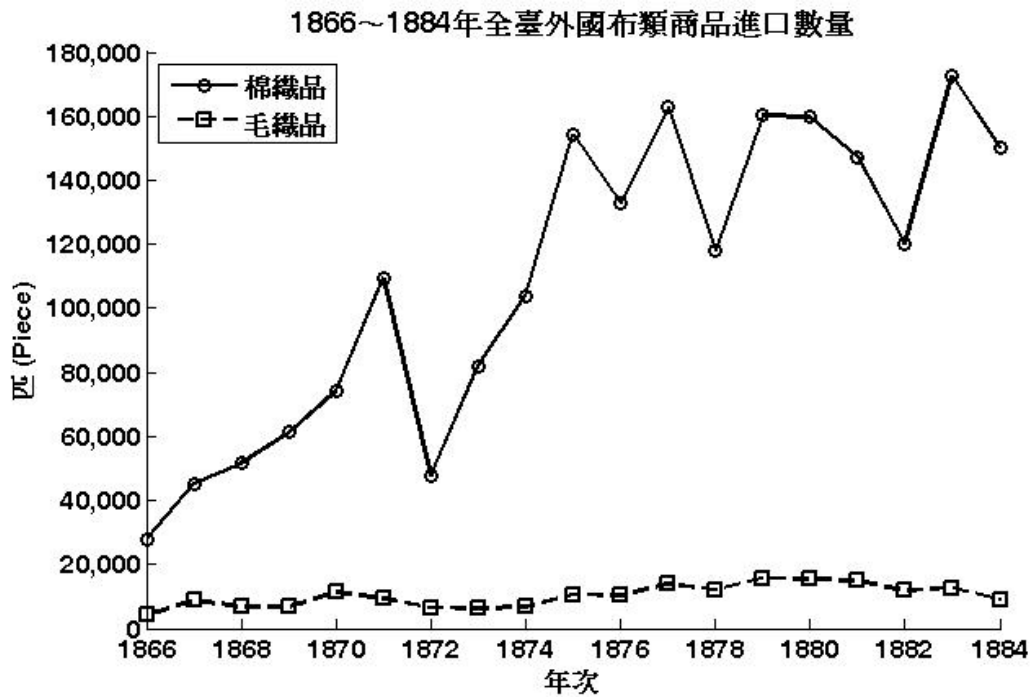


圖 3-1 1866~1884 年全臺外國紡織品進口數量變化圖

資料來源：根據表 3-1 繪製

李祖基研究臺灣洋布的進口數量，發現其往往呈現波浪式的增減現象，於是提出下列的觀察，他認為臺灣由於地方狹小，市場消費有限，而商品輸入的正式口岸南北一共只有四處，當進口商發現棉布需求量有增加的現象時，就會大批進貨，結果一時消費不了，造成供過於求的現象，隨之而來的便是翌年進口量銳減，等存貨銷售一定程度時，進口數量才會又開始上升。⁵

這樣的解釋方式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李祖基這個理論的立基是臺灣的市場狹小，當大批進貨時便會造成供過於求的現象，造成隔年的進口量銳減。臺灣的紡織品市場狹小嗎？第二章的敘述可以了解到，在清治前期臺灣透過跟大陸的區域分工，大量進口紡織品到臺灣。對臺人來說，紡織品不僅只是生活的必需品，也是人民的財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徵，紡織品在進口商品中，一直是占據最重要的位置之一，這樣龐大的紡織品需求，應該不能說是一個狹小的市場。不過李祖基觀察到洋商過度進口紡織品的現象確實存在，這可能與紡織品和鴉片的進口，被

⁵ 李祖基，《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 52。

視為是用來抵銷臺灣大量商品出超手段所導致的結果。⁶

正因為如此，對於臺灣紡織品的市場，洋商抱持著很大的企圖心，1876 年淡水海關報告這樣記錄：「你可以看到不管是農田裡的農民，煤船上工作的船夫，甚至是一般街上的苦力，都會在天候寒冷時穿上三到四件上好的夾克，其中一、兩件一定會是由歐洲衣料製成。」⁷這一則資料顯現臺灣人民在紡織品的消費實力，同時對於洋布亦有一定的接受程度。而紡織品的輸入，是外國商人重要的獲利來源之一，僅次於鴉片的進口利益。1878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記錄了當年紡織品的貿易下跌，造成商人的困擾，因為外國商人很依賴進口貿易來獲利，所以他們對於當時紡織品的市場完全不滿意。⁸因此李祖基的說法確實反應部分年度洋布供過於求的現象，而形成進口數量的波動，但原因可能不是臺灣紡織品市場狹小所致，反而應該是洋商對臺灣的紡織品市場有企圖心，努力想要擴展銷售的數量才導致此一現象的產生。這亦是自工業革命以來，機械化所生產出大量產品之後，積極在世界各地尋求市場的現象。

如果我們用波段的方式來看英國紡織品輸入臺灣的數量，將表 3-1 的進口量，原則上以五年為一個單位來統計其輸入的平均數量，同樣可以看見不論是棉織品還是毛織品都有顯著的成長。棉織品從 1866~1869 年平均的 46504 匹，擴大為 1880~1884 年平均的 149864 匹，有三倍以上的增加；毛織品原本在 1866~1869 年平均量為 6614 匹，到了 1880~1884 年平均則為 12828 匹，有兩倍的成長。透由表 3-2 可以清楚的了解，進口到臺灣的紡織品，輸入的數量持續擴大，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並沒有衰退的現象，直到 1880~1884 才開始有成長趨緩的狀態出現。由進口總量一直增加來看，紡織品市場是不斷擴大的，這一點足以反駁李祖基市場狹小的觀點。此外，表 3-2 也反應出棉織品比重上升，毛織品比重下降的趨勢，足見棉織品在臺灣紡織品貿易的重要性與日遽增。

⁶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196 頁。

⁷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246 頁。

⁸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333 頁。

表 3-2 1866~1884 年全臺外國紡織品五年平均輸入量比較表

年次	棉織品		毛織品		合計 (匹(Piece))
	數量 (匹(Piece))	所占比例 (%)	數量 (匹(Piece))	所占比例 (%)	
1866~1869	46504	87.5	6614	12.5	53118
1870~1874	83461	91.2	8039	8.8	91500
1875~1879	145562	92.1	12518	7.9	158080
1880~1884	149864	92.1	12828	7.9	162692

資料來源：根據表 3-1 製成

二、灰襯衫布與白襯衫布的進口數量分析

在英國輸入的棉織品中，又以灰襯衫布（Grey Shirtings）和白襯衫布（White Shirtings）兩種商品的數量最龐大、也最重要。表 3-3 統計了全臺各年度灰白襯衫布的進口數量，灰襯衫布各年度的差異量蠻大的，而白襯衫布則顯現出穩定的成長趨勢。由表 3-4 的整理可以更明顯的看出兩者間輸入數量的變化。灰襯衫布從 1868~1869 平均 47008 匹的進口量，到 1875~1879 間平均量成長增為 68002 匹，多了兩萬多匹；但 1880~1884 年的平均輸入量則滑落到 56595 匹，整體而言輸入的數量變動不算太大，先是緩步成長，到了 1880 年之後略微下滑。

白襯衫布的輸入量則有驚人的成長，以表 3-4 為例，白襯衫布從 1868~1869 年間 3481 匹的平均輸入量，到 1880~1884 年的則大幅成長為 53255 匹，整整躍升了 15 倍。從兩者合計所占比例的消長來看，灰襯衫布從原來九成的比例，下跌至五成左右；白襯衫布則從不到一成的比例，成長到接近五成，兩者重要性逐漸逆轉。為何白襯衫布的進口數量能有這樣大規模的成長，而不像灰襯衫布的成長趨緩甚至有下跌的狀態？這必須要從兩種布料的「質料」和「用途」兩方面來討論。

表 3-3 1868~1884 年全臺灰白襯衫布全臺灣進口數量統計表

年次	灰襯衫布		白襯衫布		合計 (匹(Piece))
	數量 (匹(Piece))	所占比例 (%)	數量 (匹(Piece))	所占比例 (%)	
1868	43965	94.0	2808	6.0	46773
1869	50051	92.3	4154	7.7	54205
1870	54850	85.6	9200	14.4	64050
1871	83649	92.3	7006	7.7	90655
1872	30247	77.3	8894	22.7	39141
1873	56469	79.7	14394	20.3	70863
1874	72480	80.9	17084	19.1	89564
1875	91983	76.8	27859	23.2	119842
1876	66020	67.1	32423	32.9	98443
1877	72450	64.8	39392	35.2	111842
1878	44399	53.1	39199	46.9	83598
1879	65158	54.1	55203	45.9	120361
1880	59730	51.1	57241	48.9	116971
1881	46234	43.9	59088	56.1	105322
1882	48578	54.6	40319	45.4	88897
1883	73093	55.8	57902	44.2	130995
1884	55338	51.7	51724	48.3	107062

資料來源：《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68~18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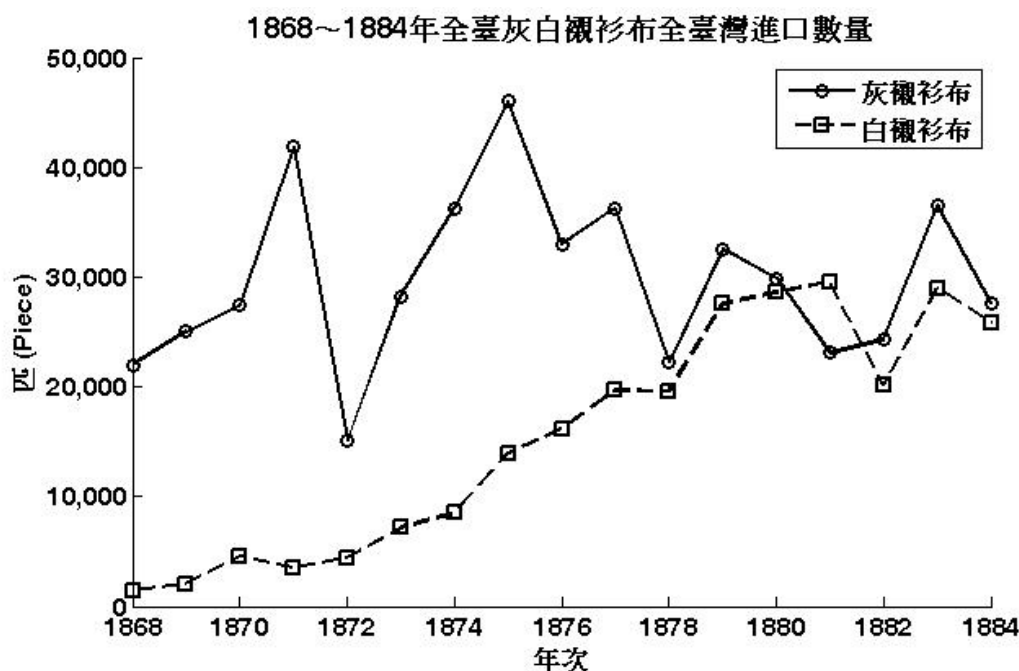


圖 3-2 1868~1884 年全臺灰白襯衫布全臺灣進口數量變化圖

資料來源：依據表 3-3 繪製

表 3-4 1868~1884 年全臺灰白襯衫布五年平均輸入量比較表

單位：匹 (Piece)

年次 \ 數量	灰襯衫布	白襯衫布	合計	占棉織品比例
1868~1869	47008	3481	50489	89.5%
1870~1874	59539	11316	70855	84.9%
1875~1879	68002	38815	106817	73.4%
1880~1884	56595	53255	109850	73.3%

資料來源：依據表 3-1~表 3-3 製成

灰襯衫布和白襯衫布兩種布料相較之下，灰襯衫布的質料較差，價格與白襯衫布相較，也沒有太大的競爭力，白襯衫布比灰襯衫布價格略高一些，但差距不是很大。1876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就提到，灰襯衫布的進口數量下跌，是由於品質較差。⁹1877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同樣也提到，灰襯衫布需求量降低的原因，是

⁹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245 頁。

因為品質差，價格又沒有比白襯衫布低多少。¹⁰1878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再次提到灰襯衫布的品質差又缺乏耐久性，本地人喜歡白襯衫布勝過灰襯衫布，所以白襯衫布的需求較高；但白襯衫布的價格對於低階級的人來說仍太高了點，所以僅限於使用在上流社會圈。¹¹上述的資料顯示，白襯衫布的品質較佳，價格也沒有比灰襯衫布貴多少，因此深受上層階級喜愛。有能力購買白襯衫布的人，不會選擇價格較低廉但品質不佳的灰襯衫布，因此從質料方面來看，白襯衫布較具競爭力，這可能是其進口數量成長的原因。

再者，從用途的角度來看，灰襯衫布和白襯衫布兩者所運用之處有很大的差異。灰襯衫布除了是製作衣服的原料之外，也曾有一段時間，被拿來當作製成茶袋的布料，而有著不錯的銷售量。製成茶袋的布料主要是灰襯衫布和 T 字布，彼此會互相影響和消長，選用哪種布料來製作茶袋，可能跟當年度進口的品質和價格有關。1879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就這樣寫到，1879 年有大量的灰襯衫布被染成巧克力色，然後被縫上茶包裝上；這份檔案同時提到，T 字布也都被這樣使用，但襯衫布完全取代了它，因為襯衫布夠耐久，也跟 T 字布一樣便宜。¹²隔年的淡水海關報告則提到 T 字布由 1879 年的 7002 匹成長為 1880 年的 12329 匹，T 字布被用來製成茶袋，因為它比原來的灰襯衫布更耐久。¹³兩年的記載有些相互矛盾之處，但可以確知的是，這兩種布料都可以用來製成茶袋，而銷量也會彼此影響。不過，隨著茶葉裝置容器的轉變，茶袋漸漸被捨棄，改以茶箱或是錫罐來裝置茶葉，因此灰襯衫布和 T 字布的數量便開始下跌。1881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就提到，灰襯衫布和 T 字布的進口數量下跌，因為它們不再是製作茶袋的原料。¹⁴這或許是表 3-4 中，1880~1884 年間灰襯衫布平均輸入量下跌的原因。

白襯衫布的用途，則在染布方面表現突出。灰襯衫布通常只會被染成黑色或

¹⁰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315 頁。

¹¹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333 頁。

¹²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401 頁。

¹³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448 頁。

¹⁴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538 頁。

暗色，¹⁵白襯衫布的質地比灰襯衫布好，且容易上色，它們染成紅色很好看，甚至取代了土耳其紅布。¹⁶1880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有更進一步的描述，白襯衫布比灰襯衫布好染，所以需求較高。當時北臺灣很多地方都開了新的染店，並從大陸雇來有經驗的染工，白襯衫布可以染成紅色、綠色、黑色等不同顏色。這些染色的襯衫布有的在當地使用，或是再出口到大陸；被染成綠色和紅色的白襯衫布在北臺灣當地普遍被使用，黑色的襯衫布則是在福州被廣泛利用。被染成黑色的襯衫布名聲傳遍世界，洗衣不容易掉色，黑色牢牢的定色，以中國人的話來說它變得更黑了。¹⁷1881 年的海關報告再次提到，大部分的白襯衫布都被拿去染色了，然後以本土手工業製品的名義再出口。¹⁸

從上述的資料顯示，隨著北臺灣染布業的發達，白襯衫布的使用也日漸增多，因其可以被染成許多顏色，供當地使用或是再出口到大陸。這是除了品質之外，白襯衫布成長的另一個關鍵因素。蔡承豪的研究更進一步認為，這種進口原色布匹，在臺灣染色加工，再回銷大陸的現象，使得臺灣的染布業從以服務臺灣島內的市場為主，轉變為一個為大陸市場加工染布的型態，讓其生產規模急遽擴大，不論技術或數量都出現可觀的成長。¹⁹這樣的論點，可以說明適合用來染色的紡織品，其輸入數量成長的原因。白襯衫布便是因為適合染色，因此進口數量不斷成長，1881 年全臺進口數量首次超越灰襯衫布，1880~1884 年間的平均輸入量也追上灰襯衫布，僅有小幅的差距。

總之，灰襯衫布和白襯衫布是英國進口到臺灣的紡織品中，最重要的兩項產品。從表 3-4 中可看出它們在英國棉織品的輸入中，一直占有七成以上的輸入量。灰襯衫布原本是英國輸入最多的紡織品，它的價格低廉，也曾被作為茶等商品的包裝帶來使用，但由於品質沒有白襯衫布好，製作茶袋的功能也逐漸式微，因此

¹⁵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333 頁。

¹⁶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401 頁。

¹⁷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448 頁。

¹⁸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538 頁。

¹⁹蔡承豪，〈從染料到染紡—17 至 19 世紀臺灣的藍靛業〉，〈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 251。

輸入臺灣數量的成長幅度有限，在 1880 年之後還陷入衰退。反觀白襯衫布，由於品質較佳，價格與灰襯衫布差距不大，越來越受到臺人喜愛，成長速度驚人；尤其是白襯衫布很適合染色，可以染成黑、紅、綠等顏色，除了在臺灣當地使用之外，也回銷到大陸，帶動臺灣染布業的發展，更增加了進口白襯衫布的數量。因此，白襯衫布從不到灰襯衫布十分之一的進口數量，到了 1880 年代進口到臺灣的數量已不亞於灰襯衫布，兩者皆為英國輸入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紡織品。

三、英國紡織品與土布的競爭

從前述的討論，我們可以得知臺灣開港之後英國紡織品在臺有不錯的成長，進口數量持續攀升。不過雖然開港之後，外國的紡織品得以進入臺灣，但清治前期臺灣與大陸地區的區域分工並未中斷，臺灣仍透過船舶貿易從大陸輸入各種紡織品，因此英國紡織品想進入臺灣市場，就不得不面對中國紡織品的強大挑戰。此外，臺灣島內也開始有較具規模的自製紡織品，南臺灣的黃梨布（鳳梨布，Pine-apple Cloth）和番布。這些紡織品都會與英國紡織品形成彼此競爭的局面。由於海關檔案記錄的商品數量，只有四個通商口岸的貿易數值，所以我們也無從得知在清治後期中國紡織品在臺灣正確輸入數量，不過從海關檔案淡水和打狗的報告書的文字記錄，和英國領事報告書中的描述，皆可以看到英國紡織品在臺灣面對競爭的情形。

在 1875 年的打狗海關報告就提到，外國紡織品有一個難以抗衡的競爭對手—本土製商品，因為它比較堅固耐用，所以對較窮的階級來說比較經濟實惠，因此外國製造商必須賣的更便宜。²⁰所謂的本土製商品，就是在外國紡織品進口到臺灣之前，在本地流通的紡織品，這些商品包含透過區域分工從大陸進口到臺灣的紡織品，以及臺灣本地自行生產的紡織品。這兩種產品我們都可以把它稱為本土製的紡織品，簡稱土布。也就是說從英國進口的紡織品，相較於物美價廉的

²⁰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197 頁。

土布，競爭力不足，所以必須降價求售。

李祖基對於英國紡織品價格下跌，提出的理由是引用淡水領事報告的說法，認為外國紡織品在剛開始進入臺灣市場時，由於僅有兩家洋行，輸入的洋布數量有限，故容易控制市場，維持高價，但之後新的洋行相繼設立，它們之間相互競爭導致價格下降。但除了同業競爭的因素之外，主要的原因同樣是中國紡織品的競爭，他認為英國紡織品的品質一直難以改善，面對質優價廉的中國紡織品，唯一的出路就是降價求售，以提高競爭力。李祖基指出正是在這樣的競爭中英國紡織品才能逐漸拓展其市場，也是銷量逐年增加的原因。²¹這樣的說法確實可以反應一部份當時的情況，但忽略了英國紡織品不是只有單一產品，不同商品的品質和價格是有所差異的。但他注意到了面對中國紡織品的競爭，洋布在價格上需要調整來提高競爭力的情況。

李祖基對洋布進口的對臺灣的影響，還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他認為由於臺灣原來是個移墾社會，手工業並不發達，所需的紡織品及其它生活日用品以往均仰賴大陸供給，故洋貨的傾銷並未造成本地的手工業的衰落，而只是引起大陸輸臺的棉布、日用品等商品下降。這種洋、土貨輸入彼此增減的現象，他認為在土布進口數量上表現的最為明顯。李祖基引用海關檔案的數據證明此一想法，因為在海關歷年的輸入資料中，洋布的進口數量穩定上升，反觀土布的進口數量一度下降，之後即使有回升，但由於洋布輸入量增加的速度更快，所以土布輸入值所占棉毛織品的進口總值比例比洋布低，並且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²²

然而，李祖基這項說法，確有再思考的必要。引用海關檔案中的進口數字，是無法反應全臺紡織品的進口總數的。海關資料中僅記載四個條約港的輸入量，這些數字比較貼近主要以條約港進口的洋貨，但不適合用來解釋以中式帆船運送的土布。因為中式帆船不是只在條約港停泊，而會將土布輸送到全臺其它港口，因此想以條約港中的土布進口數量，用來解釋全臺土布與洋布的消長並不恰當。

²¹李祖基，《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 57-58。

²²李祖基，《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頁 86-87。

林玉茹認為開港後的傳統港市直到十九世紀末，仍持續與中國大陸沿海各港的中式帆船貿易。²³林滿紅則認為由於洋貨之進口，與本地農產品的出口多由大陸轉口，臺灣仍從大陸進口日用手工業產品，出口蔗糖至華北、華中，因此西方貿易的擴張反而加強了兩岸間的經貿關係。²⁴她還引用《舊慣調查會調查經濟資料報告》指出，直至 1896 年日本領臺之初，每年仍有 2800 艘左右的中式帆船進出臺灣與大陸之間，顯示清末兩岸間的中式帆船貿易一直很活躍。²⁵因此土布輸入臺灣的情形，不會是李祖基所認為的，被洋布瓜分市場而使得進口數量下降，反而是洋布必需在土布在地優勢下，努力的開拓市場。

《淡新檔案》中也有出現土布透過中式帆船輸入的相關記載。淡新檔案第 33504 號案，是有關光緒元年（1875 年）艋舺泉郊益興號船金義成號，在大牛稠港被搶劫的案件。金義成號在大牛稠港口因風擱淺，之後被數百名搶船者「乘其水淺，擁至船下」，最初稱是「代搬船棹出淺」，接著斬斷棹索，「蜂擁上船，攻搶船貨」，船帆雜物被「洗劫無遺」。²⁶當時船上損失的貨物中，包含的紡織品有襪布 110 匹，井淺布 130 匹。²⁷這些商品本來是要從大陸運送到臺灣來販賣，但因為擱淺所以被臺灣民眾搶奪。這一則史料清楚的顯示中式帆船運送紡織品來臺貿易的情況。

1876 年的打狗海關報告同樣記錄了英國紡織品的與土布競爭的情形。當時土布競爭對手有江蘇製造的南京布（Nankeens）、及臺灣本地生產的黃梨布（鳳梨布，Pine-apple Cloth）和番布（Savage Cloth）。報告中指出要拿到南京布的正確進口數量很難，雖然知道有數量龐大的中式帆船帶來大量輸入，但報表上顯示只有 49 擔，只占實際數量的一小部分。黃梨布則是一種在南臺灣被大量製造與消

²³林玉茹，〈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臺灣史研究》17 卷 2 期（2010），頁 29。

²⁴林滿紅，〈清末臺灣與我國大陸之貿易型態比較（1860~1894）〉，《師大歷史學報》6 期（1978），頁 240。

²⁵林滿紅，〈四百年來的兩岸分合：一個經貿史的回顧〉，（臺北：自立晚報，1994），頁 32。

²⁶林玉茹，〈清末北臺灣漁村社會的搶船習慣—以《淡新檔案》為中心的討論〉，新史學 20 卷 2 期（2009），頁 125-126。

²⁷《淡新檔案》第 33504-4 號。

費的本土製紡織品。它具有堅韌且粗糙的特性，以鳳梨葉的纖維織成，是較粗糙草織品的代表。黃梨布常被用來做成工作服，是在炎熱氣候下適合農人穿著的紡織品。它主要產於黃梨山，那裡的女人們常在夏天的晚上成群的坐在家門外，一邊聊天一邊織布，這些織出來的黃梨布多半是家庭自用，有時在街上也可以見到農人帶著小包的布在街上兜售，有些商店也會零售這項商品。最貴的黃梨布可買兩倍寬的灰襯衫布，不過黃梨布的耐久性可以補償它相對較高的價格。番布則是另一種草織品，有許多居民，尤其是居住在鄰近山區的居民都穿它。如同它名字隱含的，番布是由番人製造，他們利用它來交換煙草、火藥等物資。番布比黃梨布更好更貴，在臺灣府的小店有少量的番布販售，較高品質的番布受到有錢人的青睞，因為其結構精緻細膩，常可以賣出很高的價格。²⁸

英國打狗海關報告中粗略估計這四種紡織品在南臺灣所占的比例：分別是外國紡織品（Foreign Cottons，幾乎全都是英國紡織品）占 40%，南京布占 35%，黃梨布占 17%，番布占 8%。²⁹這樣的觀察數字與現實貼近的程度有多少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英國紡織品相較於本土的紡織品（中國加臺灣）在南臺灣的市場占有率，是屈居少數的那一方。

不過，如果就當時方志的觀察，臺灣社會依然呈現出「男耕女不織」的特有現象，跟海關的描寫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光緒年間的幾本方志都有類似的記錄，《雲林縣采訪冊》就寫到：「婦女精勤針黹，不出戶庭。惟蠶桑未興，莫解紡織。」³⁰《安平縣雜記》則提到：「男有耕而女無織，以刺繡為工。」³¹《樹杞林志》中亦有：「蓋臺灣女紅，雖蠶桑不事、紡績無聞；而刺繡之工，一花一卉，精緻如繪」這樣的記錄。³²也就是說臺灣的婦女依然不織布，但卻精於刺繡，這與海關報告的觀察有明顯的落差。這樣的情形顯示臺灣本地的紡織業，可能普遍來說還是不發達，但南臺灣的某些地方已經有一定數量的自製紡織品出現，但在市場流

²⁸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258-259 頁。

²⁹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259 頁。

³⁰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66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29。

³¹ 《安平縣雜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52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9-10。

³² 林百川、林學源合纂，《樹杞林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3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98。

通的狀況有限，而通常是供應家庭自用。

1878 年打狗海關報告再次提到，外國布料必須競爭的對手有進口的本土製品，以及臺灣家庭織品出色的樣式和非常耐久的品質。³³1878 年臺灣領事報告書的記錄則更悲觀：

棉、毛製品在 1878 年大幅滑落，另有不確定的消息指出這些貨品以中式帆船輸入。也由於英國製造的織品上過多的漿，所以難被本地消費者接受。悲慘的是，英國的布料在此地從未超過輸入的 10%。西方的工業製品無法與東方的手工製品競爭。農人在農閒時用手織布機製造比西方機器製品更便宜耐用的布料。³⁴

上述的資料顯示，英國紡織品在臺灣的貿易，一直受到中國進口到臺灣的布帛牽制，及臺灣本地開始有一定產量的紡織品的競爭。不過，由於番布和黃梨布的記載，主要存在於南臺灣的文獻，這兩種臺灣自製的紡織品，因為受到臺灣島內南北運輸阻隔的影響，大量輸送到北臺灣的機會不高，因此英國紡織品的在臺灣南北所面對的競爭情形應該不盡相同。北臺灣應是較單純的二元對立，就是英國紡織品與中國紡織品的競爭。1882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就記錄 Mr.Lay 在 1878 年談到，灰襯衫布因為品質很差而被南京布所取代，因為南京布比較好穿又比較便宜。報告中也提到灰襯衫布進口數量年年失利，漸漸讓位給白襯衫布和南京布。³⁵南臺灣則多了臺灣本地製作的紡織品加入競爭，且具有一定的市占率。不過正如前述 1878 年英國領事報告書的記錄，英國紡織品面對此一競爭局面，一直是處於較為不利的地位，英國的布料在此地從未超過輸入的 10%，也悲觀的認定西方的工業製品無法與東方的手工製品競爭，農人在農閒時的手織布匹，比西方機器製品更便宜且耐用。

³³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358 頁。

³⁴.1878 年臺灣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2, p. 432。

³⁵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583 頁。

然而，正因為本地紡織品擁有較大的市占率，所以英國紡織品一直努力想要開拓更大的市場，試圖輸入更多的英國紡織品，來平衡臺灣大量出口的茶、糖、樟腦等貨品之貿易逆差。正如 1878 年淡水海關報告出現的感慨：「外國商人很依賴進口貿易來獲利，因此對現在的紡織品市場完全不滿意。」³⁶即使英國紡織品的輸入量逐年上升，但成長幅度與市場占有率可能與原本的預期仍有不小的差距。

此外，土布在價格上也同樣占據優勢的地位，這也讓英國紡織品倍感壓力。1878 年的淡水領事報告就談到：「較貧窮的階級在年初為了應付高米價的困境而轉向購買南京棉布，因此南京棉布經由外國輪船與中式帆船進口的量雙雙提升。」³⁷另一方面，1882 年的淡水領事報告寫到：「紡織品貿易主要掌握在中國人手中」，³⁸同年的臺灣領事報告也提及：「棉織品與毛織品的現在可說是漸漸脫離外國商人的掌握」，³⁹出現連洋布也漸漸被華商掌握的情況。這些都是洋商在臺拓展紡織品的困境。

總之，英國紡織品在開港後進入臺灣市場，面對的是與當地原有的土布競爭，形成土洋大戰。在這場戰爭中，英國紡織品並非得勝的一方，進口的數量和所占紡織品市場的比例，仍遠落後於中國紡織品。英國紡織品降低價格以提高自身的競爭力，來面對物美價廉的本地製品，另一方面品質較優良的白襯衫布進口的數量也逐漸提升，填補輸入數量逐漸下滑的灰襯衫布需求。英國紡織品一直企圖擴展在臺灣的市場，雖然整體的進口數值有所成長，但這樣的增加幅度對英商而言，仍不足以帶來可觀利益，平衡臺灣大量出口的茶、糖、樟腦等貨品之貿易逆差。

³⁶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333 頁。

³⁷1878 年淡水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2, p. 451。

³⁸1882 年淡水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3, p. 210。

³⁹1882 年臺灣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3, pp. 194-195。

第二節 東西洋布與土布競爭時期（1885～1895）

如前所述，1884 年之前由外國進口到臺灣的洋布，以英國紡織品占絕大多數，為英國紡織品獨霸洋布進口時期。但到了 1880 年代，日本紡織品進入臺灣市場，此後快速成長，進一步威脅到英國紡織品獨霸洋布市場的狀態，成為新的競爭者。由於英國紡織品與日本紡織品都是由外國進口到臺灣的洋布，因此把來自英國的紡織品稱為西洋布，從日本輸入臺灣的紡織品稱為東洋布。從 1885 年起，臺灣紡織品的市場正式進入三足鼎立的局面，呈現東西洋布與本地原有的土布彼此競爭的狀態。

一、日本紡織品的輸入與數量分析

自 1881 年起，日本紡織品開始進入臺灣市場，1881 年僅有 303 匹日本棉布從淡水海關輸入臺灣，到了 1885 年已迅速成長至 23874 匹，占北臺灣棉織品進口數量的 14.56%，全臺棉織品進口數量的 10.36%，正式突破一成的棉織品市場占有率，這些日本布全部都是由淡水海關輸入。1887 年打狗海關才首次輸入 5942 匹日本布，因此本文以 1885 年做為分界，來表示紡織品進入一個新的競爭局面。

根據海關檔案的記錄，日本輸入臺灣的紡織品，主要有日本棉布（Japanese Cotton Cloth），日本棉絨布（Japanese Cotton Flannel），日本縐紗布（Japanese Cotton Crape），洋紅市布（Japanese Turkey Red Shirtings）和日本毛巾（Japanese Towels）等商品。這些商品都屬於棉織品，除了日本毛巾以「打」為計量單位之外，其他都是用匹來計算。其中輸入量最為龐大也最重要的是日本棉布，占日本紡織品最大比例的進口數量，其次是日本棉絨布。

從 1881 年開始有日本紡織品進口到臺灣以來，本文將其輸入的數量整理成表 3-5。由該表可以發現，日本紡織品從 1885 年突破全臺進口棉織品 10%，之

後持續大幅度成長，1886~1891 年間，約占全臺進口棉織品的 15%~20%，1892 年瞬間上升至全臺進口棉織品的 35%，1893、94 年則大致占全臺進口棉織品的 4 成。10 幾年間有驚人的成長，如果以最初 1881 年輸入量僅有 303 匹，對照 1894 年的最大進口數量 131879 匹，整整擴大了 435 倍。為何日本紡織品可以成長的如此迅速呢？

表 3-5 日本紡織品進口數量與所占全臺進口棉織品比例表⁴⁰

單位：匹 (Piece)

數量 年次	日本紡織品進口數量		全臺合計	
	淡水	打狗	合計	占總棉織品比例
1881	303		303	0.21%
1882	540		540	0.45%
1883	3045		3045	1.77%
1884	5519		5519	3.68%
1885	23874		23874	10.36%
1886	41569		41569	23.18%
1887	34075	5942	40017	19.39%
1888	26852	6742	33594	17.87%
1889	24916	7100	32016	16.86%
1890	16719	12722	29441	14.72%
1891	34159	10734	44893	21.20%
1892	62444	11692	74136	35.20%
1893	74520	8127	82647	39.01%
1894	125597	6282	131879	42.62%
1895	19579	3179	22758	30.26%

資料來源：《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81~1895。

註：海關資料的統計數字，在 1895 年因戰爭等因素，僅統計至 6 月，因此當年度的統計數量在圖表中常呈現出明顯下跌的狀態。

⁴⁰.由於日本毛巾的記量單位為打，與其它日本紡織品不同，因此在進口數量上，沒有列入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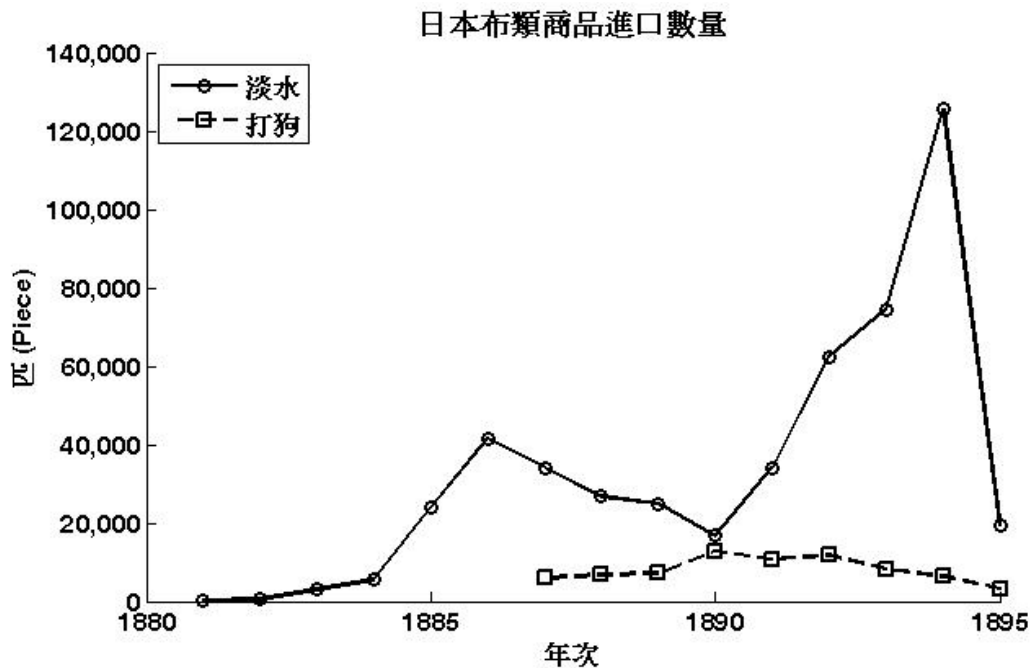


圖 3-3 日本紡織品進口數量變化圖

資料來源：依據表 3-5 繪製

根據李祖基的研究，他引用 1882~1891 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中的說法，認為東洋布輸臺數量之所以可以迅速增加，是因為日本棉布不是那種「充滿著白粉和膠質，帶有一種光澤的表面，其幅碼不適合使用者需求的产品」，讓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外國貨的東西；而是一種質地粗糙、未經漂白，幅碼也能配合其用途並與使用者習慣相符，完全模仿土布的棉布。⁴¹英國領事報告中，曾記載由於英國製造的織品上過多的漿，所以難被本地消費者接受。⁴²日本棉布則沒有這樣的缺點，加上它很適合染色，因此廣受歡迎。蔡承豪則認為隨著北臺灣的染布業興起，染色的方便與否，成為布料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白襯衫布和南京布較灰襯衫布容易上色，但東洋布又比西洋布更適合臺灣人使用，使得這些紡織品廣受臺灣民眾的喜愛。⁴³上述的原因讓日本棉布輸入的數量急速成長，成為臺灣人民消費紡織品中新寵兒。

⁴¹李祖基，《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 60。

⁴²1878 年臺灣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2, p. 432。

⁴³蔡承豪，〈從染料到染紡—17 至 19 世紀臺灣的藍靛業〉，（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 227。

在 1884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則提到，日本棉布進入臺灣之後，它就流行於有錢階層之間，日本棉布比較便宜，又有光滑美好的表面，它沒被洗過的話很容易被誤認成絲。人們在夏天通常喜歡用日本布取代草布，而且在下雨天也會穿著日本布來代替絲。⁴⁴由此可見，日本棉布剛開始輸入臺灣，就已經受到臺灣人民的歡迎，其受歡迎的情形不只發生在北臺灣，南臺灣也是如此。1892 年的臺南海關報告就說：日本棉布的需求有持續上漲的趨勢，因為它便宜又耐久，應該可以持續找到樂意購買日本棉布的人。⁴⁵

總之，日本紡織品進入臺灣之後，廣受民眾喜愛，進口數量持續成長，所占外國棉織品的輸入比例，也從最初幾年僅占個位數的比例，之後快速攀升。在 1886~1891 年間，約占全臺外國進口棉織品的 15%~20%，1892 年突破 35%，1894 年超過 40%，成為除了西洋布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輸臺紡織品。

二、新的布品競爭局勢

日本紡織品進入臺灣之後，英國紡織品不再一枝獨秀，外國進口到臺灣的紡織品形成東西洋布對抗的局面，而本地的紡織品，不論是從大陸輸入的，還是臺灣本島生產的，依然保有強大的競爭力，東西洋布和土布共同分食臺灣紡織品市場，展開新的布品競爭局勢。

英國棉織品在 1885~1895 年間，呈現先成長後衰退的現象，我們將外國總進口棉織品數量減去日本紡織品的進口數量，得到的數字大致上就是英國棉織品的進口數量，以此製成表 3-6。又排除因戰爭因素讓輸入量大幅減少的 1895 年，1885~1889 的五年平均輸入量是 164603 匹，比起 1880~1884 年間的 149864 匹成長約一萬五千匹。這顯示即使面對日本紡織品和本土紡織品的競爭，這段時期英國棉織品仍有一定的成長，但 1890~1894 的五年平均輸入量則只剩 156144 匹，

⁴⁴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646 頁。

⁴⁵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977 頁。

呈現遞減的趨勢。這也是首次英國棉織品在五年平均量出現下跌的情形。

表 3-6 1885~1895 年英國棉織品約略進口數量表

單位：匹 (Piece)

年次	數量
1885	206621
1886	137742
1887	166414
1888	154392
1889	157846
1890	170623
1891	166896
1892	136469
1893	129189
1894	177544
1895	52456

資料來源：《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85~1895。

不過這樣的情況，只能表示在英國棉織品在海關的輸入量下滑了，未必表示英國棉織品的總輸入量就一定是下滑的。1886 年的臺灣領事報告這樣記載到：以西式船舶輸入外國布料的數量減少很多，然而據本地最大的兩家輸入商說，用中式帆船輸入的量增加了。⁴⁶也就是說英國紡織品的輸入，也跟中國進口到臺灣的紡織品一樣，開始有了由中式帆船輸入的情況產生。當年度的報告還提到，用中式帆船運貨不需輸入稅，所以貨物比較便宜，一般而言他們支出的費用比西式船舶少，所以中國貿易商可以比外商廉售，造成棉布貿易幾乎都被中國商人掌握。⁴⁷1890 年的臺南領事報告再次寫道：「如同平常有大量的棉織品是經由中式

⁴⁶.1886 年臺灣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4, pp. 110-111。

⁴⁷.1886 年臺灣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4, pp. 110-111。

帆船載運，這個項目完全操縱在當地人手中。」⁴⁸1892 年的打狗海關報告也提到，這裡的外國商人，如同其它很多港口的商人，現在幾乎都已經不經營外國進口到臺灣的紡織品，中國人掌握了全盤的貿易。⁴⁹

這樣的情形表示，由於中式帆船不用被抽稅，所以由中式帆船運送到臺灣的西洋布，比起由海關進入臺灣的紡織品，在價格上更有競爭力。這自然壓縮了洋商的貿易空間，使得洋商漸漸無法從進口紡織品獲利。這種現象從何時開始發生，並沒有一個確切可以掌握的時間，但可能在 1882 年前就已經發生了。1882 年的打狗海關報告就提到，棉和羊毛紡織品的貿易主要掌握在本地商人⁵⁰的手中，大部分是香港和汕頭人。⁵¹同年的臺灣領事報告也提到，棉毛製品的貿易現在或許可說漸漸脫離外國商人的掌握。⁵²上述的資料顯示，在 1882 年已經有許多中國商人加入洋布的買賣中，分食進口洋布這塊貿易大餅，外國商人漸漸喪失在洋布市場的獨占性，加上中式帆船不通過海關，不需要被課稅，在價格上便更有競爭力，中國商人在擁有這樣有利的條件下，逐步削弱洋商對外國進口紡織品貿易的掌握。這樣的情形可能隨著時間日益加遽，才會在 1892 年的資料中，出現洋商對於經營進口紡織品的貿易感到卻步的情況發生。也就是說，此一時期中國商人也積極參與洋布的買賣交易，並對洋商造成嚴重衝擊，形成華、洋商人彼此在洋布市場中相互競爭的局面。

除此之外，雖然英國商人一直希望能夠增加西洋布在臺灣的銷售量，也期待能擴大其銷售範圍，卻遲遲無法達成。紡織品的消費常侷限在條約港口附近，也沒法獲得可觀的利益。⁵³這種現象其實跟當時臺灣的時空背景也有關係。紡織品要從條約港運送到臺灣其它的城鎮，通常需要靠苦力挑運過去，因為臺灣沒有運河，少數可以航行的河川也只能通行一小段距離。雇用挑夫運送的距離越遠，所

⁴⁸. 1890 年臺南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4, p. 379。

⁴⁹.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977 頁。

⁵⁰. 當時洋人眼中所謂的本土商人，並不特指大陸商人或是臺灣商人，而是兩者的合稱。

⁵¹.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598 頁。

⁵². 1882 年臺灣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3, p. 194。

⁵³.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598 頁。

付出的運費就會累積成可觀的成本，讓洋布的售價勢必要提高，導致貧窮階層消費不起。⁵⁴因此洋商們很期待清朝政府能開闢一條鐵路，讓進口商品能便捷地以低廉的價格運送到其它地區，否則光靠苦力一擔一擔的挑運，根本就不可能擴展紡織品貿易的範圍，光是運輸成本就無法負荷。交通運輸的這項因素，使得臺灣雖擁有龐大的紡織品貿易市場，但洋布的銷售卻因為沒有便捷的運輸工具，無法有效的擴展貿易範圍，市場圈被限制在條約港附近。當這一帶的市場趨於飽和，洋布的銷售就會趨緩。這是英國紡織品即使很早就進入臺灣市場，但進口數量成長到一定階段之後，便開始趨緩的原因之一。正因為運輸不便，也給予中國商人可趁之機，利用中式帆船輸入洋布，運送到洋商不易到達的範圍進行銷售。

再者，英國紡織品有一些先天條件並不是很適合臺灣當地的民眾。其與土布不同的幅碼，在布匹上上漿也難以被臺灣民眾接受，加上英國棉織品也不如中國土布堅固耐用，不適合需要穿著工作一整天的人。1885年的領事報告也這麼說，英國棉布非常不適合勞工穿著，只能視為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⁵⁵同年的報告中有這麼一段話，道出英國紡織品在臺灣的銷售困難的原因：

這裡所述的事情不僅適用於臺灣，而是整個清帝國。中國人只穿本土服裝，不穿任何其他服裝。我在十八省中的十二省檢視了人口中占大多數的勞工的衣著，結果如下所述。我們的襯衫布與棉織品僅適合用於內襯、壽衣、有錢人的內衣以及久坐窮人的外衣。無論在紗線、織法、長度或寬度上，都完全不適合李、張、王、劉、趙這些數以百萬計辛勤勞動的穿著。從廣東到甘肅，從四川到直隸，他們穿的是耐用、粗糙、樸實、扯不破的家庭紡織布。因此，倘若我們持續保守地迎合少數人使用的奢侈品而忽略多數人的必需品，我們出口至中國貨品的價格就會繼續低迷，且其數量相較於數以百萬計穿著棉織品的中國人口，就會繼續少的荒唐。中國並不是

⁵⁴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807頁。

⁵⁵.1885年臺灣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3, p. 744。

一個服裝只需要棉質手帕，或用蘭開郡 (Lancashire) 劣質品，或是薄襯衫布做的包頭巾就夠了的國家。每年之中有六到十個月中國人都舒服地穿著厚棉布所做的夾克、長褲與內衣。這些厚棉布都是中國人織的，所用的紗也是中國人紡的，紡紗的棉也是中國田地種出來的。⁵⁶

這些因素導致英國紡織品在臺銷售成長到一定階段之後，就會出現瓶頸，甚至造成一些紡織品進口數量下滑的情形。雖然英國製造商也曾試圖改善這樣的情況，但並沒有成功。1887 年的臺灣領事報告就說：「曼徹斯特對於本土布的模仿複製失敗了」，⁵⁷這也是英國紡織品擴展受挫的原因之一。因此，即便當地的消費力有所提升時，這個成長的契機也會被東洋布和土布大量瓜分。總之，此時期英國的紡織品，從海關輸入的資料顯示，是呈現先成長再小幅衰退的景象，但可能已經有相當多的西洋布是不透過海關，而是透由中式帆船的運送，直接進入到臺灣市場。英國進口的棉織品還是以灰襯衫布和白襯衫布為主，T 字布也有一定的輸入量。

東洋布則如前文所述，由於尺寸跟土布相似，又很適合染成各種顏色，因此廣受臺灣人民喜愛。1889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這樣描述日本紡織品：「日本紡織品類似土布，不但更便宜且同樣的堅固耐用，因此比英國紡織品更受到民眾的歡迎。」⁵⁸ 1894 年淡水領事報告也說：「日本紡織品在近幾年有相當大的進展，從 1894 的海關報告來看，出現許多東洋布的產品，其中以日本棉布為最大宗。」⁵⁹東洋布在臺廣受歡迎，隱隱有取代英國紡織品在臺灣市場的位置。1893 年的臺南領事報告就提到：「英國紡織品被日本紡織品所取代，因為它價格低廉且顏色鮮豔。」⁶⁰1895 年的淡水領事報告，同樣談到東洋布逐漸取代西洋布的現象，因為

⁵⁶.1885 年臺灣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3, p. 743。

⁵⁷.1887 年臺灣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4, p. 174。

⁵⁸.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829 頁。

⁵⁹.1887 年臺灣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4, pp. 182-183。

⁶⁰.1893 年臺南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4, p. 617。

它價格較低、花樣色彩多變、與較適合臺灣氣候等因素。⁶¹由此可見東洋布與西洋布，彼此爭奪臺灣的紡織品市場，而競爭過程中，日本紡織品逐漸取得領先的地位。

不過，不論是東洋布還是西洋布，在臺灣最大的競爭對手還是土布。雖然在海關資料中，從大陸進口到臺灣的土布，像是南京布的進口數量就很稀少，常常只有幾百匹布的量。但這卻不能代表實際從大陸進口到臺灣的土布數量，因為還有大量無法被計算與記錄，透過中式帆船運送到臺灣的紡織品，這是延續清治前期以來，由區域分工從大陸進口到臺灣的紡織品。過去有研究認為，英國紡織品的大量進口，幾乎完全取代了由大陸運銷來臺灣的中國棉布（南京布）。⁶²這樣的說法可能就是因為海關檔案中南京布進口數量稀少，而得出英國紡織品取代南京布的判斷。但這種看法是需要再討論的，因為土布交易，一方面是延續清治前期的區域分工，由臺灣和大陸間的港口經中式帆船直接貿易，本來就不會經過海關；另一方面原本經過條約港輸入的中國土布，為了要避免被課關稅，也不會選擇由海關輸入臺灣，這些才是形成海關資料中土布進口數量稀少的原因。

林玉茹在其《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一書中同樣談到這樣的現象。他指出 1880 年之後，由於官方實施新制釐金稅，為了逃避課稅和釐金，中式帆船貿易乃相當盛行；這些較具規模的非通商口岸與大陸的貿易仍極為頻繁，而且有相當強的獨立貿易機能。因此，開港後臺灣港口的貿易，一方面呈現各地向條約港口集中，另一方面又出現各自分散與大陸直接貿易的情形。⁶³土布便是透過這些非條約港輸入臺灣。

至於這個時期有哪些非條約港與中國大陸貿易呢？〈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這篇文章談到十九世紀中葉，依據港口規模與地域經濟發展程度之差異，臺灣形成南北兩個雙核心國際港、正口以及小口等三層港口系統，且彼此之間存在市場圈相互從屬，卻又各自直接對外貿易的分立

⁶¹.1895 年淡水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5, p. 488。

⁶².薛化元等編，《臺灣貿易史》，（臺北：外貿協會，2008），頁 115。

⁶³.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臺北，知書房，1996），頁 323。

關係。⁶⁴圖 3-4 中可看到臺灣西部有許多港口，這些非條約港會各自與中國大陸進行貿易。大致上國際港埠的貿易範圍擴及世界各地，傳統港口的貿易網絡雖然北至錦州、天津、寧波、上海，南至香港，但是仍集中於福建各港。北部地區港口的貿易地點，以福州、泉州為主；中部以泉州為中心；南部地區則以廈門、汕頭居多。⁶⁵這些港口仍持續輸入中國紡織品進入臺灣。

林玉茹在〈由私口到小口：晚清臺灣地域性港口對外貿易的開放〉一文則引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的陳情書，來證實清末這些非條約港口的貿易活絡情形。⁶⁶1895 年日本領臺後，日本殖民政府原僅開放清末四個條約港的國際貿易體制。之後又實施「特別輸出入港」政策，亦即指定臺灣島內沿岸 7 個港口作為特別輸出入港，得以讓中國帆船來港貿易。這個制度卻無法符合原來清末沿岸眾多港口已經直接進行島外貿易的事實。未被指定的港口僅能轉為島內沿岸貿易港，頓時在兩岸商業貿易和交通上產生極大不便。1896 年至 1899 年之間，地方紳商於是陸續出來向總督府陳情，希望繼續延續清末舊慣，准許其島外貿易。⁶⁷這顯現開港後非條約港與大陸間直接往來的貿易情況十分普遍，因此當日治初期殖民政府有所限制時，才會出現這些反彈的聲浪。也因為中國與臺灣非條約港間的頻繁互動，致使海關資料中的土布數量是嚴重被低估的。

⁶⁴林玉茹，〈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臺灣史研究》17 卷 2 期（2010），頁 11-12。

⁶⁵戴寶村，〈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頁 53-54；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頁 52-53。又根據 1897 年的調查，臺灣與中國沿海帆船貿易的航線，大概以中部鹿港、梧棲為界，鹿港以南地區各港主要與泉州、廈門、汕頭各港貿易較頻繁；鹿港以北各港則多至泉州、福州及溫州。淡水、基隆以及蘇澳的帆船也常至寧波。大藏省理財局，〈臺灣經濟事情視察復命書〉，（東京：忠愛社，1899），頁 63-65。轉引自林玉茹，〈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頁 12。

⁶⁶林玉茹，〈由私口到小口：晚清臺灣地域性港口對外貿易的開放〉，頁 14，會議論文。

⁶⁷蔡昇璋，〈日治初期港口「郊商」與「特別輸出入港」之設置〉，《臺灣文獻》57 卷 4 期（2006），頁 176-210。轉引自林玉茹，〈由私口到小口：晚清臺灣地域性港口對外貿易的開放〉，頁 14，會議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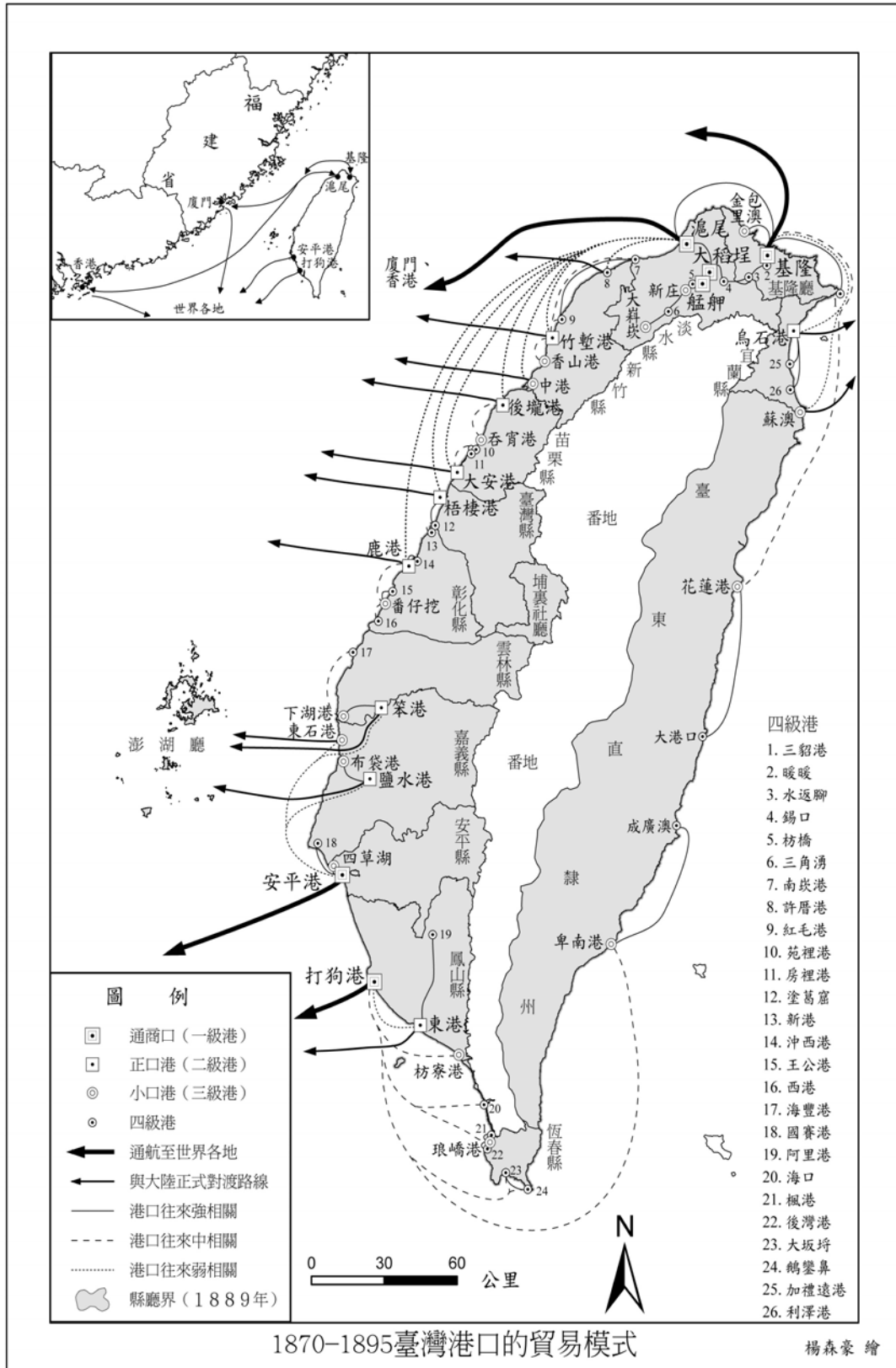


圖 3-4 1870~1895 年臺灣港口的貿易模式圖

資料來源：林玉茹，〈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頁 12。

海關檔案中同樣觀察到土布透過中式帆船進口的現象，另外也談到土布受到歡迎的原因。1888 年淡水海關報告說土布在海關進口數量少，是因為有更多的土布是透由中式帆船載運，從寧波和廈門運送到臺灣，而利用中式帆船來運送土布，可以避免關稅的課徵。⁶⁸1889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則提到，經過海關的土布數量都很少，所以我們推測土布一定是找到用中式帆船運送進來的的方法，來供應增加的消費。⁶⁹1886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顯示，富裕的工人階級幾乎只愛用南京布和一些本土製造的紡織品。⁷⁰1888 年的打狗海關報告，就敘述土布似乎比外國襯衫布更受歡迎，雖然它比較貴，但更堅固耐用。⁷¹上述的資料顯現出土布依然受到臺灣民眾的喜愛，也大量被消費，並對英國紡織品產生威脅。不過，海關檔案也提到東洋布成為土布的銷售對手，⁷²可見兩者間的競爭關係也很劇烈。

總之，從 1885 年起，臺灣的紡織品貿易市場，就呈現出三國鼎立的的局面，西洋布、東洋布、土布三方彼此競爭。西洋布雖然仍有一定的成長，但相較於東洋布飛越性的增加幅度，又顯得弱勢了許多。東洋布則是此時期鋒頭最健的產品，適合染色且兼具土布的優點，使它成為臺灣民眾製作服飾的新寵兒。土布則延續過去以來透過中式帆船進入臺灣的方式，持續發揮影響力，仍是臺灣民眾使用最多的紡織品之一。

第三節 全臺外國紡織品的總量討論

前兩節我們以 1885 年作為一個時間斷限，1885 年之前是英國紡織品獨霸外國進口紡織品時期，西洋布壟斷了進口布匹，成為土布最大的競爭者，一同瓜分臺灣的紡織品市場。1885 年後有了新的挑戰者日本布的加入，紡織品進入三足

⁶⁸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789 頁。

⁶⁹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828-829 頁。

⁷⁰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716 頁。

⁷¹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807 頁。

⁷²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829 頁。

鼎立的局面。本節則是不論分期，要討論從開港後全臺外國紡織品進口數量的變化，試圖看出紡織品在臺灣整體的演變。

一、開港後外國進口棉織品的數量變化

開港後輸入臺灣的紡織品，以棉織品為主。受限於歷史資料的限制，我們從 1866 年起才有較準確的數據，因此整理 1866 年到 1895 年外國棉織品輸入臺灣的數量，製作成表 3-7 開港後臺灣外國進口棉織品輸入量表，從表中可見到各年度外國棉織品進口到臺灣的數量，為了更了解其輸入數量的高低變化，將 1866 年設為基期，則 1869 年成長超過 2 倍，1871 年進口數量提高將近 4 倍，1883 年則突破 6 倍，到了 1894 年達到最高峰，比起 1866 年整整成長了 11 倍之多。若我們以指數畫成折線圖的話，可得到圖 3-5。

從圖 3-5 中，我們可以見到一開始的輸入量呈現穩定的緩步成長，到了 1871 年突然上升，1872 年大幅衰退，由於 1872 臺灣並沒有發生戰爭或是大型民亂的記錄，所以衰退的原因，可能是在 1871 年對於棉織品的成長幅度估計的太過樂觀，所以進了太多的貨品，導致到隔年尚未銷售完畢，所以才會有這樣大幅的衰退，到了 1874 年才大致回到 1871 年的進口數量。1875~1884 這十年間的進口數量，大約在 4.5 倍到 6 倍之間徘徊，成長似乎陷入膠著的狀態，英國棉織品此時期的進口數量未能再有明顯的突破，直到 1885 年日本棉織品大量進入，才又讓棉織品的進口數量有了新一輪的成長。雖然從圖上可以看到有些時期是陷入停滯的狀態，但整體而言，棉織品的進口數量還是一個明顯向上成長的趨勢。

表 3-7 開港後臺灣外國進口棉織品輸入量表

單位：匹 (Piece)

年次	數量	棉織品		
		進口數量	指數	成長率
1866	27811	100	-----	
1867	45321	163	63.00%	
1868	51625	186	14.11%	
1869	61259	220	18.28%	
1870	74074	266	20.91%	
1871	109606	394	48.12%	
1872	47651	171	-56.60%	
1873	82015	295	72.51%	
1874	103961	374	26.78%	
1875	154133	554	48.13%	
1876	132759	477	-13.90%	
1877	162733	585	22.64%	
1878	117834	424	-27.52%	
1879	160352	577	36.08%	
1880	159672	574	-0.52%	
1881	147209	529	-7.84%	
1882	119900	431	-18.53%	
1883	172439	620	43.85%	
1884	150100	540	-12.90%	
1885	230495	829	53.52%	
1886	179311	645	-22.20%	
1887	206431	742	15.04%	
1888	187986	676	-8.89%	
1889	189862	683	1.04%	
1890	200064	719	5.27%	
1891	211789	762	5.98%	
1892	210605	757	-0.66%	
1893	211836	762	0.66%	
1894	309423	1113	46.06%	
1895	75214	270	-75.74%	

資料來源：《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66~18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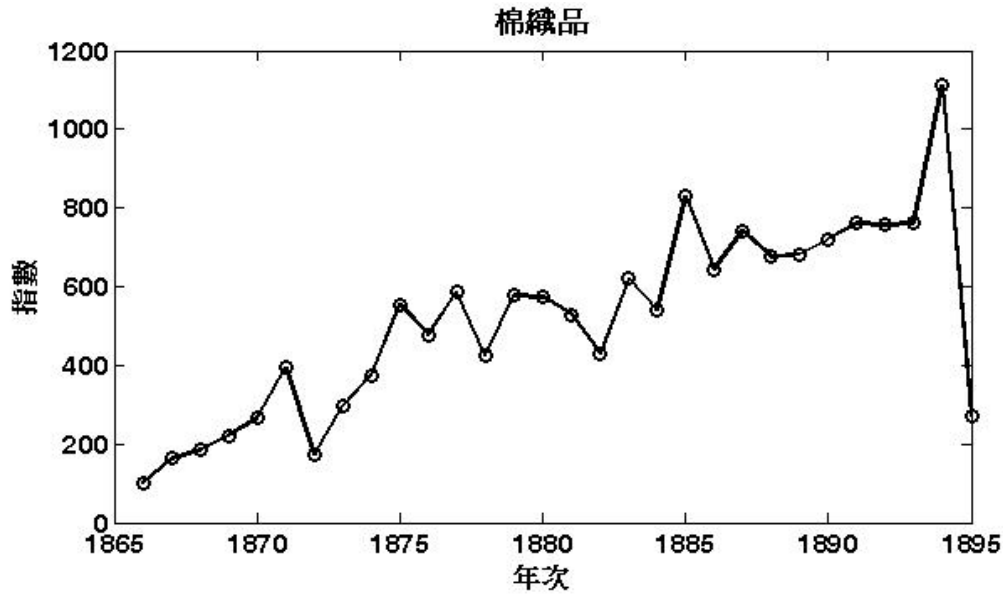


圖 3-5 外國棉織品進口數量變化圖

資料來源：依據表 3-7 繪製

開港後臺灣棉織品的進口國，大致上以英國跟日本兩個國家為主，輸入的棉織品主要是棉布，與緊鄰的中國市場有一定程度的不同。中國市場輸入的紡織品，除了布匹的進口之外，棉紗的輸入量也很龐大。在中國市場中，英國和印度棉紗彼此競爭激烈，因為孟買距離中國較近，可以節省許多運送成本等因素影響，逐漸在競爭中勝出。根據嚴中平利用中國海關報告所做的研究顯示，1870年代英國棉紗獨占中國市場，但到了1880年代以後，印度棉紗在各通商口岸的銷量，就勝過英國棉紗了。他引1884年瓊州稅務司的觀察談到：「此地需要的幾盡限於孟買紗，和英國貨相較，這種紗低廉的售價，是它獲得穩定市場的主要原因。」⁷³也就是說中國有棉紗進口，印度因為銷售棉紗給中國，而在其紡織品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臺灣幾乎沒有棉紗的進口，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兩地進口棉織品會有這樣差異，主因是開港後的臺灣，延續清治前期以來手工業不發達的特性所致。雖然開港後臺灣許多的社會經濟情況，已不像清治前期在發展手工業的基礎條件上那般困窘。但臺灣社會早習慣以區域分工的模式從大

⁷³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頁72。

陸輸入棉織品，所以到了開港後的《淡水廳志》，記載的還是「蠶桑不事，紡績無聞」與「蠶桑未興，其絲羅皆取之江、浙、粵。洋布則轉販而來，餘布多購於同安。」⁷⁴這樣手工業不發達的景象。造成開港後臺灣的棉織品，進口的還是以布帛為主，而沒有棉紗的輸入，這是臺灣棉織品進口市場的一大特色。

二、開港後外國進口毛織品的數量變化

臺灣由於地處亞熱帶地區，氣候終年炎熱潮濕，冬季寒冷的時間不長，所以厚重的毛織品，自然不利於在臺灣的銷售。毛織品的進口數量一直不大，最多的時期大致上也只有一萬五六千匹的數量，以相對數值而言，將 1866 年設為基期，進口數量最多的 1890 年也僅有 4 倍的成長，增加的幅度也不算多。毛織品除了是可以彰顯身份地位的奢侈品外，通常用來當作女人和小孩的假日衣服，士兵制服的鑲邊，或是作為和原住民交易的物品。⁷⁵海關檔案中也曾記載原住民使用毛織品的一種方式。當地原住民會買來不同顏色的布，拆散之後再重新紡成一塊布，以此編織成三種顏色的帶子當作頭巾；另一種用法則是把拆散的布當成線，用在衣服的刺繡上。⁷⁶毛織品似常被原住民拉成線來使用，因為有很多顏色，這些染色的線也會出現在番布裡面。⁷⁷

⁷⁴陳培桂，《淡水廳志》卷 11，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298、300。

⁷⁵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327 頁。

⁷⁶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196 頁。

⁷⁷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401 頁。

表 3-8 開港後臺灣外國進口毛織品輸入量表

單位：匹 (Piece)

商 品 數 量 年 次	毛織品		
	進口數量	指數	成長率
1866	4193	100	-----
1867	8786	210	52.38%
1868	6644	158	-32.91%
1869	6833	163	3.07%
1870	11406	272	40.07%
1871	9229	220	-23.64%
1872	6571	157	-40.13%
1873	6313	151	-3.97%
1874	6677	159	5.03%
1875	10484	250	36.40%
1876	10403	248	-0.81%
1877	13951	333	25.53%
1878	12054	287	-16.03%
1879	15696	374	23.26%
1880	15487	369	-1.36%
1881	15031	358	-3.07%
1882	11797	281	-27.40%
1883	12700	303	7.26%
1884	9127	218	-38.99%
1885	15893	379	42.48%
1886	13904	332	-14.16%
1887	12158	290	-14.48%
1888	12517	299	3.01%
1889	14316	341	12.32%
1890	16729	399	14.54%
1891	13997	334	-19.46%
1892	14488	346	3.47%
1893	12818	306	-13.07%
1894	12336	294	-4.08%
1895	2970	71	-314.08%

資料來源：《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66~18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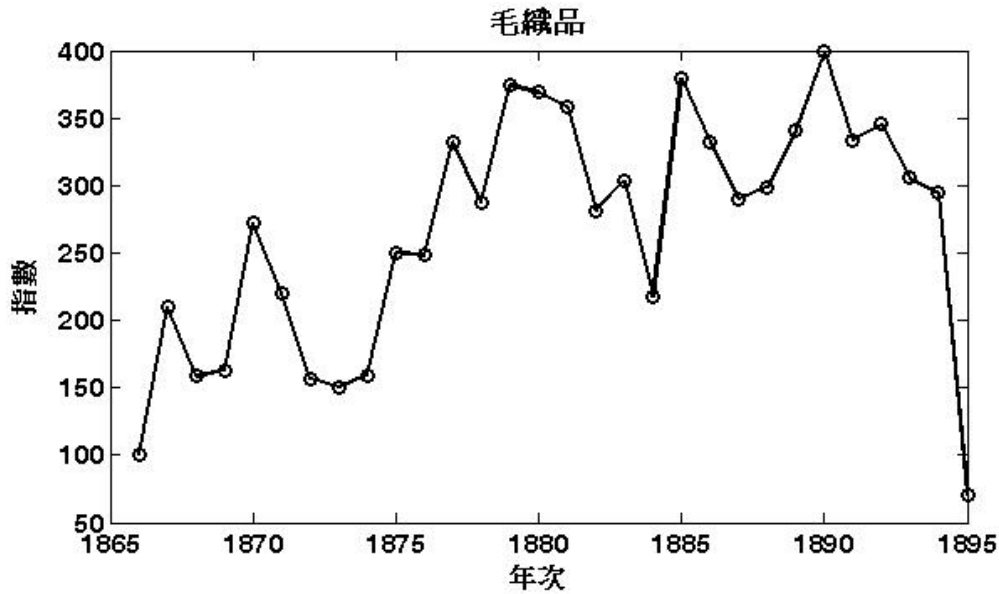


圖 3-6 外國毛織品進口數量變化圖

資料來源：依據表 3-8 繪製

毛織品與棉織品相較，雖然進口數量上有很大的落差，卻也不能完全忽視進口毛織品的原因在於，毛織品的售價比棉織品來得高。所以，當考量到價格這項因素時，拿毛織品與棉織品在海關進口的值來相互比較，毛織品的重要性就提昇了許多。以表 3-9 為例，就可以發現雖然棉織品的進口值仍高於毛織品，但跟數量相較，已大幅拉近彼此的差距。可見毛織品在臺灣的紡織品市場，仍占有一席之地。

表 3-9 棉毛織品進口值量比較表（1882~1891）

單位：進口量：匹；進口值：海關兩

類別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棉織品進口量	40205	63961	53712	66488	32877	53607	51139	60736	68057	60157
棉織品進口值	71491	110021	95160	116501	64044	85922	79757	92943	104126	99082
毛織品進口量	4982	6078	4129	5161	4966	5065	5777	8173	10012	8489
毛織品進口值	54581	71438	49590	65635	61050	63136	68044	73079	86676	93643

資料來源：〈1882~1891 年臺灣臺南海關報告書〉與《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82~1891。

總之，本章主要是在介紹開港後整體臺灣紡織品貿易的情形。以進口紡織品從海關輸入的比例來觀察，開港後一直到 1884 年為止，大體上是英國紡織品的天下，西洋布獨霸臺灣市場；日本紡織品則在 1885 年之後嶄露頭角，東洋布成為新的紡織品競爭者。但不管是東洋布還是西洋布，最強大的競爭對手，還是本地的紡織品，臺灣持續從大陸進口土布，也有一些自行生產的紡織品，在價格與使用習慣等各方面，仍深受臺灣人民喜愛。因此，雖然洋布在條約港的進口數量逐年上升，但非條約港進口的土布數量仍然龐大，所以土布依舊是使用人口最多的紡織品。



第四章 開港後南北市場紡織品的進口與銷售

臺灣開港之後，由於南北各自擁有兩個條約港，逐漸形成大致上以鹿港為界，將臺灣瓜分成南北兩個市場圈的情形。¹南北兩地因為地形條件、氣候狀況、產業活動、風土民情等都有所不同，使得兩地區受歡迎紡織品的種類也不盡相同。同一種布在北臺灣與南臺灣的輸入量常常有很大的差距，可能跟當地市場的消費能力有關。有的紡織品由於配合當地的產業活動而大量被使用，顯現出明顯的南北差異。所以我們不能只將臺灣視為一個單一的整體，南北紡織品市場各自有其獨特的風貌。本章即分別討論北臺灣和南臺灣的紡織品市場，分析其進口商品的種類與數量，並與當地的產業活動連結，試圖找出影響紡織品數量變化的原因。

第一節 北部市場洋布的進口與銷售

北臺灣的紡織品貿易，在開港之後持續成長，所占全臺進口數量的百分比，一年比一年高。那麼北部市場進口的紡織品，主要是哪些產品？又為何這些產品會在北臺灣受到歡迎？另一方面，本節同時想討論為何北臺灣紡織品貿易能有這樣大幅成長，是怎樣的因素使得臺灣北部人民能消費這樣龐大的紡織品呢？

一、北部市場紡織品的種類與數量變化

北部市場外國紡織品的進口數量，統計如表 4-1，棉織品的部分，明顯有驚人的成長幅度。1866 年北臺灣進口的棉織品數量為 13281 匹，到了 1873 年就已

¹ 林玉茹，〈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臺灣史研究》17 卷 2 期（2010），頁 21。

經突破 5 萬匹，1879 年則有超過 10 萬匹的進口數量進入北臺灣，1885 年已經到達 16 萬匹的進口數量，至於輸入數量最多的 1894 年則有 26 萬匹。以指數來看，將 1866 年的進口數量設為 100，輸入最多的 1894 年有將近 20 倍的增加幅度。成長倍數與全臺灣棉織品進口數量增幅僅有 11 倍左右相比，差距甚大。也就是說，北臺灣棉織品的進口成長力道，是超越全臺灣的進口成長的，可見北臺灣是全臺棉織品成長重要的支撐力。

就毛織品而言，如與棉織品相較，北臺灣毛織品進口數量一直很有限，成長幅度也不算太大。1866 年毛織品的進口數量為 1772 匹，進口數量最多的一年為 1885 年的 10732 匹。如果將 1866 年設為基期，最多的 1885 年也僅有 6 倍的成長，之後的進口數量也呈現下滑的趨勢。1887~1894 年大致維持在 3~4 倍的成長幅度。北臺灣對毛織品的喜愛程度似乎遠不如棉織品，從圖 4-1 的指數來比較，就可以看出明顯差距。棉織品的成長一枝獨秀，1885 年之後，毛織品與棉織品兩者間指數的距離更持續被拉大，顯示棉織品的進口數量增加的幅度遠勝於毛織品。

對於這種現象 1882 的淡水海關報告提出的解釋是，這裡溫暖的氣候排除了毛料廣泛使用的可能性，進口的毛料主要是用來做較有錢階級女人的衣服。²領事報告中也指出，北臺灣女性非常喜愛顏色特別鮮艷的歐製毛織品之記錄。³由此可知，北臺灣悶熱的氣候自然不利毛料的推廣，毛織品雖然可以用來炫耀身份地位，但並不是很實穿，因此大幅限制其在北臺灣成長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 1890 年的淡水領事報告中有關毛織品的記載：

在巡撫和他那批來自中國大陸內地的隨從到達此地以前，此地人們尤其是婦女及少女們所喜愛穿著的是毛織品，但隨著巡撫及其隨從的到來，不少追隨而來的內地人亦因而帶來了內地生產的絲與綢緞。為此，在當地乃興

²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總 583 頁。

³ 1873 年淡水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1, p. 380。

起了對衣服刺繡的欣賞，而很自然地，絲與綢緞乃取代了外國毛織品的地位。⁴

雖然絲與綢緞等紡織品，早在清治前期就已經輸入臺灣，開港後毛織品原本是北臺灣流行的服飾之一，但由於統治階層帶來衣著服飾新一波的流行，於是被刺繡絲及綢緞取代，進口數量因此下滑。可見毛織品對北臺灣民眾來說，不是必需品，而是流行品或奢侈品，才會產生這樣的現象。

表 4-1 北臺灣進口紡織品數量表

年次	棉織品			毛織品		
	進口數量 (匹(Piece))	指數	所占比例 (%)	進口數量 (匹(Piece))	指數	所占比例 (%)
1866	13281	100	88.2	1772	100	11.8
1867	22297	168	85.9	3664	207	14.1
1868	30030	226	93.6	2051	116	6.4
1869	39149	295	92.7	3065	173	7.3
1870	37621	283	95.2	1900	107	4.8
1871	48409	364	94.0	3086	174	6.0
1872	24972	188	86.8	3784	214	13.2
1873	51961	391	93.6	3550	200	6.4
1874	61072	460	92.8	4716	266	7.2
1875	90224	679	93.0	6768	382	7.0
1876	88782	668	92.2	7505	424	7.8
1877	97959	738	91.6	8935	504	8.4
1878	84876	639	91.4	8033	453	8.6
1879	108046	814	91.6	9871	557	8.4
1880	99159	747	92.1	8451	477	7.9
1881	105991	798	92.4	8761	494	7.6
1882	79695	600	92.1	6815	385	7.9
1883	108478	817	94.2	6622	374	5.8
1884	96388	726	95.1	4998	282	4.9

⁴ 1890 年淡水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4, p. 426。

1885	164007	1235	93.9	10732	606	6.1
1886	146434	1103	94.2	8938	504	5.8
1887	152824	1151	95.6	7093	400	4.4
1888	136847	1030	95.3	6740	380	4.7
1889	129126	972	95.5	6143	347	4.5
1890	132007	994	95.2	6717	379	4.8
1891	151632	1142	96.5	5508	311	3.5
1892	157537	1186	96.6	5496	310	3.4
1893	168274	1267	97.0	5258	297	3.0
1894	260672	1963	97.3	7217	407	2.7
1895	58171	438	97.8	1287	73	2.2

資料來源：《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66~18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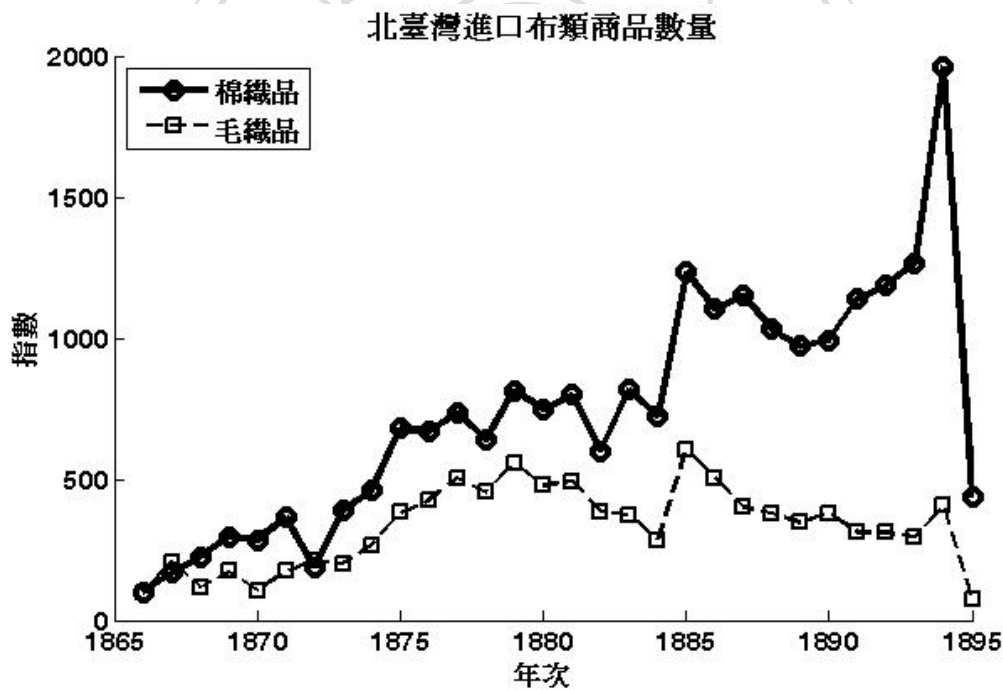


圖 4-1 北臺灣紡織品進口數量變化圖

資料來源：依據表 4-1 繪製

在輸入北臺灣的棉織品當中，以灰襯衫布、白襯衫布、T 字布與日本棉布這四種紡織品的進口輸入量最多。灰襯衫布在北臺灣一直有穩定的進口數量，雖然自 1879 年之後，進口數量被白襯衫布超越，但在北臺灣的紡織品市場中，仍有

一定的占有率。灰襯衫布如前一章的敘述，可以用來製作成衣物，但品質不夠優良，在價格上面對來勢洶洶的白襯衫布，也並未有足夠的競爭力，因此成長的幅度遠不如白襯衫布。灰襯衫布雖然也可以被染色，但能染的顏色有限，大多染成黑色或暗色，⁵不像白襯衫布的可塑性強，因此更受到北臺灣人民的喜愛，使其進口數量有驚人的成長。以表 4-2 為例，白襯衫布的輸入量從最初 1868 年的 2558 匹，到了 1880 年代之後，平均都有 4~5 萬匹的進口數量。這些被染色的布匹，不僅在臺灣本地消費，還被出口到大陸其它城市。受惠於染布業興起的紡織品，還有日本棉布。日本棉布在尺碼與質地各方面，更符合臺灣民眾的需求，也適合被染成各種顏色，所以很快的風靡整個北臺灣。單就進口數量而言，根據表 4-2 的統計，1892 年北臺灣日本棉布的進口數量，超越灰白襯衫布，成為最大宗的洋布進口商品，1894 年甚至超越灰白襯衫布輸入總額，受歡迎的成度可見一斑。

至於 T 字布，則與灰襯衫布一樣，一直以來都是用來當成製作茶袋的原料。⁶T 字布的輸入量在北臺灣的波動較為劇烈，從表 4-2 中可以看出，1879 年之前，T 字布大致上維持穩健成長的狀態，1880~1887 年這段期間則為進口數量的高峰期，1888 年之後則陷入嚴重衰退的地步，進口數量大幅萎縮，1893 年之後甚至只有 2000 匹左右的輸入量。1882~1891 年的淡水海關十年報曾提到，T 字布在這 10 年間的最後幾年的平均輸入額是 5000 匹，約與製作茶葉袋所需的數量相當。⁷這樣的說法顯示出，使用茶袋輸出的茶葉數量已經減少，使得 T 字布的進口數量大幅衰退，可以用來解釋 1888 年之後 T 字布進口數量下降的情形。而這種茶箱取代茶袋的過程，早在 1881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就曾被提及，它談到灰襯衫布與 T 字布已經不再是製作茶袋所需的布料了，所以未來的進口數量可能會持續下跌。⁸因為 T 字布主要的功能便是製作茶袋，不像灰襯衫布的使用方式比較多元，因此進口數量削減的情況非常明顯，逐漸消失於北臺灣的紡織品市場。

⁵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333 頁。

⁶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583 頁。

⁷ 臺灣銀行編，〈1882~1891 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收於《臺灣經濟史六集》，臺灣銀行研究叢刊 54 種，（臺北：中華書局，1957），頁 86。

⁸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538 頁。

表 4-2 北臺灣輸入的主要紡織品表

單位：匹 (Piece)

年次 \ 數量	灰襯衫布	白襯衫布	T 字布	日本棉布
1868	24065	2558	250	
1869	32251	3204	0	
1870	28100	5950	—	
1871	37350	4548	1000	
1872	17697	6514	276	
1873	35069	11343	2700	
1874	37529	14531	4227	
1875	52766	23686	6287	
1876	43632	26961	8233	
1877	43136	32217	10667	
1878	32000	32355	6362	
1879	43748	45557	7002	
1880	31292	46650	12329	
1881	32135	49521	11873	303
1882	31315	32312	6064	540
1883	45669	45366	9185	3045
1884	36738	38572	9001	5519
1885	48940	58158	22835	23874
1886	48510	40639	8181	41569
1887	49352	51292	11880	34075
1888	40139	52460	4890	26852
1889	39587	41911	5400	24916
1890	53206	48613	4593	16719
1891	38173	65345	5150	34159
1892	36896	38616	3199	62444
1893	38487	41969	2400	74520
1894	57311	57002	2660	125597
1895	17800	14730	2003	19579

資料來源：《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68~18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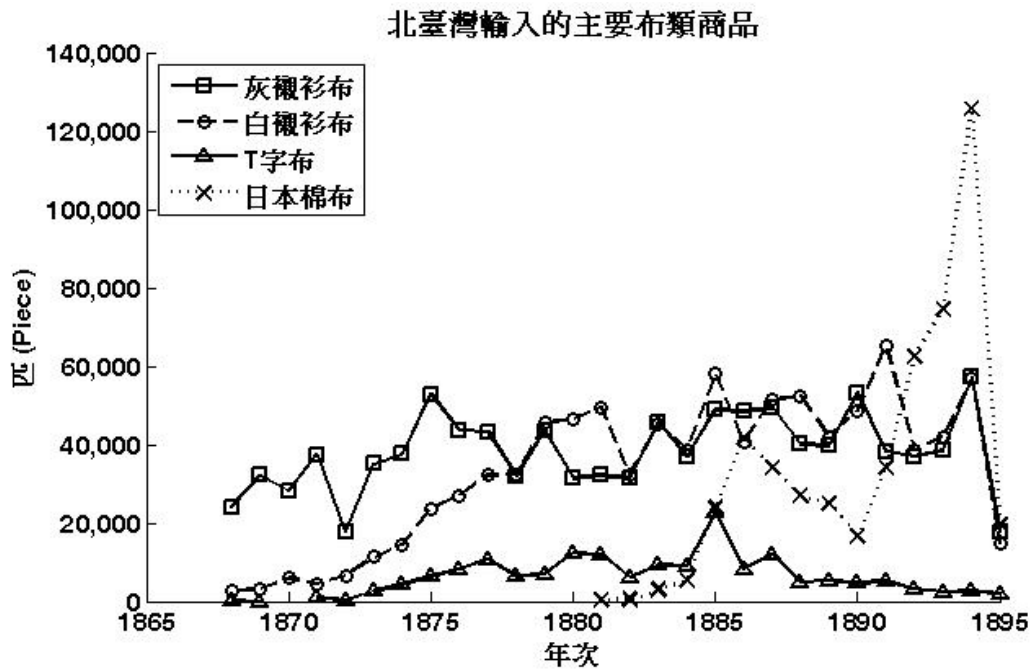


圖 4-2 北部市場各項紡織品輸入數量變化圖

資料來源：依據表 4-2 繪製

除了上述這些重要的紡織品之外，北臺灣的紡織品市場還出現一些有趣的新商品。像是 1884 年淡水海關報告提到「蚊帳」這項商品首次出現在外國進口的紡織品中，有些臺灣人會用它來做衣服，不過大部分還是用來防止蚊蠅叮咬。⁹此外，手帕在北臺灣的輸入量也日漸成長。1885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就談到，手帕的增加引人注意。有趣的地方在於，這裡的人們使用手帕的方式，比較像是拿來放在家裡當毛巾使用，而不是放在口袋的日常必須用品。¹⁰1893 年北臺灣也首次出現印度床單布，有 1848 匹的進口數量。¹¹這些新進商品，讓北臺灣的紡織品貿易和消費更豐富多元；同時亦反應出北臺灣民眾生活型態改變，經濟力提升的現象。

總之，北臺灣的紡織品市場，主要是棉織品的天下，毛織品所占的比例很低，淡水海關報告也多次提及毛織品在北臺灣的市場有限。¹²棉織品主要的輸入商品

⁹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646 頁。

¹⁰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678 頁。

¹¹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999 頁。

¹²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583 頁、總 615 頁。

則為灰襯衫布、白襯衫布、T 字布與日本棉布這四種紡織品，日本棉布後來居上，成為清末北臺灣最重要的進口紡織品。

二、茶葉貿易與紡織品銷售的關連性

北部市場紡織品進口增加的幅度，遠勝於全臺紡織品的輸入量的擴大規模，北臺灣為何有能力消費如此龐大的紡織品，成為全臺紡織品成長的主要動能呢？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由於茶葉貿易的興盛，帶動北臺灣的民眾整體經濟力量的提升，使得人民有更多的金錢去消費這些紡織品，而帶動其貿易在北臺灣的快速成長。

臺灣開港之後，茶樹的栽種面積日益擴大，北臺灣的丘陵地區逐漸被茶園占據。1878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就記載：「15 年前大稻埕四周的山坡上，幾乎看不見一棵茶樹，現在這些地方都種滿了茶葉，直至番界。」¹³茶樹的種植甚至延伸到了臺灣中部一帶，但無法向臺灣南部拓展，主要的原因是南臺灣的氣候條件過於乾熱，幾此茶葉的種植都不太成功，所以茶葉的栽植才未能有效拓展到南部。¹⁴北臺灣的丘陵地成為茶葉的生產基地，開始對外輸出。

茶葉的出口貿易，是北臺灣重要的經濟活動。出口的臺灣茶葉包括烏龍茶及包種茶，以烏龍茶為大宗，由於美國市場偏好臺茶的特殊風味，因此烏龍茶的輸出主要以美國為主。¹⁵根據林滿紅統計淡水海關報告所做的整理，以烏龍茶為例，1866 年淡水海關出口的數量為 1359.57 擔，把這個數字設為基期，則 1871 年烏龍茶的出口數量成長為 1866 年的 10 倍，1875 年增為 30 倍，1877 年增為 50 倍，1892 年則達到 100 倍以上的巨大擴張。¹⁶從烏龍茶茶的出口量，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其出口數量大規模的擴大，這樣的情形帶動了北臺灣的經濟繁榮，使人民所得提

¹³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340 頁。

¹⁴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340 頁。

¹⁵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臺北：聯經，1997），頁 21。

¹⁶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頁 43-45。

升，消費能力增強。1876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就這樣寫到：

小型農業的農民漸漸了解茶園和經營它付出勞力所帶來的利潤，讓他們可以負擔起比現在習慣購買的，還要高級的衣物；與此同時，他們也很渴望得到那些衣物所代表的錢財價值。因此很明顯的，如果歐洲的棉織品和毛織品，想持續的在一個快速累積財富的區域受到喜愛，那它們必須有好的價值和樣式。這是個值得注意的事實，中國沒有其它地方會比北臺灣更適合提供大量紡織品。¹⁷

從上述的資料中，可以看見由於茶出口貿易的興起，使得北臺灣的農民可以透由種植茶葉獲取更高的利益。不論是自行種植或是受雇成為種茶的勞工，都有更好的收益，因此可以去消費更高級的紡織品，也會以這些衣物作為炫耀或是表示身份的工具，彰顯出衣物的財產價值。這表示茶葉貿易使得北臺灣的民眾經濟能力提升，成為一個快速累積財富的區域。為了因應這樣的情況，洋商必須販售更精美的紡織品，來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因為他們有能力去使用這些產品。亦即北臺灣受惠於茶葉出口而擴大了紡織品的消費市場。事實上，北臺灣茶葉貿易的興起，在尚未提昇人民經濟力量之前，就已經影響了紡織品的價格，1873 年的淡水領事報告就這麼說：

早年從曼徹斯特進口的商品量雖少，但卻獲利豐厚。這是因為貿易僅限於兩家商行，因此在幾乎是獨占的狀況下，高價很容易維持，甚至到了 1867 年一匹 (piece) 灰襯衫布仍可以開價 4.50 元 (dollar)。住在艋舺與竹塹等大城的少數富裕中國人，習慣在支付鴉片貨款時以布料代替金錢，並強迫小商店店主以高價收購。然而在 1868 年，臺灣茶因其細緻的製作方法而聞名，四或五個位於廈門的英國商行決定開始做這項生意，因而在此

¹⁷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246 頁。

設立了新的公司。競爭同時使布料價格下跌，使得最底層的中國人都能買得起這些被認為比以往寧波布更好的布料。¹⁸

也就是說，原本經營紡織品的商行數量較少，在奇貨可居的情形之下，擁有較高的價格。然而當北部市場的茶產業易逐漸興起，有更多洋商來到北臺灣經營茶葉貿易，並跨足紡織品貿易。由於彼此的競爭，使得洋布的價格下跌，讓更多人消費得起進口的紡織品。北臺灣茶葉貿易的盛況，在光緒初年身任臺灣道的夏獻綸，致其上司福建巡撫的報告內容中，也可以窺知一二。夏獻綸這樣敘述道：

淡水之種茶也，始於同治初年，嗣洋商有到該處販賣出洋者，茶價驟高，農民趨之，競植以為利，所以海隅片土，市樓賈船日聚月增。……傳聞種茶萬株，工本百金，三年以後，一歲所採，便足抵之，其利甚厚。臺北千巖萬壑，居民寥寥，誰非曠壤？或招民佃種，或傭工種墾，行古官焙之法，取息裕餉，其利當倍於園田。¹⁹

這份報告內容，顯現出北臺灣茶葉貿易的利潤豐厚，連清朝官員都認為應該鼓勵百姓種植茶葉。種茶所帶來的利益，讓北臺灣的人民變得富裕了。因茶出口貿易的興盛，同時也帶動北臺灣的物價上升，1879 年淡水海關報告就提到，必需品的價格和米一樣提高了，有兩倍甚至三倍的漲幅。²⁰茶葉種植的高速擴展，也在 1880 年的淡水海關報告被戲稱，土地種植茶葉的速度，跟從番人那裡占領土地的速度一樣快。²¹甚至連奴婢的價格也因為茶產業的興盛，身價水漲船高。《舊慣會經資報告》就記載：「二、三十年前（約 1875～1885 年）女婢的身價為 30～40 元，製茶事業勃興以來，供給減少，餘者身價日高，到目前（1905 年）已

¹⁸.1873 年淡水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1, pp. 379-380。

¹⁹.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第 7 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頁 71-72。

²⁰.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398 頁。

²¹.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451 頁。

漲為 80~100 元。」²²雖然這是日治時期的調查報告，但同樣展現北臺灣因茶葉貿易繁盛的情景。從事茶產業的勞工，擁有不錯的薪資，使得大量的勞動力投入茶葉生產，甚至排擠到了其它產業。1890 年淡水海關報告就提到，有人試圖在北臺灣從事絲的生產，但沒有成功，原因是勞工投入茶產業報酬較高，因此吸引不到勞工進行生產。²³

茶的出口帶動整個北臺灣經濟力量的茁壯，使得紡織品的進口數量不斷攀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自然也消費得起更多的紡織品。1880 年以前在淡水海關報告與領事報告中，都不斷提及北臺灣人民原多謀生困難者，但因茶園日拓，所得提高，消費增加，因此穿得起更好的衣料，買得起人參、玉飾、絲綢等奢侈品，由大陸進口磚瓦以蓋華屋等，也因為種植茶葉需要大量勞動力投入，因此北臺灣也極少有乞丐的存在，人民生活富足。²⁴領事報告也同樣提到一些可視為是奢侈品的棉織品，進口量與前些年相比大幅成長許多，可視為是此區域繁榮程度與財富累積進展的指標。²⁵總之，北臺灣紡織品貿易的成長，跟茶產業蓬勃發展的關係密不可分。

²²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調查經濟資料報告第二部》下卷（東京：三秀社，1905），頁 486。

²³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871 頁。

²⁴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頁 156。

²⁵1877 年淡水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2, p. 277。

第二節 南部市場洋布與土布的進口與銷售

南臺灣的紡織品市場，呈現出與北臺灣不同的風貌，臺灣南部有一些本土生產的紡織品，像是黃梨布（鳳梨布）、番布等。這些本土製的紡織品，在南臺灣紡織品市場所占的比例，於 1876 年的打狗海關報告中被認為足以與西洋布、南京布一較高下，粗估兩者合計有 25% 的市占率。²⁶也就是說，外國紡織品在南臺灣想要開拓市場，不僅得面對從大陸來的南京布等紡織品競爭，本土製作的紡織品也無法忽視。另外，南部市場與北部市場相較，海關進口紡織品的總體輸入量差距越來越大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本節將討論紡織品在南部市場的銷售情形，還有南部市場的進口紡織品貿易，在開港後期發展逐漸停滯的原因。

一、南部市場紡織品的種類與數量變化

進口到南臺灣的紡織品，棉織品雖然仍占據主要的位置，但跟北臺灣最大的不同，就是棉織品輸入量成長的比例，並未與毛織品有太大的差異。本文分別以 1866 年進口的數量為基期，檢視棉織品和毛織品在南臺灣輸入量擴張的情形，製成圖 4-3。從圖中可以看到，棉毛織品的成長曲線，有一定程度的雷同，大致上棉織品進口成長的年份，毛織品也同樣成長，衰退的年份亦然，兩條折線間的差距也不太，大體上呈現出正相關的狀態。這顯示進口的紡織品中，南部市場不像北部市場，對棉織品的需求越來越大，而顯現出同步擴張與收縮的趨勢。棉織品始終無法突破基期 5 倍以上的成長，毛織品則僅有 4 倍左右的增幅，且自 1891 年起，雙雙陷入衰退的情形，這是什麼因素造成的呢？

²⁶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259 頁。

表 4-3 南臺灣進口紡織品數量表

年次	棉織品			毛織品		
	進口數量 (匹(Piece))	指數	所占比例 (%)	進口數量 (匹(Piece))	指數	所占比例 (%)
1866	14530	100	85.7	2421	100	14.3
1867	23024	158	81.8	5122	212	18.2
1868	21595	149	82.5	4593	190	17.5
1869	22110	152	85.4	3768	156	14.6
1870	36453	251	79.3	9506	393	20.7
1871	61197	421	90.9	6143	254	9.1
1872	22679	156	89.1	2787	115	10.9
1873	30054	207	91.6	2763	114	8.4
1874	42889	295	95.6	1961	81	4.4
1875	63909	440	94.5	3716	153	5.5
1876	43977	303	93.8	2898	120	6.2
1877	64774	446	92.8	5016	207	7.2
1878	32958	227	89.1	4021	166	10.9
1879	52306	360	90.0	5825	241	10.0
1880	60513	416	89.6	7036	291	10.4
1881	41218	284	86.8	6270	259	13.2
1882	40205	277	89.0	4982	206	11.0
1883	63961	440	91.3	6078	251	8.7
1884	53712	370	92.9	4129	171	7.1
1885	66488	458	92.8	5161	213	7.2
1886	32877	226	86.9	4966	205	13.1
1887	53607	369	91.4	5065	209	8.6
1888	51139	352	89.8	5777	239	10.2
1889	60736	418	88.1	8173	338	11.9
1890	68057	468	87.2	10012	414	12.8
1891	60157	414	87.6	8489	351	12.4
1892	53068	365	85.5	8992	371	14.5
1893	43562	300	85.2	7560	312	14.8
1894	48751	336	90.5	5119	211	9.5
1895	17043	117	91.0	1683	70	9.0

資料來源：《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66～18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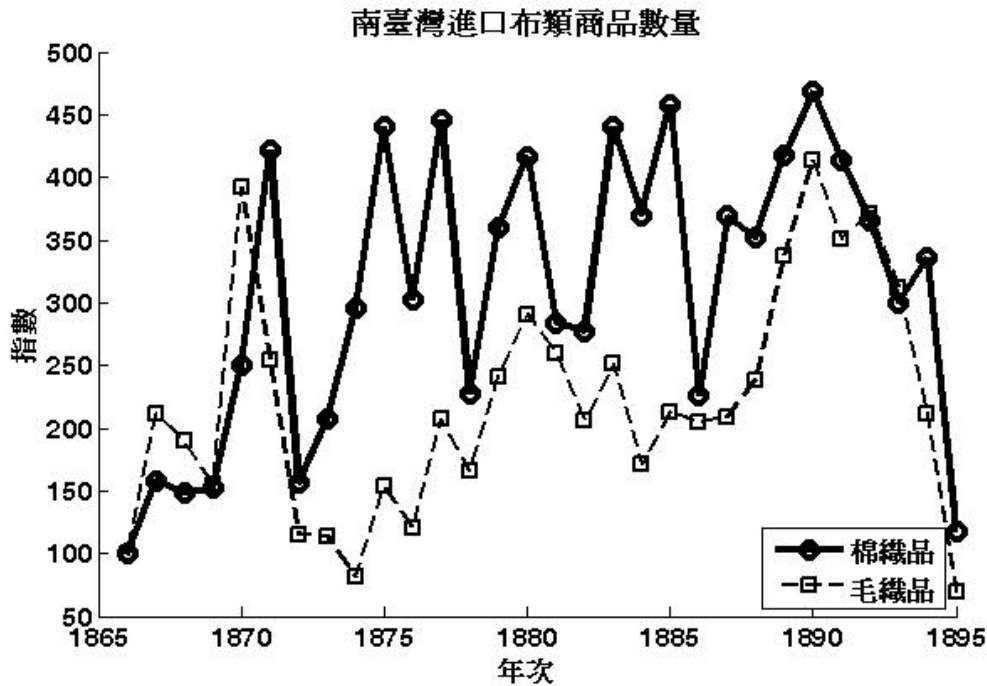


圖 4-3 南臺灣紡織品進口數量變化圖

資料來源：依據表 4-3 繪製

進口紡織品在南臺灣一直難以打開市場，以 1876 年打狗海關報告為例，就談到此地沒有大量的外國紡織品貿易，棉織品市場受到南京布、黃梨布和番布等本土紡織品的強力競爭，毛織品則因為氣候因素阻礙了大量交易的可能。²⁷1880 年的打狗海關報告同樣提到，南臺灣絕對不是一個消費高品質紡織品的地方，因為這樣的布料太厚重了，不適合在南臺灣的氣候下穿著，所以人們忽視最好的布料，而選擇輕一點，較次等的布料，而市場就被這些布料癱瘓了，當地人覺得本土布料便宜又好用。²⁸1884 年的打狗海關報告再次提及，棉織品和毛織品在這裡都沒有大量被消費，棉織品受挫於人們青睞比較粗糙又強韌的家庭織品或是番人織品，毛織品則因為這裡涼爽的氣候太短，所以銷量亦有限。²⁹除了上述的原因導致南部市場進口紡織品推展的困難，打狗海關報告還曾在南臺灣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

²⁷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258 頁。

²⁸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462 頁。

²⁹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662 頁。

這裡居民的衣著是貧乏的，統治者對人民的穿著問題漠不關心。有一個著名的商人，靠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從低階的苦力變成了享有富裕生活的高階層，但他卻沒有在衣著服飾上，展現能夠讓別人可以從一堆苦力中把他認出來的穿著。他和其他有著相同成功經驗的人一樣，都滿足於穿著跟以前家境不好時一樣的衣服，即便他們現在很富裕。而且這些現在得到財富的人，即便願意沈迷任何一項奢侈品，但絕不會是在衣著服飾上。因此任何一種紡織品想要有可觀的擴張前，人們的性格和時尚風氣必需要有顯著的改變才行。³⁰

這則資料顯示當時南部市場的富裕階級，並不會特別想在衣著服飾上，彰顯其身份地位的不同，導致洋布無法打開在南臺灣的市場。這是源自當地民眾穿著之習慣，所產生對紡織品貿易的影響。綜合以上的資料，可以得知南臺灣的紡織品，受限於價格、本身質地、氣候條件、當地人民對衣著服飾的習慣與本土布料的競爭等因素，所以市場遲遲無法擴展，尤其是本土布料的競爭，南臺灣不僅有大陸進口的南京布，臺灣本地生產的番布、黃梨布也構成強力威脅。也就是說外國紡織品在南部市場比北部市場拓展更艱困之處，便是受到本地生產紡織品的壓迫。

另一方面，以中式帆船運送到南部市場的紡織品貿易仍然持續進行。由於中式帆船體積小，所以不受港口條件限制，可以有更廣闊的銷售範圍，不像外國輪船只能停泊在條約港，並依賴挑夫運送進口紡織品到較遠的地方販賣，成本大幅提高而限制了銷售市場的擴張。³¹1886 年的臺灣領事報告就提到：

以中式帆船進口的貨物量一直都相當可觀，但因它們常在小型的非條約港

³⁰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258 頁。

³¹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807 頁。

靠岸，若要統計其實際貨物量則相當困難。本地對於中式帆船進口的貨物不課稅，且相對於外國輪船而言，它們的卸貨費用較為低廉，一般性費用更便宜。以一般棉織品而言，這使中國貿易商可以每匹低於外國貿易商 10 c. 至 20 c. 的價差與之競價銷售。極大量的各式本土布料每年由對岸以中式帆船進口，其中又以泉州為大宗。據信，光是南臺灣就消費了四十萬匹的各式布料。³²

這顯示以中式帆船進入臺灣的紡織品數量龐大，比起洋布在價格上也很有競爭力，使得洋布在南部市場的拓展範圍受到限制。除此之外，還有一項重要的原因，就是南臺灣的本土商人勢力似乎比北臺灣來的龐大。所謂的本土商人，不單指是指大陸商人或是臺灣商人，而是兩者的綜合體。當時本土商人也加入瓜分洋布市場的進口，在南部地區尤甚。1882 年的臺灣領事報告寫到：

棉毛製品的貿易現在或許可說漸漸脫離外國商人的掌握，本土貿易商派人到香港採購，而這些人在此選購貨品，使得貿易商能隨時購買任何他們想要的貨品，且價格還更為低廉。他們以批發或零售的方式將布料售出，且願意接受長期的賒帳。這項商品貿易在臺灣府盛極一時，是本島南部最大的分銷中心。³³

這個現象產生之後，南臺灣的洋商不但抱怨進口紡織品市場已經沒有可觀利益，被本土商人掌握大部分貿易，甚至退出進口紡織品的經營，³⁴可見本土商人在南部市場對紡織品的影響力。這也或許是自 1891 年起，進口紡織品的數量在

³².1886 年臺灣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4, pp. 110-111。

³³.1882 年臺灣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3, pp. 194-195。

³⁴.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598 頁、總 977 頁。

海關資料陷入衰退的原因之一。至於為何這個情形在北部市場沒有浮現，可能是由於北臺灣紡織品市場成長迅速，沒有像南臺灣紡織品市場一樣，陷入停滯或衰退，所以觀察不出這樣的現象。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則是南部市場的行郊勢力比北臺灣來得強盛。

本土商人的勢力，從南臺灣的郊商活動中，也可以看見其對紡織品貿易的影響力。以臺南為例，從日治初期的調查報告中顯示，當時以北郊、南郊及港郊（原糖郊）合稱的臺南三郊中，北郊和南郊都有涉足紡織品的經營。表 4-4 是便是根據《臺灣私法》中記載的調查資料製成，反映出臺南三郊輸入臺灣的貨品。³⁵其中南郊輸入的商品內容，可以看見香港洋布什貨這一項，顯示本土商人也參與了洋布的經營，才會讓南部市場經營紡織品的洋商們倍感壓力。

至於南郊與北郊其它輸入的紡織品，像是北郊從寧波上海一帶輸入的綢緞、花布、縐紗、呢羽，及蘇杭絲帶、江西的葛布、甚至是天津的棉花；以及南郊輸入的漳州絲線、泉州棉布、永寧葛布、汀州條絲和來自香港的呢羽等紡織品，都顯現出自清治前期所發展出來的區域分工依然持續進行，中國土布在南部市場的貿易依然活絡。南郊與北郊進口紡織品的地區，延續開港前以華中地區和福建一帶為主要貿易對象的情形，貿易範圍甚至向北擴大到天津，以南來到香港廣東一帶。顯現在開港之後，臺灣與大陸間紡織品貿易受到洋布進口的衝擊有限。除了臺南三郊之外，還有規模較小的諸多貨郊，如藥郊、絲線郊、布郊、碗郊等也在臺南地區持續運作，³⁶布郊和絲線郊同樣也是經營紡織品貿易。從擴大貿易範圍和諸多與紡織品相關的貨郊存在來看，可能開港後臺海兩地間的紡織品貿易不但受影響，反而有更加蓬勃發展的趨勢。莫怪乎洋布始終把土布列為在臺擴張的頭號競爭對手。

³⁵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東京：東洋，1910) 第三卷上，頁 52。

³⁶ 卓克華，《清代臺灣行郊研究》，(臺北：揚智文化，2007)，頁 78。

表 4-4 清治末年臺南三郊輸入貨品表

北郊輸入商品	南郊輸入商品	港郊輸入商品
寧波綢緞	漳州絲線	豆粿
寧波紫花布	泉州棉布	豆
上海縐紗	永寧葛布	紙
上海呢羽	汀州條絲	米
蘇杭絲帶	香港呢羽	青糖
江西紡葛	香港洋布什貨	筍干
天津棉花什貨	漳州生原煙	菁子
四川藥材	龍岩州紙類	麥
浙江雜貨	廈門藥材磁器	麻
中莊膏藥、火腿	福州杉木	
香港大、小塗	深滬鹽魚	
	浦南什貨	
	廣東什貨	
	泉州磚瓦石	

資料來源：《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三卷上，頁 52。

南部市場進口的棉織品，主要仍是以灰襯衫布、白襯衫布、T 字布與日本棉布這四種商品為主。灰襯衫布是南部市場最重要的進口洋布，從表 4-5 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自 1868 年到 1895 年間，灰襯衫布在南臺灣一直維持第一名的輸入量，沒有其它進口紡織品可以超越。南部市場對灰襯衫布的品質沒有什麼批評。³⁷1874 年的打狗海關報告還談到，灰襯衫布的需求逐年增加，可能因為它很便宜，與本

³⁷.打狗海關報告中沒有批評灰襯衫布品質低落的記錄，不像淡水海關報告中曾多次提及灰襯衫布品質不佳，價格又不具競爭力，所以被白襯衫布取代。

土紡織品相比，受歡迎的程度逐漸高漲。³⁸不過，自 1881 年起灰襯衫布的進口數量就開始陷入衰退，1868 年到 1880 年灰襯衫布的平均進口數量約有 25600 匹，但 1881~1894 年間僅剩下 20000 匹左右的數量，減少了 20% 以上的輸入量。白襯衫布則不像北部市場，始終沒有超越灰襯衫布，這可能與南臺灣的染布業不像北臺灣那麼發達有關。白襯衫布價格也比灰襯衫布高，或許同樣影響到其競爭力。白襯衫布自 1879 年之後，就大致維持 10000 匹上下的輸入量，沒有太大的變動。日本棉布在 1887 年進入南部市場，先成長後衰退，1890 最多有 12722 匹的進口數量，之後進口數量便不斷下跌，跟北臺灣獨領風騷的情況完全不同。

除了上述這三種紡織品有超過萬匹的進口數量，T 字布在南部市場也有一席之地。T 字布在打狗海關報告中的敘述不多。1877 年的報告說大部分進口的 T 字布都進了府城的染坊中，最後被當成本土布料的模仿品消費掉。³⁹1880 年的記錄則說 T 字布的品質最差，通常用於製作喪服。⁴⁰然而這些說法卻有討論的空間，根據表 4-5 的統計，T 字布的輸入量在許多年份都超越白襯衫布，成為南臺灣第二大的進口紡織品，其價值絕非只用來製作喪服，白襯衫布與日本棉布都更適合染色，也不應該會特地進口 T 字布做為染布使用，那麼這些數量龐大的 T 字布究竟有什麼功能呢？

T 字布在北臺灣的用途，有一段時間是製作茶袋的主要布料。也就是說 T 字布適合被製成外包裝袋，如果以此類推的話，T 字布在南臺灣，也極有可能是製作糖袋或米袋的布料之一。這樣的說法就可以解釋為何 T 字布在南部市場，並未出現像北部市場由於 T 字布茶袋功能式微之後，而有明顯衰退的狀況，因為它製作外包裝袋的功能並未被取代，不過在最後的幾年，也有一些進口量下跌的情形。

³⁸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141 頁。

³⁹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327 頁。

⁴⁰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462 頁。

表 4-5 南臺灣輸入的主要紡織品

單位：匹 (Piece)

年次 \ 數量	灰襯衫布	白襯衫布	T 字布	日本棉布
1868	19900	250	60	
1869	17800	950	860	
1870	26750	3250	175	
1871	46299	2458	4599	
1872	12550	2380	2900	
1873	21400	3051	2548	
1874	34951	2553	1575	
1875	39217	4173	9617	
1876	22388	5462	6813	
1877	29314	7175	14947	
1878	12399	6844	7141	
1879	21410	9646	7254	
1880	28438	10591	9341	
1881	14099	9567	8400	
1882	17263	8007	6844	
1883	27424	12536	15038	
1884	18600	13152	14662	
1885	31655	12663	12039	
1886	10560	8105	8137	
1887	20721	10657	10874	5942
1888	19911	10838	6828	6742
1889	21707	12405	9276	7100
1890	22198	14176	10206	12722
1891	19119	12926	9630	10734
1892	17944	9577	5843	11692
1893	16627	7706	7013	8127
1894	22711	9229	4851	6282
1895	6901	4076	800	3179

資料來源：《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68~18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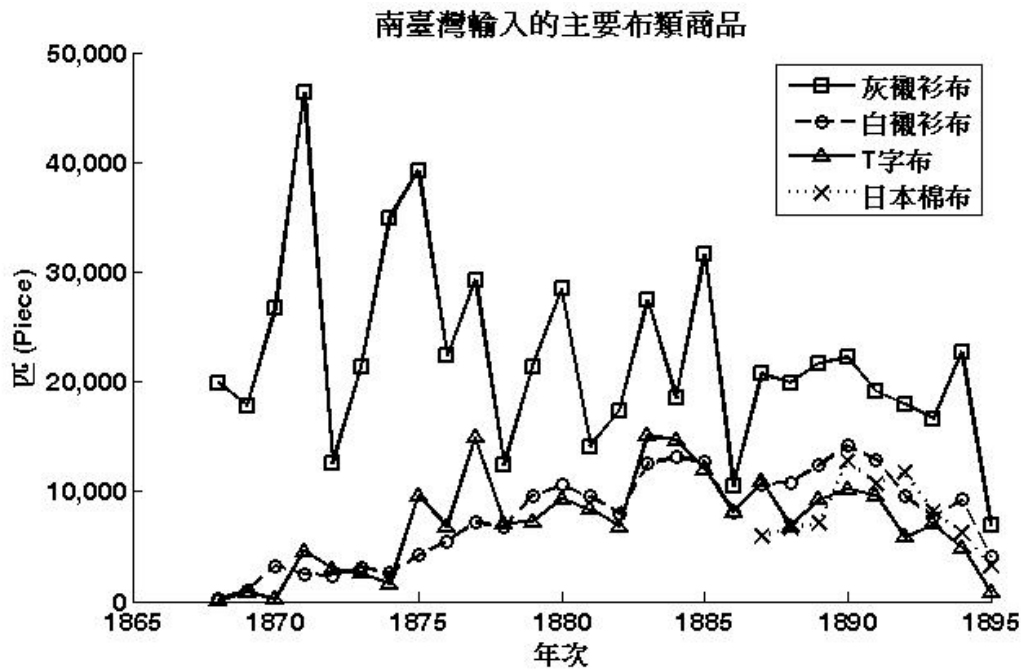


圖 4-4 南臺灣各項紡織品進口數量變化圖

資料來源：依據表 4-5 繪製

除了 T 字布之外，南部市場還有一項特殊的紡織品，在海關中也有大量的進口。這項紡織品同樣具有裝糖或是裝米的功能，大致上只有出現在南臺灣的海關資料中，北臺灣幾乎不見其蹤影。這項紡織品就是「麻袋」。麻袋在南部市場的進口數量十分龐大，表 4-6 記錄了 1868 年到 1895 年間通過海關進口的麻袋數量，如扣除掉數量差異太大的 1868 年，把剩下的進口數量加以平均的話，1869～1895 年間麻袋平均每年的輸入量為 172415 個，數量驚人！而麻袋的功能，在 1874 年的打狗海關報告寫道：「草袋與麻袋是本地進口貨品的重要項目。草袋進口了 573,100 個，用於包裝外銷的糖；而麻袋則進口了 187,922 個，被本地商人用於覆蓋裝有蔗糖的簍子，輸往煙臺與其他北方港口。」⁴¹同樣顯示出麻袋可作為糖等貨品的外包裝，所以南部市場一直保持著對這項紡織品的需求。

1882～1891 年臺灣臺南海關報告書也寫到：「本國進口貨物中主要的貨品是麻袋、草袋……。麻袋係用以包裝大米，以備由中式帆船輸出者，草袋是裝糖用

⁴¹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141 頁。

的。」⁴²報告書中還談到，臺灣會輸出麻，一種或許是苧麻（*Boehmeria nivea*）的纖維，可以用來製造夏布，這是中國人所喜愛製作夏裝的一種料子；另一種是由鳳梨葉的纖維製成。而麻多半是透過中式帆船運送出去，由外國船隻輸出的麻量不多。⁴³也就是說麻的原料會從臺灣出口，做為大陸紡織品的原料，很有可能再透過跟大陸的區域分工，製成麻的相關製品回銷臺灣，所以海關報告中只有少量的麻原料輸出，因為這多半是由中式帆船負責。從麻袋大量的進口數字來看，南部市場對麻袋的需求很高，這樣的狀態延續到了日治時期，是促成了臺灣製麻會社成立的原因之一。

表 4-6 打狗麻袋進口數量表

單位：個（Piece）

年次	數量	年次	數量
1868	27950	1882	151340
1869	270838	1883	133250
1870	193476	1884	196320
1871	258510	1885	208750
1872	147060	1886	163400
1873	175950	1887	228870
1874	187992	1888	254720
1875	76990	1889	184900
1876	181895	1890	215700
1877	88720	1891	167160
1878	77400	1892	153700
1879	107050	1893	236907
1880	102065	1894	144788
1881	223051	1895	124400

資料來源：《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68～1895。

⁴²臺灣銀行編，〈1882～1891年臺灣臺南海關報告書〉，收於《臺灣經濟史六集》，臺灣銀行研究叢刊 54 種，（臺北：中華書局，1957），頁 116。

⁴³臺灣銀行編，〈1882～1891年臺灣臺南海關報告書〉，收於《臺灣經濟史六集》，臺灣銀行研究叢刊 54 種，頁 117。

總之，南臺灣的紡織品市場，棉織品和毛織品的成長率沒有太大的差距，雖然仍以棉織品為主，但成長幅度和毛織品差不多。棉織品中，以灰襯衫布、白襯衫布、T 字布與日本棉布這四項紡織品，在各年度的進口數量中有超過一萬匹以上的實力，不過至始至終都是以灰襯衫布的輸入數值最大。此外南部市場還有麻袋的進口，是南臺灣獨有的現象。不過，不論從整體數量來看，或是以最重要的灰襯衫布為指標，南部市場的紡織品進口數量並非持續成長，最終的都陷入停滯甚至衰退的情形，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二、糖業貿易與紡織品銷售的關連性

上述紡織品衰退的情形，導因於南部市場主要出口的經濟貨物「糖」，在開港後期出口數量呈現趨緩甚至衰退的現象有關。正如同北部市場受惠於茶出口旺盛的影響，使其經濟力大幅提昇，可以消費更多的紡織品，南部市場的紡織品同樣也與糖業出口產生連動。畢竟紡織品對臺灣民眾而言，是一種生活必需品，同時也是一種奢侈品，當民眾有了更大的經濟能力時，便可能去消費更多數量，或是更高等級的外國進口紡織品。

開港之前，臺灣的蔗糖主要出口的地區是大陸及日本，開港之後，外銷市場更擴大至澳洲、西歐、北美及南美等地。1860~1895 年間，臺灣出口的糖分赤糖與白糖兩種，但以赤糖為主。赤糖供應中國大陸、日本食用及製糖果用，或供歐美澳各國精製用。而 1860~1895 年間，中國大陸及日本仍一直是臺糖的主要市場。⁴⁴

由於開港之後，白糖的出口總量僅占赤糖的 5.5%，數量有限，所以以下用赤糖為例，說明糖業出口陷入停滯甚至衰退的現象。林滿紅以 1866 年赤糖的出口量作為基期，統計開港之後糖業輸出各年度的起伏情形，1870 年為 1866 年輸出量的 2.5 倍，1880 年為 1866 年之 4.5 倍，是清末赤糖出口的最高峰。而 1881

⁴⁴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頁 23-24。

至 1895 年間臺糖出口為 1866 年之 1.6 倍到 3.3 倍之間。⁴⁵

根據林滿紅的研究，顯現出糖業的出口，先是持續成長，在 1880 年達到開港以來的最高峰，然後自 1881 年起，開始出現停滯甚至是衰退的情形。造成此狀況的原因，打狗海關報告中提出了一些解釋，包含 1881 受到颱風影響導使得糖業生產量減少，價格上升而失去競爭力。⁴⁶1882 年同樣受到颱風侵襲，颱風毀了大量的甘蔗田，導致歉收。⁴⁷1884 年糖的歐洲外銷市場受到衝擊，主因是歐洲甜菜糖生產過剩。⁴⁸1887 年則記錄在清法戰爭期間，人民多種植糧食作物而不種甘蔗的情形。⁴⁹1891 年則談到臺糖最重要的外銷市場日本，開始受到馬尼拉等地產糖的競爭。⁵⁰1893 年有提及因為 1892 年夏秋兩季的颱風，導致蔗糖減產。⁵¹上述林林總總的原因，包含天然災害、戰爭因素、歐洲甜菜糖過剩等，使得糖業的出口受挫，其中又以東南亞等地糖產業的興起最為重要。日本是臺灣除大陸之外，最大的糖產輸出國，低價東南亞糖產的競爭，使得臺糖外銷市場逐漸萎縮。

糖業出口量轉折下挫是自 1881 年開始，因為從在 1880 年達到出口最高峰之後，這樣的榮景就不曾再於開港後的南部市場出現。南部市場紡織品的總體進口數量，不論是棉織品還是毛織品，雖然並非是自 1881 年之後就同步陷入衰退的情形，而是要等到過了 1890 年，進口數量才有明顯的退步。然而與同期的北部市場相較，北臺灣的紡織品進口量仍持續成長，特別是在棉織品的部分，1894 年才達到開港後的最高峰，這與南部市場紡織品成長停滯與衰退的現象不同。而如果以南部市場最大宗進口的洋布，灰襯衫布的輸入量來看，就更為符合與糖業出口數量的連動。1868 年到 1880 年間，灰襯衫布的平均進口數量約有 25600 匹，但到了 1881~1894 年，這段期間的平均量就下跌到 20000 匹左右的數量，減少了 20% 以上，尤其是過了 1885 年，灰襯衫布進口數量有明顯的衰退。也就是說，

⁴⁵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頁 45-47。

⁴⁶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總 576 頁。

⁴⁷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599 頁。

⁴⁸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664 頁。

⁴⁹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770 頁。

⁵⁰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935 頁。

⁵¹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總 1023 頁。

糖業出口的銷量下滑，這樣的情形可能影響到了人民的經濟狀況，購買紡織品的能力降低，而逐漸反應在進口數量的遞減上，使得南部市場的紡織品貿易陷入停滯甚至衰退的情形。

總之，南部市場的紡織品貿易沒有北部市場來的興盛，不論是在成長率還是進口數量方面，都有一段不小的差距。南臺灣棉毛進口的成長率較為接近，與北臺灣棉布進口成長飛速的情況不同，在棉織品部分雖然同樣以灰襯衫布、白襯衫布、T 字布與日本棉布為主要進口商品，但灰襯衫布至始至終都維持最大宗的輸入量，白襯衫布和日本棉布都未能超越它。T 字布進口數量則比北部市場來的多，可能是作為米糖等作物外包裝袋的原料之一。麻袋的進口則是南臺灣獨有的現象，大量的麻袋進口到臺灣來，同樣用來當作米糖的外包裝袋使用。另一方面，整個南部的紡織品市場，糖業出口在 1881 年之後逐漸出現衰退的情形，這可能是人民的經濟能力降低，紡織品的消費同樣受到影響，進口數量亦走向停滯與下跌的情況。

第三節 紡織品市場的南北差異

根據前兩節的討論，得知北臺灣和南臺灣的紡織品市場，有相當程度的不同。從棉織品和毛織品的進口數量來觀察，根據表 4-7 的統計，可以清楚的看出兩者的差異。以棉織品為例，北部市場的棉織品擴張相當快速，進口數量直線上升，北臺灣在 1875 年之後的平均進口數量，大幅拉開與南臺灣的差距；反觀南部市場，從 1875 年之後，輸入量幾乎可說是就原地踏步，沒有什麼成長。北部市場棉織品進口數量的大量增加，顯現北臺灣經濟力的提升。毛織品在兩地市場的進口數量都不算太大，北臺灣的毛織品在 1875~1879 年間，有 8222 匹的平均進口數量，是海關毛織品輸入的最高峰；1885~1889 年間，也有 7929 匹的進口量。在 1875~1889 這十五年間，北部市場的毛織品進口數量，持續領先南部市

場。南部市場的毛織品進口量，大致上維持緩步成長，一開始比北部市場略多，但 1875 年之後的平均進口數量，就長時間被北部市場超越，顯現北部市場的消費能力大過南部市場。雖然 1890~1894 年間毛織品的南部市場輸入量高過北部市場，但可能的原因為毛織品在北臺灣不再流行於上層社會，才會導致進口數量被南部市場超越。⁵²

表 4-7 南北市場棉毛織品五年平均輸入量比較表

單位：匹 (Piece)

數 量 年 代	淡 水		打 狗	
	棉織品	毛織品	棉織品	毛織品
1868	30030	2051	21595	4593
1870~1874	44807	3407	38654	4632
1875~1879	93977	8222	51585	4295
1880~1884	97942	7129	51922	5699
1885~1889	145848	7929	52969	5828
1890~1894	174024	6039	54719	8034

資料來源：依據表 4-1，表 4-3 製成。

從灰白襯衫布的輸入數量，更可以明顯看出南北市場經濟力的差異。根據表 4-8 的統計，開港之後北臺灣的灰襯衫布進口數量穩定，1870 年之後的平均進口量，大致維持在 30000 匹到 45000 匹左右的數量；而白襯衫布則是成長迅速，在 1880 年之後的平均輸入量超越灰襯衫布，此後在灰白襯衫布中的進口數量中，持續保持領先的地位。而南部市場的灰襯衫布，雖然始終維持進口紡織品中的第一，只不過在數量上就明顯少於北部市場，1870~1874 年間還有 28390 匹的輸入量，但之後每況愈下，1880 年以後僅存 20000 匹左右的進口量；南部市場的白襯衫布，在 1880 年之後，也大致維持 11000 匹上下的輸入量，沒有太大的變化。將北臺灣和南臺灣的灰白襯衫布進口數量相互對照，1880 年之後，北部市場灰

⁵².1890 淡水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4, p. 426。

襯衫布的進口數量約為南部市場的 2 倍，白襯衫布的進口數量北臺灣則為南臺灣的 4~5 倍，同樣顯現出南北部市場，消費紡織品經濟能力的差距。除了灰白襯衫布的在南北部市場進口數量的差異外，日本棉布在北臺灣的輸入量，同樣遠勝於南臺灣，由於前文已有相關討論，在此不再贅述。

表 4-8 灰白襯布南北市場五年平均輸入量比較表

單位：匹 (Piece)

數 量 年 代	淡 水		打 狗	
	灰襯布	白襯布	灰襯布	白襯布
1868	24065	2558	19900	250
1870~1874	31149	8577	28390	2738
1875~1879	43056	32155	24946	6660
1880~1884	35430	42484	21165	10771
1885~1889	45306	48892	20911	10934
1890~1894	44815	50309	19720	10723

資料來源：依據表 4-2，表 4-5 製成。

會造成南北部市場紡織品貿易數量的差異，是受到兩地市場出口經濟活動興衰的影響，也就是跟茶和糖出口貿易的變化有關。根據林滿紅利用海關檔案的研究，茶和糖分別為北部市場和南部市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在 1868 至 1895 年間，茶出口總值占同期臺灣北部出口總值的 90%，而同期糖出口總值則占南部出口總值的 89%。⁵³因此兩者出口數值的多寡，會直接影響到南北兩地市場消費紡織品的經濟力。而茶在北部市場的出口數值，自 1880 年之後的海關資料中，都超越糖在南部市場的出口數值，差距的幅度也越拉越大。⁵⁴如果從海關檔案中兩地的貿易總額來看，1880 年以前南部貿易額多於北部，但此後北部市場則超越南部市場，南北貿易數值的逆轉發生於 1880 年左右，1885~1895 年間，北部市場

⁵³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頁 99。

⁵⁴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頁 3、5、183。

貿易總額甚至是南部市場的 2 倍。⁵⁵由此可見隨著茶業出口貿易的興盛，北臺灣的貿易日漸蓬勃，跟南部市場相較，有能力消費更多更好的紡織品。而南部貿易的衰退情形，在 1889 年的領事報告這樣記載：

臺灣南部比其它口岸更令外商失望，原本是一個非常富庶的地區，現在卻沒有任何發展的跡象，出口一年少於一年，直到今天貿易額仍與 25 年前開港之時相同。進口商品以鴉片為主，出口則以糖為主。雖然這兩項商品的貿易額在過去幾年有增加，但在 6 年前似乎已達上限。從那年之後，貿易一直是停滯的。⁵⁶

如果從南北兩地進出海關的船舶數量相較，同樣可以看出端倪。根據戴寶村以海關檔案中淡水和打狗的船舶進出數量做研究，統計各年度進出兩地的船舶數字，發現就單一年份的比較而言，打狗領先的情形多出現在 1886 年以前，在此之前的 17 年中，打狗領先的有 11 年；然而自 1886 年起淡水各年度船隻的進出數量，都比打狗來得多，總計 1886~1895 這 10 年間兩地出入海關的船舶數量，淡水與打狗的比值為 62%：38%，進出淡水船隻數量明顯高於打狗。⁵⁷不僅如此，於載貨噸數上，淡水同樣在 1886 年之後取得領先地位，其載貨噸數的成長，是全臺整體載貨噸數上升的主要推力。⁵⁸雖然以海關檔案的統計數字，不能代表中式帆船進出南北部市場的狀態，但上述的情形，仍可以顯現出南北經濟力逆轉的現象。

開港後北臺灣經貿活動較南臺灣興盛的情況，也反應在兩地的人口比重上。根據陳紹馨的統計，1811 年全臺人口約為 250 萬，涵蓋臺灣北部的淡水廳和噶瑪蘭廳，人口占全臺人口比例的 13% 左右，與南臺灣所占 43% 的比重相差甚遠。

⁵⁵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頁 180-182。

⁵⁶1889 年臺南領事報告，收於“*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4, p. 351。

⁵⁷戴寶村，《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臺北：玉山社，2000 年），頁 102-106。

⁵⁸戴寶村，《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頁 110-114。

但到了 1893 年臺北府（淡水縣、宜蘭縣、基隆廳）所占人口比例則增加到 26%，雖仍不如臺南府（安平縣、嘉義縣、鳳山縣、恆春縣、澎湖廳）的 44%，⁵⁹但北臺灣的人口比重成長了一倍，不像南臺灣原地踏步，顯示出經濟活絡帶動北臺灣人口增加，更多的人口對商品的需求自然提升，紡織品亦是如此，這也是促成北部市場紡織品消費增加的原因之一。

總之，開港後由於北臺灣茶產業的興起，茶的出口貿易帶動整個北部市場經濟能力的提升，人口也隨之增加，人民的有能力去消費更多商品，使得北部市場的紡織品貿易蒸蒸日上，不論是灰襯衫布、白襯衫布，還有成長擴張速度驚人的日本棉布等紡織品，進口數量都有長足的進展，北部市場不僅僅在進口數量提升了，輸入紡織品的種類也更加豐富，是一個持續成長的市場。

反觀南部市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糖，在 1881 年之後出口數量出現停滯與下跌的情形，導致南部市場的貿易活動陷入停頓甚至是衰退的狀態，南北經濟力逐漸逆轉。這樣的情形使得南部市場的紡織品貿易成長力道薄弱，也波及到了南臺灣紡織品的進口數量，棉織品在 1880 年之後的平均進口數量僅有微幅增加，與北部市場的大幅度成長完全不同。灰白襯衫布在 1880 年之後的平均進口數量幾乎沒有改變，灰襯衫布的輸入量甚至還有些微的減少。除此之外，南部市場的本土商人勢力很強，華商同樣涉足洋布的經營，比洋商更有競爭力。另一方面，中式帆船持續從大陸進口大量紡織品，加上臺灣自製紡織品的夾擊，造成南部市場進口紡織品貿易成長趨緩，甚至呈現衰退的情形。

⁵⁹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1979），頁 453-454。

第五章 結論

紡織品貿易，是臺灣最重要的進口貿易，它同樣也是最貼近臺灣人民生活的進口商品。清治前期受到清廷對臺統治政策的影響，造成臺灣社會男女性別比例懸殊，不利於手工業的發展，許多民生必需品無法自行生產。加上臺灣的農產品具有強烈的商品性格，遂逐漸形成臺灣的農產品輸往大陸，換取所需民生用品之區域分工的現象出現。

在區域分工底下，紡織品透過中式帆船，在臺海兩地的港口間穿梭往來。主要的交易對象為，與臺灣關係密切且距離最近的福建，和棉紡織業發達的華中地區。輸入的商品種類繁多，有一般大眾普遍使用的棉織品，較為高級的絲織品，涼爽的麻葛類織品，保暖的毛織品，與混合編織的交織品等紡織品。兩岸間頻繁的紡織品貿易，也促使各地的布郊、絲線郊等經營紡織品的行郊興起。

紡織品在移墾社會的臺灣，被人民視為是自身貴重財物的一部份，具有財產的價值。當時臺灣的社會風氣漸趨奢靡，表現在衣著服飾上，便是競相穿著製作精美、材質優良、色彩鮮豔的服飾，華服成為炫耀與身份地位的表徵。在這樣情況之下，衣服常常是整個家庭最有價值的物品，因此就有越來越多搶奪或竊盜服飾的案件，在臺灣的社會出現。

開港之後的臺灣，紡織品進入嶄新的局面，開始有大量外國的紡織品進入臺灣，其中又以英國紡織品及日本紡織品，在臺灣擁有廣大的銷售實力。1860~1884年是英國紡織品的天下，到了1885年之後，日本紡織品異軍突起，成為繼英國之後，臺灣最重要的紡織品來源國家。

輸入臺灣的紡織品，大致可區分為棉織品和毛織品。由外國輸入臺灣的紡織品，大體上仍以棉織品為主，毛織品以進口數量來看，僅占開港後洋布整體紡織品輸入量的7.25%。而如果以進口的總值來看，兩者間的差距就縮小了，但仍是以棉織品的進口總值較高。

進入臺灣市場的棉織品，以西洋布中的灰襯衫布、白襯衫布，及東洋布中的日本棉布這幾種紡織品最為重要。灰襯衫布原本是洋布中，進口數量最多的商品，但由於品質較差，製作茶包裝袋的功能又逐漸喪失，使得進口數量的成長遭遇瓶頸，轉趨衰退。白襯衫布則因為品質比灰襯衫布佳，又適合染成各種顏色，開始廣受臺灣民眾喜愛，進口數量持續攀升。日本布同樣也具有適合染色的特性，加上質地與尺碼更符合臺灣人的喜好，因此輸入臺灣之後大受歡迎，成長的速度是進口洋中最为快速的。

然而不論是東洋布還是西洋布，在臺灣紡織品市場中最大的競爭對手，還是土布。透過中式帆船從大陸輸入臺灣的土布，由於不須經由條約港口，可以直接抵達臺灣其它的港口進行貿易，因此有更廣泛的銷售範圍，不像進口紡織品由於運費等因素被限制在條約港一帶。加上不須被課關稅，在價格上也更具競爭力，因此始終是洋布擴展市場的頭號大敵。另一方面，臺灣也有自製的紡織品出現，同樣也對洋布形成壓力。

不過，由於臺灣南北部在開港之後，兩者經濟活動的發展有很大差異。北部以茶出口為主，南部則是輸出糖，茶和糖兩項產業在南北兩地的不同發展，牽動南北市場經濟實力的更迭。因此對紡織品貿易而言，將臺灣切分為北部市場和南部市場來觀察，可以看見兩者間不同的發展趨勢。

北部市場受惠於茶產業的持續擴張，經濟能力提升，對於紡織品的需求量也不斷攀升。消費能力上升的結果，對衣著服飾也更加講究，因此適合被染成各種顏色的白襯衫布、日本棉布在北部市場大受歡迎。尤其是日本棉布在北臺灣成長幅度驚人，不但超越灰白襯衫布，成為北部市場進口數量最高的紡織品，同時，它也是北部市場紡織品貿易持續擴張最重要的推力。

南部市場則受到糖業出口衰退的拖累，使得南臺灣的進口紡織品貿易陷入停滯，其規模也較北部市場狹小。不論是棉織品和毛織品，成長的幅度都有限。加上本地商人加入經營洋布貿易，使得洋商無利可圖，逐漸放棄南部市場，讓海關的紡織品進口數量，在 1890 年之後，大幅度的下降。南部市場最受歡迎的洋

布是灰襯衫布，自始自終都維持最高的進口數量，但僅有約北部市場灰襯衫布進口數量的一半。麻袋也是南部市場中，大量進口的紡織品，用來製作糖和米的包裝袋，為南臺灣特有的輸入產品。

總之，清代臺灣紡織品貿易始終蓬勃發展，開港前的紡織品多源自中國大陸的華中與福建一帶，透由中式帆船進入臺灣。開港後兩岸的分工仍持續進行，但有洋布的加入，英國和日本的紡織品紛紛進入臺灣市場，與土布發生競爭，形成紡織品的土洋大戰。洋布一直被視為一種貿易平衡的方式，用來消除大量茶和糖的出超，所以洋商積極想在臺灣拓展紡織品貿易。而洋布的進口數量也持續成長，但始終無法動搖土布的地位。洋布的進口使得臺灣的紡織品更豐富多元，提供臺灣民眾除了土布之外，另一種消費的選擇。



參考書目

一、史料

中文：

《淡新檔案》

丁曰健(1867)，《治臺必告錄》，文叢第 1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丁紹儀(1873)，《東瀛識略》文叢第 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王瑛曾(1762)，《重修鳳山縣志》，文叢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不著撰人，《臺灣志略》，文叢第 1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不著撰人，《福建通志臺灣府》文叢第 8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不著撰人，《安平縣雜記》，文叢第 5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朱景英(1774)，《海東札記》文叢第 1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周元文(1712)，《重修臺灣府志》，文叢第 6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周凱(1839)，《廈門志》，文叢第 9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周鍾瑄(1717)，《諸羅縣志》，文叢第 14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周璽(1835)，《彰化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林百川、林學源合纂(1898)，《樹杞林志》，文叢第 6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施琅，《靖海記事》，文叢第 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

姚瑩(1829)，《東槎紀略》文叢第 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范咸(1747)，《重修臺灣府志》，文叢第 10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高拱乾(1696)，《臺灣府志》，文叢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倪贊元（1894），《雲林縣採訪冊》，文叢第 6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連橫(1920)，《臺灣通史》，文叢第 12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陳文達（1719），《鳳山縣志》，文叢第 12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陳文達（1720），《臺灣縣志》，文叢第 10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陳培桂（1871），《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陳淑均（1832），《噶瑪蘭廳志》，文叢第 16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黃叔瓚（1722），《臺海使槎錄》，文叢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鄭用錫（1834），《淡水廳志稿》，臺北：遠流，2006。

蔣毓英（1685），《臺灣府志》，文叢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南部碑文集成》，文叢第 10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中部碑文集成》，文叢第 15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2。

藍鼎元，《平臺紀略》，文叢第 1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1882~1891 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臺灣經濟史六集》，臺灣銀行研究叢刊 54 種，臺北：中華書局，1957。

〈1882~1891 年臺灣臺南海關報告書〉，《臺灣經濟史六集》，臺灣銀行研究叢刊 54 種，臺北：中華書局，1957)。

C.Imbauel-Huart，《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英文：

黃富三等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I、II，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Robert L. Jarman,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Slough: Archive

Editions,1997.

日文：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下），東京：三秀舍，1905。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東京：東洋，1910。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下卷，東京市：三秀舍，1905。

二、專書

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中國社科學院經研所，《上海市棉布商業》，北京：中華書局，1979。

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文集》，臺北：稻香，2003。

杉原薰《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京都：ミネルウア書房，1996。

李祖基，《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卓意雯，《清代臺灣婦女的生活》，臺北：自立晚報，1993。

卓克華，《清代臺灣行郊研究》，臺北：揚智文化，2007。

林滿紅，《四百年來的兩岸分合：一個經貿史的回顧》，臺北：自立晚報，1994。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臺北：聯經，1997。

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臺北：聯經，2000。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臺北，知書房，1996。

宮田道昭《中国の開港と沿海市場——中国近代經濟史に関する一視点》，東京：東方書店，2006。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2。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

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1979。

陳國棟，《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2005。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臺灣史》，臺北：五南，2002。

薛化元等編，《臺灣貿易史》，臺北：外貿協會，2008。

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臺北：聯經出版社，1977。

濱下武志，《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戴寶村，《臺灣政治史》，臺北：五南，2006。

戴寶村，《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臺北：玉山社，2000。

羅麗馨，《十六、十七世紀手工業的生產發產》，臺北：稻香，1997。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 1289—1937》，北京：科學出版社，1963。

蘇旭琄，《臺灣早期漢人傳統服飾》，臺北，商週，2000。

三、期刊論文

王世慶，〈清代臺灣的米產與外銷〉，收於《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1994。

王一剛，〈臺北三郊與臺灣的行郊〉，《臺北文獻》直字第9、10期，1957。

李國祁，〈清代臺灣社會的轉型〉，《中華學報》5卷2期，1978。

李國祁，〈清季民初閩浙臺觀念與風俗習慣的趨新〉，收於《陶希盛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食貨，1979。

吳奇浩，〈清代臺灣之奢靡風氣〉，《臺灣史研究》12卷2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5。

林滿紅，〈貿易與清末臺灣經濟的社會變遷（1860-1895）〉，食貨月刊復刊號9卷8期，1979。

林滿紅，〈清末臺灣與我國大陸之貿易型態比較（1860~1894）〉，《師大歷史學報》6期，1978。

林玉茹，〈評介李著《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臺灣史研究》2卷1期，1995。

林玉茹，〈由私口到小口：晚清臺灣地域性港口對外貿易的開放〉，會議論文。

林玉茹，〈清末北臺灣漁村社會的搶船習慣—以《淡新檔案》為中心的討論〉，新史學20卷2期，2009。

林玉茹，〈商業網絡與委託貿易制度的形成—十九世紀末鹿港泉郊商人與中國內地的帆船貿易〉，《新史學》18卷2期，2007。

林玉茹，〈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臺灣史研究》17卷2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

張炳楠，〈鹿港開港史〉，《臺灣文獻》19卷1期，1968。

張家銘、葉秋玲，〈臺北大稻埕布業之發展 1860—1980〉，東吳社會學報第7期，1988。

莊金德，〈清初嚴禁沿海人民偷渡來臺始末〉，《臺灣文獻》14卷3期，1964年。

曹永和，〈十七世紀作為東亞轉運站的臺灣〉，收於《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

陳國棟，〈臺灣歷史上的貿易與航運〉，收於《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2005。

陳國棟，〈清代中葉臺灣與大陸之間的帆船貿易—以船舶為中心的數量估計〉，《臺灣史研究》1卷1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4。

黃富三，〈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下)，《臺灣風物》，33卷1期，1983。

黃秀正，〈清代治臺政策的再檢討：以渡臺禁令為例〉，《文史學報》20期，1990。

溫振華，〈清代臺灣漢人的企業精神〉，《師大歷史學報》9期，1981。

蔡昇璋，〈日治初期港口「郊商」與「特別輸出入港」之設置〉，《臺灣文獻》57卷4期，2006。

四、學位論文

王嘉慧，〈晚清臺灣鴉片進口貿易研究 1858—189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陳秋坤，〈十八世紀上半葉臺灣的開發〉，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1975。

蔡承豪，〈從染料到染紡—17 至 19 世紀臺灣的藍靛業〉，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蔡郁蘋，〈鄭氏時期臺灣對日本貿易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戴寶村，〈近代臺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據時期〉，臺北：師大歷史所博士論文，1988。

